

2013年6月13日，法兰西学院正式公布2013年各大奖项获奖名单，由法新社向全世界传播。我校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荣获其中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法语国家联盟金奖”（La Grande médaille de la Francophonie）——旨在全世界范围内奖励为法语和法语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学术界人士。

与此同时，北大西侧畅春园，一栋小楼的电脑前，一位老人正在认真地敲下几行法文，翻译着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诗经》。他，便是中国汉英法三语互译的唯一人，享誉中外的翻译家许渊冲。

P18

刊首语 | 2

读者来信 | 3

今日北大 | 4

观点 | 8

微言微语 | 10

永远的校园 | 12

专题：灵魂与灵魂的奇遇 | 18

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代大家许渊冲的译界人生 19

穿梭于中法之河的两岸

——董强老师谈翻译 31

特别策划：跨越太平洋的梦想 | 43

张益唐：“半生潦倒”的传奇数学家 46

邓兴旺：从少年英才到科学大师 51

陈雪梅：女性也能撑起科研的半边天 56



P43

从30岁出国留学，到60岁作出举世震惊的成绩，中间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张益唐经历了学业的挫折、求职的失败，以一个北大数学才子的身份，一个数学博士的身份做过各种杂活。后来的14年虽然谋得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但一直只是个没有正式编制的讲师，可谓半生潦倒。可是他心安理得，始终不改其志。

勘误

《北大人》2013春季刊（总第48期）第67页“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校友名录”中将邓楠校友所属院系错登为“原技术物理系”，应为“原物理学系”。特此更正，并祈读者原谅。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校友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顾问（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文申 迟惠生 丁石孙 海 闻 郝 斌 郝 平  
柯 杨 李安模 罗豪才 闵维方 王德炳 王恩哥  
吴树青 吴志攀 许智宏 周其凤 朱善璐

编委（按姓名拼音排序）

邓 娅 高 超 李 晓 王丽梅 王 宇 肖 渊  
张向英 赵文莉

主 编 李宇宁

执行主编 王汝哲

责任编辑 陆宁波

编辑（按姓名拼音排序）

黄 贇 黄 莹 贾泓扬 李存峰 乔淑芝 王 恒  
张 莹 赵 琰 周建涛

学生记者（按姓名拼音排序）

杜卓黎 黄 辰 金 婧 李溪月 何滨柔 蓝星宇 梁芷嫣  
林起贤 王佳宁 魏王笑天 武宏琛 徐媛舒 杨 飒  
张 亮 赵福斌 赵雅娇

摄影记者 李 森

发 行 白 帆

美 编 多边数字媒体

商务运营 《北大人》发行与运营中心

运营总监 王 健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地 址 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517室

邮 编 100871

电 话 010-62758419

传 真 010-62763363

投稿邮箱 bdr@pku.org.cn

网 址 http://www.pku.org.cn

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赐稿。来稿形式不拘，记叙、回忆、纪念、传记、专题采访、通信报道、散文、诗词、照片等均欢迎，只要和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等有关。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亦希望您能向我们推荐（所投稿件希望能附上相关照片，纸质版照片使用完毕我们会尽快返还）。

更 新

如您的个人信息（单位、职务、电话、邮箱、地址等）有变更，请及时告诉我们，请发邮件至pkuaa@pku.edu.cn或致电010-62758419，传真010-62763363。

（封面题字：季羨林）

为提高办刊水准，扩大发行量，我们欢迎校友赞助赠阅《北大人》。年度赠阅100元/年，享受每年四期《北大人》刊物；终身赠阅1000元，享受每年四期《北大人》刊物及“我爱母校”捐赠纪念邮票。赞助者名单将在《北大人》及北京大学校友网上刊登。汇款时请在附言中注明“赞助赠阅《北大人》”。

国内账号

户 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人民币账号：0200004509014477781

人民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营业室  
（可缩写为：工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网上捐赠：http://www.pku.org.cn/dingdan/donate.jsp

燕园学人 | 59

从过去到未来

——宋向光老师与他眼里的博物馆事业 59

大师论道 | 65

莫问君得失，随心自去来

——欧阳中石先生的艺术人生 65

校友风采 | 76

一生所爱 一世辛勤

——罗益锋的赤子传奇 76

华丽转身，不忘初心

——记跨界女人刘怀宇 82

分形几何绽放美丽雪花

——笑傲生命的女孩杨帆 93

故人故事 | 97

张友仁：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97

专栏 | 106

朱强：北大图书馆藏书小记 106

王逸舟：如何理解中国外交 108

读书 | 114

刘宜庆：吴晓铃昆明读书记 114

北大学者谈读书 116

老照片 | 119

校友会动态 | 120

公告栏 |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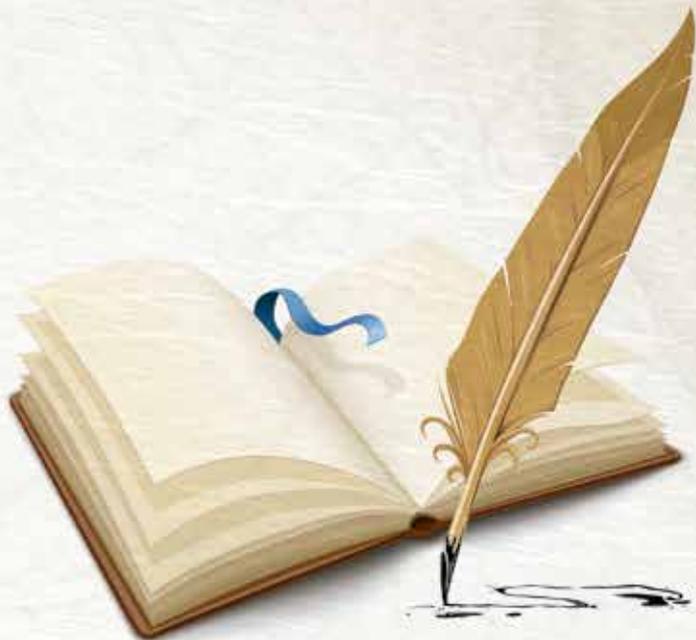
## ► 刊首语：

《北大人》秋季刊终于与大家见面了，本期依然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可读性强，而且似乎显得更有文化。当然了，这些话由主编说出来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是否真的有文化，还要读者们来评价。

本期刊物的封面故事、专题文章和特别策划都很精彩，提请校友们给予关注。“莫问君得失，随心自去来”是本期的封面故事，书法家、教育家、哲学系校友欧阳中石先生与我们分享了其耄耋之年的人生感悟。先生早年曾颠沛于战乱，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北大求学，一路从红楼到燕园，师从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聆马寅初校长之谆谆教诲，与李泽厚先生有同窗之谊，这样的幸福实实在在的令人神往。毕业后，欧阳先生既当过中学教员也做过大学教授，一生治学、孜孜以求、大器晚成，却始终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尽显老一代北大人的风骨和境界。

本期专题文章“灵魂与灵魂的奇遇”，讲的是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两位翻译家的故事。我本人学外语出身，曾选修过翻译理论的课程，虽成绩不好，但对翻译这项事业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列位看官莫要小看翻译，毫不夸张地说，她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思想启蒙和文化觉醒的重要支撑。老一辈的校友对于当年的苏联文学和东欧电影一定记忆犹新，而80年代在北大求学的师兄师姐们肯定都读过萨特、尼采和叔本华。遥想当年，老校长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开启了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五四时期，胡适先生等人翻译的《玩偶之家》则成为当时“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北大和翻译工作的渊源远不止这些。那些出自北大人之手，深谙“信、达、雅”之精髓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译著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为他们打开了一条通往“巴别塔”，也通往遥远未知的文明的道路。

“特别策划”把视野延伸到了海外，讲述了三位留美的北大校友的事迹，其中两位是美国科学院的新科院士——邓兴旺教授和陈雪梅教授，另一位则是半生坎坷却豁达淡定的数学家张益唐校友，他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



详。日前，张益唐校友重返母校，在北大举办公开演讲，我这才有幸与他有了一面之缘。张益唐校友衣着朴素，不善言辞，那样子跟我们想象中的数学家别无二致。可以想见，他的演讲不会是别的，只可能是他钻研多年，全世界没几个人能听懂的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我是没勇气去听的，当我悻悻地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竟然路遇成群结队、拉帮结伙的北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他们兴冲冲地赶往报告厅，那场景若说是万人空巷似乎有点夸张，但绝对称得上盛况空前。在人流中逆行的我倒颇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对学术的近乎盲目的崇拜才是北大原本的样子。据统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有大陆大学教育背景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共10位，其中四位是北大校友，他们分别是邓兴旺、陈雪梅、谢晓亮和朱健康。

本期刊物通过报道不同年龄段的校友群体，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值得所有校友们自豪的北大力量。老一辈北大人创造了母校辉煌的历史，而张益唐们则彰显着北大精彩的当下，那么未来如何呢？也许北大的未来就藏在那群涌向报告厅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身上，也或许就藏在此刻手捧《北大人》刊物的校友们的身上。写到这里，我想起中文系刘震云校友在2013年北大开学典礼上的一句话，他说：“北大是一盏探照灯，照亮的是民族的未来。”

李新

本期“读者来信”刊登两则老校友来信，这两则信都是对《北大人》2013夏季刊中具体内容的批评建议，希望校友们能够看到，略补遗憾。两则来信都很简短，但从简短的文字中可以见到他们对母校人事风物的深厚感情，以及严谨细致、求真求实的做事风格。

亲爱的北大校友会《北大人》编辑部：

2013年第二期《北大人》收到了。谢谢！提一点意见，本期《上下求索 群星灿烂——物理学一百年》文章应该讲到谢义炳先生（1917—1995）。他是1950年回国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1952年院系调整后物理系气象专业的负责人，后来的地球物理系主任、中科院院士。他对北大大气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卓越贡献是不应忘记的。

此致敬礼！

老校友 周鸣盛 梁平德

2013年8月6日



北大物理学在中国拥有崇高的地位，涌现过许许多多成就卓著的校友。因为杂志篇幅所限，我们的报道与厚重的历史相比，只是沧海一粟，甚至有浮光掠影之嫌；在重点校友报道的选择上虽然力求全面公允，但仍然挂一漏万，存在不少遗憾。特别感谢两位学长给我们提的建议，校友们的鞭策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北大人》编辑部：

接2013年第2期贵刊，其中72页中考古博物馆照片介绍，日晷“为北大迁到燕园之前的旧物”，这个说法不明确。该日晷原设置在城内景山东街北大理学院大讲堂前的水池中，为上世纪20年代李四光担任北大二院庶务主任期间规划整理大讲堂前草坪时所置，80年代因该处进行建设，拆掉后捡回北大，放置在外文楼的西门外，考古博物馆竣工时将它重新立于此处。

王希祐

2013年8月13日



北大有115年的历史，而我们燕园的历史更长，燕园的草木风物大多具有曲折婉转的历史。王希祐学长为我们讲了一段关于日晷的小故事，故事里有物、有人、有建筑，有往事。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晷所在的鸣鹤园已经修缮一新了，保留了原初的古典味道，而水更清了，水上的亭子更宜人了，那一条小径也更幽静了。

## 新鲜事

### ① 未名湖畔好读书：近200名港澳台学生参加北大暑期学校

7月10日晚，“未名湖畔好读书：2013北京大学暑期学校（港澳台学生）”欢迎晚宴暨学员联谊会在校举行。晚上，来自各校的大学生表

演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同学们纷纷表示，十分期待即将开始的这段北大之旅，并相信未来一个月的学习生活将成为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

自2012年北京大学暑期学校首次面向台湾地区招收学员以来，北大暑期学校受到港澳台地区高校学生越来越多地关注。今年，在教育部“香港与内地高校师生交流计划”的支持下，北大暑期学校首次面向香港地区招收学员，项目得到香港地区高校的积极响应。本次暑期学校共招收来自台湾大学等34所台湾高校和香港大学等8所香港高校的192名学生。本次暑期学校共有五十多门优质课程向校外学员开放，两岸四地的青年学子将齐聚燕园，共享北大开放的教学资源。

### ② 北京大学承办的2013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在大同开幕

8月2日，2013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在山西省大同市正式开幕。该项赛事由中国国家能源局、美国能源局主办，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主办，团中央学校部支持，北京大学承办。22支来自13个国家、35所大学的参赛队伍带着新型太阳能绿色环保应用技术的“太阳屋”，在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展开全方位竞赛。

本届大赛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亚洲，主题口号为“光照未来·世界大同”。共有来自13个国家、35所大学的22支参赛队伍进入到决赛中，是历次大赛中参与国家和地区最为广泛的一次比赛。



▲ 未名湖畔好读书（港澳台）学员联谊会合影

### ③ 北京大学首批MOOCs课程在edX平台发布

edX平台在近日发布了北大首批MOOCs课程，分别是：20世纪西方音乐、电子线路、民俗学、世界文化地理，这标志着北大在积极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几门课程将在2013年9月23日正式对全球用户开放。

### ④ 北京大学原创歌剧《为你而来·王选之歌》弘扬北大传统与科学精神

北京大学师生原创歌剧《为你而来·王选之歌》于9月8日、9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为北大2013级新生带来一次高雅的视听盛宴和别样的入学教育。

王选先生身上不仅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奉献精神，同时有着新时代科学家献身科学、自主创新的精神；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爱生如子，提携后学，具有大家风范。他的成就是北大的骄傲；而这部歌剧的主创和主要演员几乎都是北大学生，他们的加入为作品注入了一份特殊的情感。王选先生夫人陈堃铍教授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并亲自修改了歌词。

## 好消息

### 5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学生陈小朵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近日，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首届歌剧表演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陈小朵，凭借在歌剧《青春之歌》中的精彩表演，荣获这一奖项。

中国戏剧梅花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每两年一评选，旨在表彰在表演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戏剧演员，素有中国戏剧“奥斯卡”之称。

### 6 北大学生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取得佳绩

在2013年（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决赛中，北大学生表现优异，夺得多项奖项。其中，王瑞馨和胥翔宇同学的作品《北大助手》荣获软件开发组一等奖，其余五组同学分别获得多个组别的三等奖。此外，北京大学还因选送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组织工作优秀，获得优秀组织奖。

## 要闻

### 9 北大迎来2013级新生 书记校长深切关爱殷殷嘱托

又到一年开学时。8月31日，北大2013级新生报到当天，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王恩哥等校领导察看了迎新现场，迎接新北大入，并慰问工作在一线的教职工。

9月2日上午，“北大新生第一课”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校党委书记朱善璐为3100余位2013级新生讲授《大学之“大”与北大新青年的责任和担当》。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中，朱书记着重剖析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深刻含义和重要启示，并且指出：“北大人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正义事业，是要为全天下人民谋得更好的生活。”

9月6日上午，王恩哥校长在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以《做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为题的致辞，他希望同学们不仅要认真研究怎样做好学问，也要思考如何立身做人；不仅要恪守学术道德，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心去慢慢沉淀和培养一种为学和做人的高贵品味；不仅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也为他人、社会和国家发出印有自我标记的一份热度。

### 7 北大学生获第四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一等奖

第四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于8月12日至8月17日在兰州大学举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派出由刘春玲、穆良柱作为带队教师兼大赛裁判，孙金奎、刘硕作为观摩教师，章逸飞同学担任领队，包括王贺鸣、刘尚、扈鸿业、姚文杰、竺俊博等五位队员的代表队参加该项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代表队秉承一贯的优良传统，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以对抗赛第二的成绩进入决赛，并最终获得竞赛一等奖。

### 8 小棋盘 大梦想：北大学生连获重大棋赛冠军

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国际象棋比赛中，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学生赵雪勇夺女子个人赛和混合团体赛两枚金牌，成为本届大运会赛场上获得金牌最多的棋手。

在7月初结束的亚洲室内运动会国际象棋赛场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侯逸凡勇夺女子个人赛金牌，她还和北大法学院学生丁立人以及赵雪等棋手联袂组队获得快棋混合团体赛金牌和超快棋混合团体赛银牌，使得中国成为赛场上成绩最好的国家。



▲ 迎新现场朱善璐询问受灾地区新生的生活情况



▲ 王恩哥视察迎新接待站

### ⑩ 北京大学5个学科ESI全球排名前千分之一

7月5日,最新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显示,北京大学物理学(PHYSICS)在过去十年被ESI系统收入论文6931篇,累计被引用58648次,全球排名第76位,已经进入全球物理学学科排名前千分之一的行列,成为北京大学第五个进入全球前千分之一的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学科高原上挺立起学科珠峰。

相比2002年北大只有四个学科进入全球最好的1%的学科,经过十年学科建设和发展,截至目前,北大实现1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其中进入ESI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千分之一的学科已经达到5个,分别是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工程学、物理学。



### ⑪ 北京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加入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

作为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签字仪式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1日上午在美国国务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与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及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等相关机构建立以地下水保护为主题的绿色合作伙伴结对,并在此仪式上签署了启动该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向书。该结对密切契合“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确定的“清洁的水”这一优先合作领域,旨在推动中美两国的环境可持续性和地下水资源保护。

### ⑫ 《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北京大学邓宏魁团队的重大研究成果——使用小分子化合物逆转“发育时钟”

7月18日,国际学术权威杂志Science(Science Express)刊登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教授和赵扬博士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胞重编程为多潜能干细胞。该成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实现体细胞重编程的途径,给未来应用再生医学治疗重大疾病带来了新的可能。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马宏建称,邓宏魁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干细胞研究方面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不仅是对干细胞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同时,也将我国干细胞研究带到了国际的最前沿。国际权威专家表示,这项研究成果为未来研发人造器官和攻克癌症等重大疾病提供了新的途径。2013年8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普通体细胞可能孕育新生命:我国干细胞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题,报道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

### ⑬ 《中外法学》英文版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正式创刊

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外法学》英文版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正式创刊。该刊由英国哈特出版公司(Hart Publishing Ltd)以纸质版(ISSN 2051-7483)和网络版(ISSN 2052-5907)在全球同步出版发行。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由《中外法学》编辑部全权负责组稿、审稿与编辑,刊物暂定为半年刊,每年6月和12月出刊。该刊将在第一时间把中国学者的原创学术精品推向世界,并力争在第一时间刊载境外知名学者的重要原创学术作品,争取三到五年成为有相当国际影响的学术刊物,在国际知名法学学术期刊方阵中占得一席之地。北京大学社科部和法学院将一如既往为期刊提供支持,强化期刊学术创新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作用,以工作的不断创新促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繁荣。

## 荣誉

### ⑭ 工学院郑春苗教授荣获两项国际大奖

近日,工学院郑春苗教授先后获得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2013年度的O.E. Meinzer奖(迈因策尔奖)和美国地下水协会(National Ground Water Association)2013年度的M. King Hubbert奖。

迈因策尔奖被公认为国际水文地质界最高的荣誉,Hubbert奖侧重获奖者的终身成就和国际影响。郑春苗教授不仅是这两项国际大奖设立以来唯一一名华裔获奖者,而且也创造了在同一年度获得这两项殊荣的先例。

郑春苗教授能同时获得两大殊荣,是他20多年来潜心水文地质和地下水领域工作的回馈。目前,郑春苗教授

的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和专家咨询项目，无论是在水资源紧缺和地下水污染严重的华北平原、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黑河流域，还是在深受地面沉降困扰的杭嘉湖地区，都有郑春苗教授领导的团队在开展工作。

### 15 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陈运泰院士当选为亚洲和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主席

在第10届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Asia and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简称AOGS）学术年会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名誉院长、IUGG中国委员会顾问、IUGG中国委员会前主席陈运泰院士当选为亚洲和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主席，任期两年（2014-2016）。

陈运泰院士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现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名誉院长。

### 16 北大环境学院要茂盛获国际著名马利安·斯莫鲁霍夫斯基奖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要茂盛最近荣获国际著名的Marian Smoluchowski Award（马利安·斯莫鲁霍夫斯基奖），此次奖项由Gesellschaft für Aerosolforschung (GAeF)（气溶胶研究协会）在2013年9月1-6日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欧洲气溶胶会议（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上揭晓、颁发。该奖项被公认为年轻气溶胶科学家的最高国际荣誉。

要茂盛研究员1998年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1999年留学美国。2001年获美国阿拉巴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硕士学位，2006年获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博士学位，随后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从事了一年多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07年8月入选北京大学“百人计划”。要茂盛主要开展生物气溶胶的捕获、监测、防护控制及暴露分析等研究工作，过去几年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于2012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 捐赠

### 17 城市与环境学院院友刘水捐赠五千万人民币支持学院绿色大楼建设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铁汉城市与环境大楼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8级城市与环境学系校友刘水先生与王恩哥校长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根据协议，刘水将以个人名义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绿色大楼的建设。绿色大楼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将成为“绿色校园”中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绿色建筑”。

在此捐赠之前，刘水校友已经向城环学院捐资共计1010万元用于奖助学金和院友活动资金。

### 18 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捐赠仪式举行

6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办公楼召开。该基金是为支持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事业，鼓励北大研究生从事高水平的原创科学研究和面向社会基层的调研，提倡实践调研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的扎实学风，由翁洪武先生长期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所设立。自2013年起，翁先生将每年向北京大学捐赠100万元用于设立基金项目，该基金每年将资助15-20个科研项目，主要用于鼓励北京大学三年制学术型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从事原创科学实践研究，重点资助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

### 19 傅海澜女士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司徒雷登文献

9月12日，北大图书馆召开了司徒雷登文献整理工作汇报会，向正在北大访问的傅海澜女士汇报了她在2011至2013年捐赠的3批共约2701件（册）司徒雷登文献的整理情况。傅女士对图书馆的整理工作非常满意，现场决定再次向图书馆捐赠司徒雷登有关文献，并在次日将随身携带的照片和书信等赠予北大图书馆。

## 调整制度才能创造新红利

每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人口优势，农民大量进城，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是旧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渐渐消失，这是正常现象，不可避免。现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很廉价，孟加拉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合三百多块钱人民币，还有越南、柬埔寨、印度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优势是在消失，但我们应该看到，新人口红利产生，是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形成比较优势。

而对于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的丧失，我们可以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创造新的资源红利。比如海水淡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等。

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这时，我们就要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来源：新浪资讯

<http://hb.sina.com.cn/news/magazine/2013-08-24/141099869.html>

## 美国经济的三条“软肋”

依据初步研究，我们认为美国目前经济与政策存在三类软肋。一是美国对多边财经合作场合所做承诺执行不力所表现的软肋，由于这类情况往往与美国特定政策程序或操作流程相联系，也可称操作性和程序性软肋。二是后危机时代美国宏观刺激政策在学理依据、措施选择、实施效果等方面矛盾所表现的软肋，这类广受质疑的刺激措施与美国官方机会主义动机策略联系，或可称策略性软肋。三是在新兴经济追赶大时代美国作为前沿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所表现的软肋，这类软肋与当今时代背景联系尤为深

刻，可称作战略性软肋。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来源：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225>

## 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fit to print）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all the news），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胡泳

来源：搜狐博客

<http://huyong.blog.sohu.com/274783343.html>

## 葛兰素史克仅是冰山一角

葛兰素史克公司行贿丑闻只是掀开了医药灰色利益链的头盖。医药行贿只是腐败的第一环，还有医生、医院以及整个医药流通的环节。这背后，是患者的健康和本就脆弱的医患关系在承担着成本，政府的公信力也在不断地消耗，医药腐败已到不治理不行的地步。

但医药体制是一个整体，政府要下决心直接面对解决医药体制扭曲的顽疾，就必须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办企业那样，以壮士断腕的气概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斩断医院、部分医生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形成牢固的灰色

利益链，使医院和医生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职，使药品回归治病的功能。这一措施不仅是针对药企行贿的，同时也应该是针对医生和医院改革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李玲

来源：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556>

### 控制信息就等于拥有权力

事实上，在人类的早期，权力是从武力与财富而来的。但到了今天，信息构成了武力，也构成了财富。控制信息，就等于拥有权力，这也是庸才可以当官的本质原因。反过来说，越是庸才当道，越是要控制信息。社会学对权力研究的结论是，权力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控制。要想让人们服从，特别是在上级错误的时候也要下级服从，操作的关键点，在于把重要的信息控制起来。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拥有了权力。为什么政府整天在开会，公司也总是会议开不停？本质上，都是为了控制信息。

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讲的其实并不是权力，而是“信息”。当有人掌握了重要信息，而你的生存或发展必需要这些“信息”时，权力就产生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校友、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 姜汝祥

来源：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4effd0101a9r5.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4effd0101a9r5.html)

### 寻找面对复杂中国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社会来到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因为中国的变化带来了大量可能性，也预示了某些不确定性。各种思想和主张正在中国激烈竞争，而它们的背后又往往是各种利益。互联网上的辩论总是很尖锐，也很激动，它们在对现实生活产生我们一时还看不太准的影响。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人能够保持清醒，并且敢于担当，在舆论的喧哗声中帮助整个社会冷静，把社会的思考带向对我们所处位置和环境的判断，以及厘清究竟什么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怎样才能到达目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

来源：《胡锡进论复杂中国》序（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989660417/A3PLT0jPO>

### 谣言

什么是谣言？定义虽然纷纭，有一共同项是“不

实”或“未经证实”的陈述。然而，何者为实，实非简单。且不管哲学意义上的真伪，仅在经验范围中说，有过人们皆知为实的陈述，实为不实，也有过人们皆以为不实的，后来被证明为实。尼禄火烧罗马，流传至今，算不算谣言？关于纣的传说，连孟子都听不下去，那么又怎样处理历史记录中类似的诸多内容？动不动说什么什么“万岁”，又是什么性质？“亩产万斤”呢？又如以意图来区分，“纽约证交所进水三尺”，恶意何在？如以危害论定，“昆明湖水干了”，究有何害？

心理学和社会学家都做过实验，表明“三人成虎”是普通现象，一件事传来传去，没有不失真的。遗漏、歪曲、添加细节……连负有核实之责的报纸，也不能免俗，一战时，德国报纸报道安特卫普被德军攻陷后教堂响了钟声，经过协约国几家报纸的转载，最后变成了教士被头朝下吊在钟下。

——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专栏作家 刀尔登

来源：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c325b80101apa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c325b80101apa8.html)

### 怎么学好语文

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

来源：《中国青年报》访谈文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19/nw.D110000zgqnb\\_20130619\\_2-09.htm](http://zqb.cyol.com/html/2013-06/19/nw.D110000zgqnb_20130619_2-09.htm)

# 微言



@刺幻者：“虽然只是百年燕园的匆匆过客，北大却是我一生的印记”，周日回学校看到的，觉得是见过的最好的毕业语了~

相信你会认为这是最好的毕业语了；而且离开北大时间越长，你会越认同这句话。

@现场直拍：【从北大硕士到武汉村官】考到这个因南水北调迁居来的武当村当村官，霍计武原计划是能腾时间备考数学博士。但这一年来，他实现了村务电子化，给小孩讲题，帮村民修灯修电脑，还邀集10名大学生村官，垦荒试种彩色花生。那本用于考博的《数学分析》，一直折在了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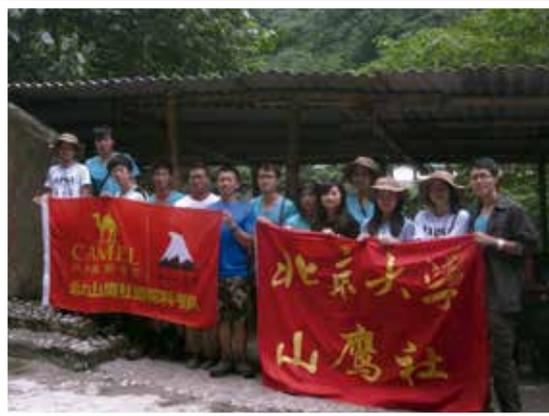


霍计武打农药的用水来自花生地旁的水沟，天气炎热，他满脸汗水。见过比这更接地气、更真切动人的北大人工作场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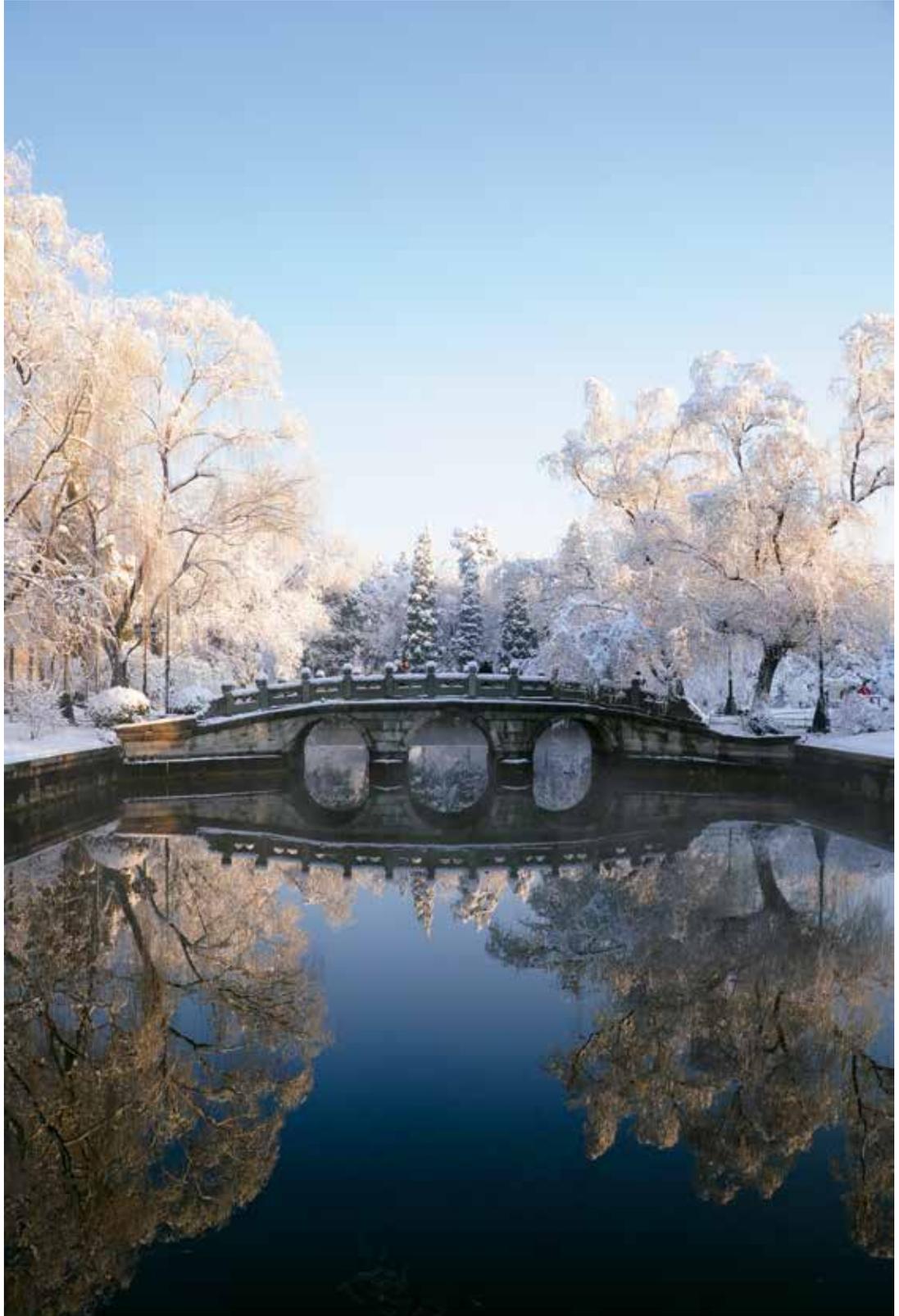


@山村小溪淌过的青春：北京大学十三位硕士博士及本科同学来马吉米村做社会实践与课题研究，他们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木克基小组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给马吉米村发展的好建议。相信这些中国最高学府的天之骄子，从遥远的北京到世外桃源般的木克基，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

**走出校园，海阔天空！**



沉思往事立斜阳，当时只道是寻常。燕园的每一寸肌肤，都洒落过我们年轻的心事。当足音叩击石板，光阴的故事便娓娓道来。寻找北大，也为望见自身，那些见证过我们成长的事物，那些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都将在岁月中定格为永不褪色的画面。在人生的下一个路口回望，燕园依旧为我们守候。无论行走多远，都逃不出她眺望的双眸。



▶ 梦回燕园·水壶

作者：丘明峰 人口研究所2011级博士生

创作感悟：

大雪中守候主人的水壶。有时不妨放慢脚步，俯下身，看看身边让人眼前一亮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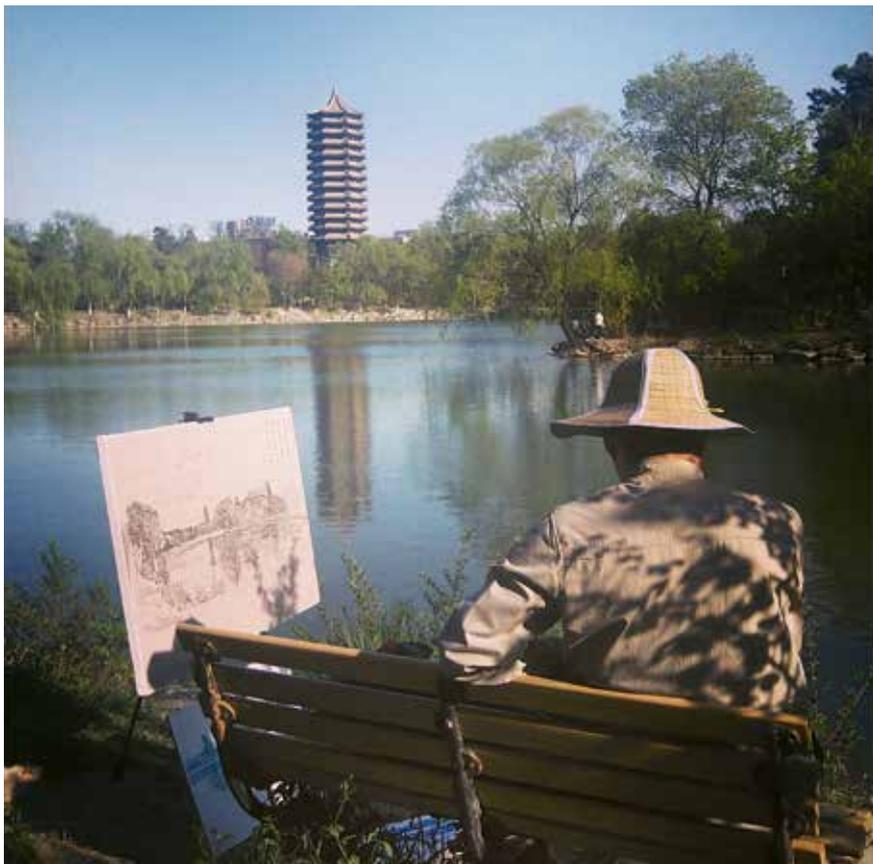


▶ 相逢不语·未名湖畔的画家

作者：刘干鱼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本科生

创作感悟：

明媚的下午，在未名湖畔与画家偶遇。



▶ 梦回燕园·燕园春雪

作者：范博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1级硕士生

创作感悟：

2013年春分，一夜大雪浸染燕园，到处银装素裹。清晨7点，初升的太阳洒下光彩，将附着雪花的树梢染成粉红，好似樱花盛开。从池塘的尽头望校友桥，雪后湛蓝的天空，树梢粉红的雪花，宁静幽蓝的池水，纯美无暇，换了人间。



▲ 相逢不语·图书馆前的修车师傅

作者：丘明峰 人口研究所2011级博士生

创作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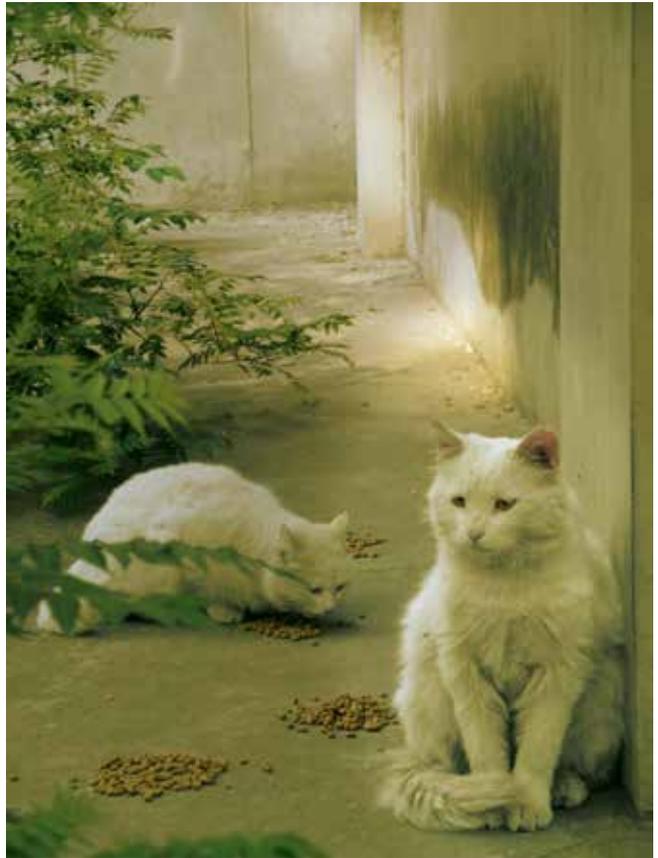
我认为没有所谓最好的照片。我曾经拿不同的校园照片给别人看，他们都喜欢湖光塔影、浓墨重彩的风景，唯有北大园子里的人、认识蔺师傅的师生才喜欢这张照片。谢谢蔺师傅，我们实在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但我们会继承你敬业乐业的精神。去年婆婆过世前我拍了她一张生活照，很自然、不摆拍，妈妈一直珍惜保存至今——唯有我们是我们身边的记录者，请及时拍照。



▶ 我见犹怜·塞满屏幕啦——燕园的喵

作者：张皇琦 社会学系  
2011级本科生

创作感悟：  
能够塞满屏幕的体型是燕园猫的常态。



▶ 我见犹怜·燕园的猫

作者：王小兵 城市与环境学院2010级研究生

创作感悟：

燕园的猫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也许在你来到这座园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了

当你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

为这些守候于此的动物们留个纪念





▲ 书香记忆·夏夜好读书

作者：李想 哲学系2009级本科生

创作感悟：

玲珑月，昏黄灯，夜色下有读书声。

今夏，“寻找未知的北大”摄影大赛由北大团委和青年摄影协会主办，大赛通过网络投票方式选出优秀作品在北大图书馆展出。本刊从优秀作品中选出一部分刊登于此，以慰广大校友对母校的思念之情。

特别感谢《北大社团》杂志的授权和支持！



▲ 岁月如歌·忙忙·碌碌

作者：刘晨 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本科生  
创作感悟：

大学，我们总是行路匆匆，却不一定知道在为何而忙碌。



▶ 书香记忆·悦读

作者：殷帆 城市与环境学院2007级硕士生  
创作感悟：

青春鲜活了厚厚的书页，从这里开始，学会阅读一本读不完的大书。

# 灵魂与灵魂的奇遇

本刊记者 / 赵晋超 杜卓黎 李溪月

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广泛而深刻的。《圣经》记载，在经历了大洪水等种种磨砺之后，人类渴望修一座巴别塔，通向天堂。上帝怒不可遏，想来方法阻止，即时见效。这方法，便是教人类不再说一样的语言。神话传说天马行空，实是先民对存在不同语言的一种解释。倒是由此，语言差异的巨大力量可见一斑。

虽然在基督教原义中，巴别塔含有对于人类傲慢原罪的隐喻，但是它也同时象征着人们对于知识和尊严的执着追求。这巴别塔之殇并未能阻碍人类互相理解的尝试。一种有效的方式——翻译——为这努力提供了可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说：“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sup>1</sup>。”自古至今，翻译都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关于翻译活动的文字记载，当时以口译为主。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始自汉魏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实践的兴盛逐渐引起译者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就形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的肇始阶段。此后的历次翻译高潮中，翻译实践不断推动译论的发展和丰富。

近代中国始终是救亡与启蒙并存之状态。内忧外患之下，一部分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逐渐将寻找真理的目光投向了遥远而未知的西方世界，正式开启了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一

历程中，深深浸染于“敢为天下先”这一精神气质中的历代北大人，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开启了一个名家迭出、译作丰富、影响深远的时代，为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做出了带有独特北大精神烙印的贡献。

而这份精神，亦延续至今。2013年6月13日，法兰西学院正式公布2013年各大奖项获奖名单，由法新社向全世界传播。我校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荣获其中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法语国家联盟金奖”（La Grande médaille de la Francophonie）——旨在全世界范围内奖励为法语和法语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学术界人士。

与此同时，北大西侧畅春园，一栋小楼的电脑前，一位老人正在认真地敲下几行法文，翻译着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集——《诗经》。他，便是中国汉英法三语互译的唯一一人，享誉中外的翻译家许渊冲。

年纪相差半个世纪，两位译者却以各自的方式延续着翻译的魅力。原著与译作，著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这之间是灵魂与灵魂的奇遇，亦是文明与文明的和谐共生。

1 转引自《翻译论》，许钧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372

# 从心所欲不逾矩

## ——一代大家许渊冲的译界人生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应征在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把三民主义解释并翻译为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第一次做了沟通中美文化的工作。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莎士比亚和德莱顿的戏剧艺术。1948年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拉辛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1950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生文凭。1958年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许渊冲教授在《第19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中有《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他提出的“优化论”，继承发展了严复、鲁迅、郭沫若、朱光潜等的理论，对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进行了独到总结。

8月28日开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27册的《许渊冲全集》首次与读者见面。这部集子收录了许渊冲的主要翻译作品。文集涵盖小说、诗词、戏剧等多种题材，不仅包括《论语》、《道德经》、《诗经》、《楚辞》、《西厢记》等中国经典的英、法外译，还有《红与黑》、《高老头》、《雨果戏剧选》等多部外文作品的中译本。

在文集面世前的几个月里，许渊冲为修订书稿一直忙碌。期间，即将在法国出版的唐诗宋词绘画集子的责任编辑每日到家中，请许渊冲选取诗歌或是修改图文介绍。明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他要赶在之前将《诗经》译成法文。“毕竟许先生是90多岁的人了，太累。”许渊冲的太太照君女士更担心他的身体。

不过，声音洪亮，话语急促，思路清晰。除了听力不佳，92岁的许渊冲有一种独特的活力。“好多事情要做，每天忙得很，得抓紧时间。”

###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 ——他为中国翻译寻求话语权

关于中国文化，许渊冲总会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使人乐之的旨归。这与西方文化的原罪观念截然不同。“基督教故事说人吃了苹果，得到知识，也便有了罪。而孔子的学说，强调不断吸收知识，从而不断体察到生命的乐趣。”为了把这样的中国智慧介绍到其他的文化，许渊冲将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翻译视作翻译的根本。本届国际博览会上，这句话的英译“Is it not a deligh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作为标语出现，许渊冲将这视作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声。

正是出于内心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责任，许渊冲选择了现在这种忙碌的生活。

“中国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是必须要明白的。”许渊冲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中文和西

方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根据统计结果显示，西方语言之间的对等度达到90%，而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不到50%。如今我们做到在不同的语言中进行自由转换，并且完成了很多优秀的翻译，这其中的难度也便不言而喻地证明了中国翻译的水平。“对等只能用于西方语境。我既能中英互译，又能英法互译。除非哪一个外国人的汉语水平达到母语水平，否则也就只有中国人可以达到一流水平。承认自己做得好有时是一种必要，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如人就什么都跟着外国走，忽略了自己的优势和独特。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都要敢于承认。”

这样的感悟与他那见证了一个世纪之动荡的人生历程有着深刻的关系。

1938年，就读于江西南昌二中的许渊冲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前一年，随着日寇侵华的步步推进，他已随高中辗转江西各地。“有空袭危险啊，我们自由自在的学生生活就这样被战争破坏掉，心中真的是非常痛恨日本。”进入西南联大后，当时中国最一流的学者与最用功的学生几乎汇聚一堂，每日读书论辩，大后方的日子虽紧张却也充实。但是国家的命运始终与个人紧密相连。许渊冲在南昌二中时的国文教师汪国镇没有随校一同南迁，1938年7月，惨遭日寇杀害。“宁可杀身成仁，不肯苟安江东！”许渊冲在回忆录中这样怀念曾经的良师。1941年夏，由于日军空袭次数频繁，联大推迟开学。许渊冲与友人同赴大理。归来后，前来援助中国对日作战的美国志愿空军大队，即“飞虎队”，已经到达昆明，需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同窗三十几人纷纷报名。大多数学生留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另有同学参加了缅甸远征军南下。这其中，许渊冲的同学黄维在怒江牺牲。1942年，吸引敌机战术成功，飞虎队第一中队长英勇牺牲……面对这些，许渊冲唯有写诗悼念。

诗词翻译是许渊冲最为自豪的成就。从中学一路到留学法国，许渊冲结识的许多青年才俊先后进入翻译领域。谈及他们的作品，许渊冲多有称赞之处。但若问他们的翻译如何，他总会提到，只有自己的诗词

翻译是严格的韵文。中西语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语言形式的不一致上。散文翻译都有困难，更何况极为考验翻译者学识的韵文翻译呢？许渊冲并不是天生神力，他对翻译的要求几乎是到了苛刻的程度。“境界和工整一个都不可以少，不能糟蹋了中国文化的好东西啊！”

2004年在《译笔生花》一书中，许渊冲首次提出“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对于构筑适用于中国文化的翻译理论，平衡西方话语的阐释地位，许渊冲从未停止努力。“解放前的中国受到的压迫太多，太重，太久，使不少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甚至认为传承千年的中国文化译论比西方译论至少落后二十年。他们还认为中国翻译理论要走向世界，就要使用西方术语。但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悠久，使用术语多为西方文化所无，如‘信达雅’，‘三美’，‘三似’，‘三势’，‘三化’，‘三之’译成西方文字和中文并不相等，‘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中文在国际译坛也应该有话语权。”<sup>1</sup>

杨振宁说过，他自己最大的贡献不是得到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在许渊冲看来，这话至关重要，他希望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努力。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他从未停止汲取知识

许渊冲常常提到钱钟书与杨振宁。前者为师，后者同窗，许渊冲一生珍视的联大岁月正是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其后的日子，他们一直联系未断。1980年为香港商务印书馆翻译《苏东坡诗词选》，许渊冲遇到问题，马上写信请教老师。雁去鱼来，碰到解决不了的翻译问题，许先生总会请教钱先生。“钱先生有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我一辈子都在学钱先生这一点！”

杨振宁是物理学家，与许渊冲一文一理，专业相差甚远，但这并不是交流观点的阻隔。2011年许渊冲九十岁生日，清华大学设宴邀请，老同学杨振宁来祝

1 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P90

贺。来年，杨振宁生日，许先生来做祝酒词。“我祝福他是把科学和艺术结合了起来。”两人聊起天来，还有同窗时的劲头。话题天南地北，以许渊冲的脾气，自然还有翻译。“我跟杨振宁谈科学和艺术。我说科学是 $1+1=2$ ，艺术是 $1+1>2$ 。因为科学说什么就是什么，而艺术不是。举个例子，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写蚕到死的时候才会停止吐丝，这是 $1+1=2$ 。但它还有一个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对你的相思要到我死了才可能停止，这就是大于2的内容。这就是艺术。杨振宁承认我说的有道理。”

现代诗人艾略特说过，“物理告诉人家不知道的东西，诗告诉人家已经知道的东西。”许渊冲不这么看，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说，“物理发现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的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的。而艺术，包括诗歌，是本来没有的，是人赋予的意思。科学并非创造。而艺术才是创造。”但杨振宁还是他钦佩的朋友，“他既有天分，又勤奋。”

许渊冲善于学习，不止钱钟书与杨振宁，翻译理论上他将自己的所得追溯至老子与孔子。他所提出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理论本身和研究理论的方法，都源自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sup>2</sup>

### “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许渊冲甚为推崇的一句，语出孔子《论语》第二章，原话形容人于七十岁时可以达到的境界。这句话在翻译场域的使用则首先自于朱光潜先生。“就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不超越客观规律。这是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很重要的一点。相比之下，西方提倡的‘对等论’便只是强调‘不逾矩’，而不同意‘从心所欲’，没有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许渊冲非常强调的一点。非此无以创造“美”。

而“美”在文学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艺术。许渊冲译《红与黑》的末尾一句曾经引起很大争议，但在他则是非常满意。“原句‘Elle mourut.’直译就是‘她死了’，我译作‘魂归离恨

天’。于是被批判添油加醋。但是女主角是含恨而死，她不是正常死亡啊。所以我这样翻是将句子包含的恨给表现出来了。 $1+1$ 这才大于2嘛。但是冯亦代说我抄袭红楼梦，说我喜欢四字成语，是封建遗少。我认为四字成语是精华。而且‘魂归离恨天’也是《红楼梦》从《西厢记》学来的，难道曹雪芹也要被打作抄袭么？”

许渊冲将这句话总结为中国学派的“艺术论”，在“不逾矩”向“从心所欲”的两层楼梯上为翻译寻找“真”与“美”的平衡。

### 知之，好之，乐之

“这是中国学派的目的论，处理读者与译文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处理读者与译者的目的论。”许渊冲的目的论来自于《论语》第六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认为，知之、好之、乐之分别代表了译文可以达到的三种境界，“知之”是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是最低要求，“好之”是让读者喜欢译文，而“乐之”则是使读者感到乐趣。结合“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艺术论，“知之”正是“不逾矩”的译文可以达到的水平，而“好之”与“乐之”的层次，就需要译者以“从心所欲”的心态来发挥自由王国的可能，将乐趣从译文中传递给读者。

“知之，好之，乐之”的划分，亦得益于王国维的“境界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便对应这“知之”，译作首先是为清除语言障碍，使人如同登高望远，一览无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好之”，指译者废寝忘食，自然爱好成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指译者终得到了全方位共鸣的乐趣。

### 意美，音美，形美

“三美论”是许渊冲翻译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理论由鲁迅提出，而其源头则可上溯老子。《道德经》第

2 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P83

八十一章提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可以说老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指出了文学翻译的矛盾，主要是‘信’（或‘真’）与‘美’的矛盾。”<sup>3</sup>及至近代翻译大家严复，“信”与“美”的关系被发展作“信、达、雅”三原则。按照许渊冲的分析，“雅”即“美”的发展，“达”则是新增原则，为的正是处理中西语文不同而导致的翻译问题。再及鲁迅，终于得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

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视作无法翻译的诗句。“木”字与“萧萧”的草字头，“江”字与“滚滚”的三点水，这种整体的和谐感是无论如何难以转换到字母构筑的西方语言中的。但许渊冲完成了。他在卞之琳将前一句译作“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的基础上，以“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完成了后半句。Sheds与shower, river与rolls, leaves与waves, 形美、音美、意美，无一不具。

“超越前人一点，就是为人类做贡献。”做出一点成绩，得到神来之笔，就是许渊冲最开心的时候。“我的这条路不好走啊。普通的翻译法我也会，那样很好译，但我不想止于这样。”

博采众家之长，许渊冲在建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路上上下下求索。而传统文化是他始终依循的经典。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并非狂人

许先生闭住眼，顿了顿，随后猛地睁开双眼，“还有一句一定要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许渊冲常常被形容作“狂”。的确，九十多岁的老爷子，说话仍旧洪亮而又急促，提到一句翻译，想不出完整的句子，就“唰”地起身开始翻书架。“他就是个急性子。”照君女士说。他的睡眠不多，每天的工作完成不了就不睡觉。晚上是他偏好的工作时间，常常翻译到凌晨三点，睡上几个小时起来吃顿饭，再睡一

会儿。“想问题我就睡不着，都解决了才行。”常有人问先生的长寿秘诀，现在看来，是一份自己喜好的工作。

找到书，他迅速翻开，把想到的那个句子一字一句地再念一遍，点点头，好似确认无误了。然后开始讲述这句翻译的每个用心之处。

对待别人批判他的文章，许先生也是这个脾气。翻译是个细致活儿，他就一处一处再纠正了、辩论了，回应对方。1995年，围绕许先生的《红与黑》译本，翻译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论辩，在当时的中国译坛影响极广。这次论辩涉及了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艺术与科学、忠实与创造、借鉴与超越等文学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影响远及国内外学术界、文学界、出版界、新闻界。然而这次论辩，许先生的翻译理论却受到猛烈的攻击。“意译派”是当时给他划归的派别。时任文联作协负责人的冯亦代在其后的香港翻译学术会议上归纳五条许译罪状，言辞激烈。时隔16年，《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发表的一组关于《红与黑》的文章中，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将这场汉译大讨论的结果总结为“‘直译派’获得大胜，而以许渊冲为代表的‘意译派’则落败而归。”这一年先生九十岁，看到文章，立即奋笔疾书以作回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你说的不对我怎么同意呢。”

他也有同意的时候，比如钱先生的话。“我不是不理睬别人的观点，是你没有说服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的眼里容不得模棱两可。

还是《红与黑》汉译大讨论，2009年赵稀方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中为先生说话，“沸沸扬扬的‘《红与黑》事件’所争议的似乎是一个假命题……事实上‘精确’与‘精彩’都是许渊冲提出来的，据许渊冲看来，他们是翻译不可分割的部分。”先生很开心，“有人为我‘平反’了！”但他还是不留情面的回应道：“对不起，‘精确’和‘精彩’不是我，而是罗新璋提出来的，我不过是引用而已，不敢掠人之美。”

“狂”否？先生说，他从不敢自负，而是自信。

3 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P83

“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并无夸大之词，先生指指书架上的文集，“不算最近出版的书，以前这些都有一百多本了，我没有夸张。”这其中，部分书籍在国外出版。他所翻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比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八月底，27册的《许渊冲文集》由海豚出版社推出，皇皇巨著，凝聚他在翻译上的全部心血。

“恐怕我最大的问题在对人上。对自己要求严，对人家也用一样的标准。可能就看人家怎么都不够好。”照君女士在一旁接着说道，“对，他这样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学生也还有学习的空间，他就是太严格了。同时他又非常的自信。所以别人就讲他很狂了。”照君女士和许先生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对先生的缺点既着急又包容。“但他同时又很正直，没有一点儿拐弯抹角。不会因为对方有地位他就不讲话了。即便是校长讲错了他也要站出来跟人家提。他不爱权势不爱金钱，一辈子有棱有角。我太喜欢他这一点了。”许先生耳背，说话又急，常常自己说着停不下来。但在照君女士说话的时候，先生总会停下来，安安静静地看着她，虽然她的音量不高。

##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 ——他热爱美与自由

许渊冲的书架不大，书堆书，里外放了两层。他却总能迅速找到每一本需要的书。“应该是在最下面……”他嘴中默念的间隙已经利索地搬开了外层的书，抽出想要的那一本。

西南联大期间，许渊冲读外文系。“高中的时候我就想以后学什么。我虽然喜欢数学，喜欢打桥牌，但是理科不好。文科不错，就想着读文科比较适合。”一直以中等偏上的状态读书的许渊冲，在高三迁往乡间避战乱的一年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永泰的乡下我第一次开始过自由生活。我们几个同学独自住宿，读书、游泳，好像在中学时代过上了大学生活。”当时浙大是江西学生的主要选择，许渊冲同学的哥哥

便在浙大念书。回来，将自己的所学所得教给弟弟，弟弟再教给同学几个，年轻的心就被打开了一扇窗。“教我们打桥牌、唱英文歌，在河边自由自在，充分享受到了什么是‘美’。那时我16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候，很感谢。这在那时候很难得啊。”

到了西南联大，自由依旧延续。除了名师与益友，他还开始接触爱情。“那时正年轻啊，除了‘美’，还发现了‘爱’。好浪漫的。”法国两年，许渊冲开始多方面接触法国文化，欧洲游历亦是开拓眼界。法兰西式的“自由”与他不断契合。“那里与西南联大是相似的，从学习到生活，全部的自由属于自己。”如今，在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中，“从心所欲”的对“自由王国”的追求始终是他最珍视的部分。几十年不改初衷。

先生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一饮而尽。他喜欢可乐和巧克力，“和小孩儿一样！”照君女士说。甚至端起杯子时的急切，也好似一个玩耍归来大汗淋漓的孩子。他说，自己和杨振宁，都是没有年龄的人。他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分为三个三十年。30岁以前求学，中间三十年教学。50年代，他教英法两种文字，非常忙碌。但是课余时间还是要翻译。但是随后的文革将这个时间也剥夺而去。“他不会干活儿，扫厕所扫不好，红卫兵看见了就打啊。”照君女士当时在隔壁的师范学院，来看他，很苦。最严重的一次，因为翻译毛泽东诗词，被定性“歪曲毛泽东思想，逃避阶级斗争”，挨了造反派一百鞭子。但是许渊冲停不下来，边挨批边翻译。“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相信，我一译诗，就把热、累、批、斗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有‘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到我把全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sup>4</sup>照君女士说，如果没有翻译，他这样性格的人是不会坚持下来的。

三十年间，许渊冲只在百花齐放的短暂时期出过四本书。韶光易逝，他一直念念不忘这被“偷走”的光阴。大部分的译作，都完成于其后三十年。70岁时许渊冲退休，他舒一口气，终于可以全身心的投入翻

4 《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P224

译了。《诗经》、《楚辞》、《西厢记》、《雨果戏剧选》……一本接一本的著作，他终于迎来翻译生涯最辉煌的“自由王国”。

累吗？许渊冲乐在其中。他喜欢杰克伦敦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在于工作。尤其是他所热爱的工作。

“自然给了我们生命，  
智慧使得生活美好。  
美就是真，真就是美。  
美是最高的善；创造  
美是最高级的乐趣。”

在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的篇首，许渊冲选取了这样的欧美哲人诗句开启自己的叙述。翻译与生活，先生的体悟大抵是都在里面了罢。

## 对话许渊冲（以下简称“许”）

记者：“真”与“美”的关系是翻译本体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两点？

许：“真”是翻译的低标准，是必须满足的，但其本身属于一种消极条件。就是说只做到“真”并不够，还需要积极条件——“美”。“美”表现在具体翻译中就是差异性——各有千秋，不分高低。只有这样才是艺术，才满足 $1+1>2$ 。否则便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失掉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特点了。

记者：您将《红与黑》的结尾句译作“魂归离恨天”，意在突出女主角去世时的心境。似乎您的翻译特别注重原作情感的表达？

许：对，这与“王国维的‘境界说’有很大关系。中国诗词有一个特点——‘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句话很重要。一切写景的句子，都有情在里面。只翻出‘景语’，而忽视‘情语’的话，那就是不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啊！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一样的，‘不逾矩’之外还是要有表现主观情感的东西在。”

记者：中文与印欧语言在形式上的差别给翻译中的形式一致增加很大难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许：中西语文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就在于关系代词的使用。外文有关系代词，但中文没有。翻译中如果把外文的代词翻译到中文，那就成了用中文的弱点了。形式的一致并非根本。翻译是两种文字的统一，一是指对等，二是指需要更符合汉语表达方式。化用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我认为“意可译，非常译。”就是说翻译要得到内容，而忘记形式，得意忘形。

记者：您在英、法两门外语上的造诣很深，意大利语您亦有涉及，您是通过怎样的学习方法达到这样的水平呢？

许：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个人的方法，高中时候背了三十篇名人演说词，之后的英文水平就明显进步了。上了大学，每天记一个好句子，然后通过仿写掌握它。每天一句，如果一辈子坚持那就了不得啦。再就是你喜欢就去做，认认真真做，就学好了！分数、学历、压力等等当然要考虑，但不是标准，我大学的时候也重视分数啊，考高了当然开心，信心都大增。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有乐趣，好之、乐之，自然就做好了。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许多问题就可以克服了。要记住，学习是靠自己的事情。”

最后，让我们仍用许渊冲先生在他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中的话作结：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了，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么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 后记：

许渊冲先生一生译著丰厚，成就卓著，而且可称篇篇精华。这里把先生著述整理罗列如下，以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查阅。

中文论著：《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谈》、《文学与翻译》、《译笔生花》等，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

中文著作：《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列入北京大学名家名著文丛）、《逝水年华》。

英译作品：《诗经》、《楚辞》、《论语》、《老子》、《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

诗选》、《苏东坡诗词选》、《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毛泽东诗词选》等。

法译作品：《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诗经选》、《唐诗选》、《宋词选》、《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奥赛罗》等。其中，《唐诗选》、《宋词选》由巴黎出版社在法国发行。

汉译作品：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雨果戏剧选》、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生的开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水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哥拉·布勒尼翁》、亨利·泰勒的《飞马腾空》等。

# 许渊冲先生作品欣赏



许渊冲先生于1984年出版《翻译的艺术》，这本论文集于2006年得以再版。书中收录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83年他来到北京大学之前，在全国外语学刊上发表的20篇文章。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许渊冲先生主要的翻译观点和思想，例如对鲁迅先生提出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的推崇和应用，文学翻译的三个标准（《扬长避短优化论》）和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发挥优势竞赛论》）等等。

## 精彩内容选读

英国诗人Coleridge说过：“Prose is words in the best order; poetry is 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散文是编织得最好的文字，诗是编织得最好的绝妙好辞）。

由于西方文字多是形合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对等，所以西方翻译理论家提出了对等论（或等值论，等效论……），如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可以对等地从英文译成法文：Etre ou ne pas être : telle est la question (Tr. André Gide)，但中文是意合文字，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中文可以和西方文字对等，因此这个名词的前半有好几种中译文：“生存还是毁灭”，“生或死”，“活下去还是不活”，“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死还是不死”。“生存和毁灭”用于集体，“生或死”像是哲学讲座，“活下去”和“活着好”则是课堂讨论，只有“死还是不死”是舞台台词，但“死”和“to be”，“不死”和“not to be”的意义恰恰相反，没有哪种译文可以和原文完全对等。因此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译文不是优于原文，就是劣于原文，劣不如优，所以应该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简称作“优化法”。“优化”和“对等”，这是中西

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sup>1</sup>

“优化论”和“对等论”的不同之处是：对等论认为文学译文应该用对等的译语表达方式；优化论认为文学译文应该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对等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优化论和对等论是相同的；如果对等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那就要舍“对等”而取“最好”或“优化”。换句话说，对等论重真（或似，或忠实）；优化论重美（文学语言）。“真”是文学翻译的必需条件，是个对错问题，不真就不对，真却不一定好，所以只是一个低标准；“美”是文学翻译的充分条件，是个好坏问题，不美的译文不一定算错，但美的译文却是更好的译文，所以是高标准。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应该是美的，如把美的文学作品译得不美，那也不能算是忠实，不能算真，所以似而不美的译文不能算是文学翻译，更不能算是翻译文学。换句话说，文学翻译如只求真，那说明译者还在必然王国中奋斗挣扎，以求生存；文学翻译求美，则说明译者已经超越必然王国，在自由王国中得心应手，寻求享受。<sup>2</sup>

翻译是使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主要解决原文内容和译文形式之间的矛盾。

译诗除了传达原诗内容之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鲁迅在《自文字至文章》中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意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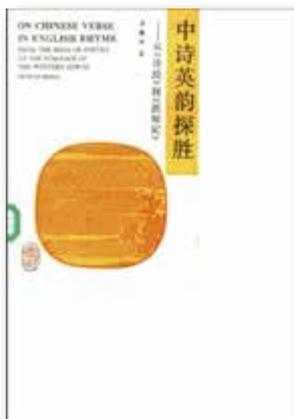
毛泽东说过：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见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我觉得这个原则不但可以用于写诗，而且还可以用于译诗。“精炼”，就是要传达原诗的“意美”；“大体通顺”，就是要传达原诗的“形美”；“押韵”，就是要传达原诗的“音美”。

鲁迅说过：“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格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见《鲁迅书信集》第655页）我觉得这个原

则也可以用于译诗。“内容”就是要传达原诗的“意美”，“押大致相近的韵”就是要传达原诗的“音美”，“有节调”就既要传达“音美”，又要传达“形美”。<sup>3</sup>

总而言之，我提出来的翻译理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美化之势”。“美”指“意美、音美、形美”，就是“三美”；“化”指“深化、等化、浅化”，就是“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就是“三之”；“势”指“优势、均势、劣势”，就是“三势”。换句话说，翻译要发挥译文的优势，改变劣势，争取均势；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或使译文 readable, enjoyable, delectable）；采用的译法基本是深化、等化、浅化；而译诗更要求再现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取得“均势”基本上是“等化”，一般能使读者“好之”；改变“劣势”基本上是“浅化”，一般能使读者“知之”；发扬“优势”基本上是“深化”，一般能使读者“乐之”。这就是翻译哲学的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sup>4</sup>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一书精选从《诗经》到《西厢记》两千年间的诗、词及曲选段100条，按创作年代、重点作者分为14章，每章开头对相关时期和作者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述，每个选段配以两种以上不同的英译，并加以比较；同时许先生对中诗英译的各种路径加以探讨，分析了各种译法的优点和局限。



#### 精彩内容选读

There are one billion people wh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another billion who wield the Chinese, so the translatio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the oth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1 许渊冲，《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翻译的艺术》（增订本），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P18

2 同上，P19

3 许渊冲，《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论》，《翻译的艺术》（增订本），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P87  
注：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4 许渊冲，《翻译的哲学》，《翻译的艺术》（增订本），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P191  
注：原载河南大学《英语学报》1988年第1-3期

of today. As the English is an inflexional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a hieroglyphic one, their transl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asks for translators.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s described by L. A. Richards (1953, p.250) is “very probably 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 It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s is implicit in the former but explicit in the latter.

Difficult and complex as vers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s, different versions began to appear as early as the 18th century. As John Dryden (1631-1700) pointed out, verse translation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is “metaphrase” or word-by-word and line-by-line literal translation as advocated by Ben Johnson. The second is “paraphrase or 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 where the author is kept in view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not to be lost, but his words are not so strictly followed as his sense; and that too is admitted to be amplified, but not altered.” The third is “imitation” or adaptation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assumes the liberty, not only to vary from the words and sense, but to forsake them both as he sees the occasion.”<sup>5</sup>

### 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 (1) THE REEDS

The reeds are luxuriant and green,  
The white dew has turned to frost.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beyond the waters.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long.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in the middle of the waters.  
The reeds are exuberant and strong,  
The white dew has not yet dried.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near the river-bank.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hard.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on a shoal in the waters.  
The reeds are flourishing and lush,  
The white dew is still falling.  
My beloved so dear to me  
Is somewhere near the riverside.  
Upriver I search for him,  
The way is arduous and tortuous.  
Downriver I search for him,  
He seems to be on an islet in the waters.  
Gladys Yang etc. 1983

#### (2) THE REEDS

The reeds grow green;  
Frosted dew drops gleam.  
Where's she so sheen?  
Beyond the stream.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long.  
And downstream, lo!  
She's there among.  
The reeds turn white,  
Dew not yet dried.  
Where's she so bright?  
On the other side.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hard.  
And downstream, lo!  
She's far apart.  
The reeds still there,  
With frost dews blend.

5 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12

Where's she so fair?  
 At the river's end.  
 Upstream I go,  
 The way does wind.  
 And downstream, lo!  
 She's far behind.  
 X. Y. Z. 1988

### (3) COMMENTARY

James Legge said, "This piece reads very much like a riddle." "Someone tells how he sought another whom it seemed easy to find, and yet could not find him." If we believe what he said, this poem may become a narrative dealing with friendship. But most Chinese critics agree that this poem is a love song, opinions differ only as to whether the lover is a man or a woman. Yang uses "him" but I use "she" and most Chinese critics are on my side.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three stanzas describe the season when the reeds turned from green to frost-white. The dreariness of autumn may be easily associated with the weariness of the man in search of his love. The next two lines tell us vaguely where his love is without describing her physical beauty. The last four lines depict his fruitless, hard, long journey in search of his love. The harder and the longer his journey, the more beautiful she would appear, not only in the eyes of the searcher but also of the reader. This method may be called "non-descriptive description" an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is piece with Byron's Beauty's Daughter:

There be none of Beauty's daughters  
 With a magic like thee;  
 And like music on the waters  
 Is thy sweet voice to me.  
 When, as if its sound were causing  
 The charmed ocean's pausing,  
 The waves lie still and gleaming  
 And the lulled winds seem dreaming.

If the English beauty is like music on the waters, then the Chinese beauty may be likened to music beyond the

stream.<sup>6</sup>

2005年，许渊冲在翻译理论著作《译笔生花》中，又附上了新译本，这也是他最为满意的一种。

### THE REEDS

Green green the reed,  
 Frosted dews gleam.  
 Where's she I need?  
 Beyond the stream.  
 Upstream I go,  
 The way's so long.  
 Downstream I go,  
 She's there among.

White white the reed,  
 Dews not yet dried.  
 Where's she I need?  
 On other side.  
 Upstream I go,  
 Hard is the way.  
 Downstream I go,  
 She's far away.

Bright bright the reed,  
 With frost dews blend.  
 Where's she I need?  
 At river's end.  
 Upstream I go,  
 The way does wind.  
 Downstream I go,  
 She's far behind.

而在文学译作方面，除了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汉译英《不朽之歌》外，还有《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西厢记》和《毛泽东诗词选》等英译或法译。其中英译《楚辞》和《西厢记》分别誉为“英美文学的高峰”，“可与莎士比亚的杰作媲美”，外译汉则有福楼

6 同上，P61-63

拜《包法利夫人》等世界文学名著十种。现摘选部分精彩译文如下：

### Farewell to Vice-Prefect Du

You leave the walled capital  
For river shores where mist veils all.  
We part, officials far from home,  
Over an alien land we roam.  
If you've a friend who knows your heart,  
Distance can't keep you two apart.  
At crossroads where we bid adieu,  
Do not shed tears as women do!

Wang Bo

Tr. X. Y. Z

###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sup>7</sup>

### Drinking Alone under the Moon

Amid the flowers, from a pot of wine  
I drink alone beneath the bright moonshine.  
I raise my cup to invite the Moon who blends  
Her light with my Shadow and we're three friends.  
The Moon does not know how to drink her share;  
In vain my Shadow follows me here and there.  
Together with them for the time I stay  
And make merry before spring's spent away.  
I sing and the Moon lingers to hear my song;  
My Shadow's a mess while I dance along.  
Sober, we three remain cheerful and gay;  
Drunken, we part and each may go his way.  
Our friendship will outshine all earthly love,

Li Bai

Next time we'll meet beyond the stars above.

Tr. X. Y. Z.

###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sup>8</sup>

李白

### Tune: "The Beautiful Lady Yu"

Li Yu

When will there be no more autumn moon and spring  
flowers  
For me who had so many memorable hours?  
The east wind blew again in my garden last night.  
How can I bear the cruel memory of bowers  
And palaces steeped in moonlight!  
Carved balustrades and marble steps must still be  
there,  
But rosy faces cannot be as fair.  
If you ask me how much my sorrow has increased,  
Just see the over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

Tr. X. Y. Z.

###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sup>9</sup>

7 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唐诗三百首新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P3

8 同上，P108

9 许渊冲译，《李煜词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THE PASS OF MOUNT LOU

Tune: "DREAM OF A MAID OF HONOR"

February 1935

The wild west wind blows strong:  
 The morning moon shivers at the wild geese's song.  
 On frosty morn  
 Steeds trot with hooves outworn  
 And bugles blow forlorn.  
 Fear not the strong pass iron-clad on all sides!  
 The summit's now surmounted with big strides.  
 Surmounted with big strides,  
 Green mountains like the tides:  
 The sunken sun blood-dyed.

Tr. X. Y. Z.

忆秦娥 娄山关

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sup>10</sup>

《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

这本书是许渊冲的回忆录。全书共21章，前面15章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事，后面4章回忆留学巴黎的事，还有2章讲近些年的事。



精彩内容选读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副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历史是铁面无情

的。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的呢？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sup>11</sup>

参考资料：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增订本），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

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

许渊冲译，《李煜词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许渊冲译，《毛泽东诗词选》（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唐诗三百首新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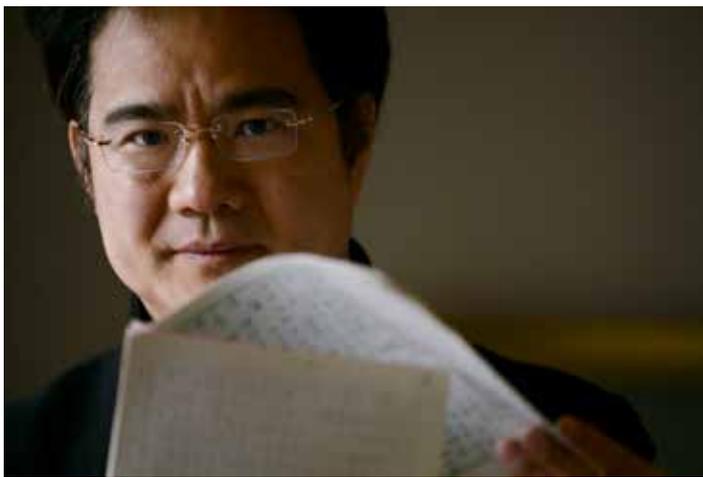
10 许渊冲译，《毛泽东诗词选》（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P40-41

11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P5-6

## 穿梭于中法之河的两岸 ——董强老师谈翻译

董强，1967年生于杭州。198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专业，1988年赴法国留学，旅居巴黎12年，师从米兰·昆德拉，1989年获法国文学 DEA 学位。1995年在法国协助创办以专门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为宗旨的出版社“中国蓝”出版社。1997年在巴黎第八大学以研究法国20世纪超现实主义诗人、画家亨利·米肖的论文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2009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荣誉勋章。同年开始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主席。2012年起担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

2013年六月，法兰西学院将“法语国家联盟金奖”授予董强教授，以表彰其为弘扬法语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是全世界法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



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亨利·米肖，也许你并不知道诗人波德莱尔是何方人士，再或许，你对巴洛克艺术仅仅略知皮毛，也不太懂法语，但所有这些，都不妨碍你去阅读法语译著，了解法国文化。而优秀的译者，可使这过程变得更为简单而美丽。董强，便是这样一位穿梭于中法之河的舵手，通过译笔来联通两岸风景。一直以来，董强的名字与“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联系在一起，与《奥林匹克宣言》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熟知的大作家米兰·昆德拉联系在一起，与几十部译著联系在一起。是对法语的喜好，对语言所承载之内容的热爱，还是对文化交流的责任心，让他渐渐蜕变成一位翻译路上的行吟者呢？

### 与法语结缘：无心插柳柳成荫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期，正是在这时，杭州的外语类高考状元董强面临着进入大学的专业选择。董强在上大学前没想到要学法语，甚至专业都不是自己报的。“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不愁招生，但法语比较冷门，学校担心没人选择法语，拿走了一些成绩好的学生的资料直接录取。所以我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法语专业。”

在北大的时光，董强过得踏实而稳定。五年后，即1988年，他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得到公派法国留学的机会，一去就是十二年。

刚到法国，董强面临种种不适应。当时的中国没有现在开放。在一个相

对封闭的环境生活了太久的董强，出去之后面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新鲜和冲击并至。他学到许多在中国没有的东西。学业上，法国没有封闭式校园，学生们直接生活在社会中，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天天去直面异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董强心理上有很大的不适应；语言上，董强在中国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内容，语法虽然准确，但“过于标准的词汇，法国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僵硬，仿佛一个老外在用唐朝的词，中国人虽然很佩服，但也会觉得太不常用。”

这些挫折并没有使董强退缩，他一步步走过在法国的艰难岁月。“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东西听不懂，有一阵子甚至对文学都很厌烦。但是没有停止吸收，后来有一天就好像这些东西经过了在内心的发酵，突然成熟了。开始觉得之前吸收的东西蛮有意思。从前的了解很模糊，那就去查资料。查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新的东西，很有意思。”正是这种反复的觉悟和强烈的求知欲，使得董强一直在发现与探索的道路上前行。除却课业学习，他还尝试接触各式各样的法国人，将自己真正浸入了法国生活中。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的平衡。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在于表达一个人的内在需求，“一个工人的需求与艺术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话方式和内容都会有很大的差别。”语言背后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经历了这个过程，法语成为董强可以游刃有余去把握的东西，一个可以通过表达而发挥其作用的东西。

法语以偶然的方式与董强相遇，促使其逐渐了解法语的内涵及法国文化。翻译也一样。他和翻译的相遇也是一个很随机的过程。“我没想过成为翻译家，我更喜欢创作。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用中法双语创作的。”1997年，三十岁的董强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书中的内容是他学习法语才五六年的时候写成的，中法双语，还配上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几年之后，碰巧一个朋友要翻译一本书，翻译了几页就晕头转向，无法进行下去了，于是拉了董强前去帮忙，接替他来完该书的翻译。董强这才与翻译有了交集。当时的他凭借良好的语言功底，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穿梭，所以对翻译并无太多重视。而最近几年，伴随着自己的不断成长，也因为看到了中国法语翻译不容乐观的现状之后，董强感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法国的十二年生活让他成为了一个舵手，一个可以看到河两岸之不同的舵手，他要让河两岸的人都看到对岸的风景。于是他提出了“外语人”的概念，翻译便是外语人的责任之一。“这以后，翻译便上升到了觉悟和意识的层次，我希望把它当作传递文化的工具，做得更加深入。”

### 翻译的境界：体现价值是根本

每一位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翻译风格和看法，董强也不例外。“我并没有说按照哪一种理论来，也无意去建构一种理论。我想强调的，是作品的价值。特别是其内在价值，以及现在与将来的社会价值。如果一定要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依循的

是‘价值论’。只要你抓住了作品真正的价值，在译本里面让人感受到其价值，那么就是好的译作。”

让翻译的作品有价值，很多人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但有时在学术氛围里浸淫太久，难免会产生脱离实际的现象。“我认为翻译的作品要学以致用，要‘用’的话就要有远见，所以就要预知这本书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对中国有用，希望有一天读者发现，一本重要的书其实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本，这样会有一些成就感和自豪感。翻译的书一定要有历史和社会价值。”在这对“用”和“价值”的追求之上，董强老师也放不下对经典的追求，“我也想翻译一些经典的东西，但经典的东西会很花时间，现在我手头事情太多了，希望以后可以静下心来翻译一些心中的名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便会明白，一个艺术家的声望能够经历时间的磨砺，流传至今或者沉寂之后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有价值，不是因为其个人的私生活，也不会因为一时的炒作。评判一部作品需要历史的眼光，否则就是作品的堆积。在董强看来，“翻译就是批评加艺术史评判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在具备了母语和他国语言的眼光之后，便产生了一种传递的需求。对作品本身的评判，以及看到了它在文学史或思想史上的地位，你就在自己的视野当中觉得它在我们的文化中也会具有地位，在我们的文化中也会遇到知音，才会产生翻译的需求和行为。我强调价

值和视野。视野就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基本把握，知道什么是强项和弱项，会有什么闪光点。价值不是独立的，还会产生新的价值。西方某种有价值的作品进入中国之后，在新的背景中，一定会产生新的价值。这才是文化有意思的地方。翻译家的作品也是，他能让一个作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产生新的价值。”

### 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才能做好翻译

翻译自严复以来一直讲求信、达、雅。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在阅读翻译作品的时候，对达和雅会有直观的认识，往往很少有人有能力去考究“信”的问题。董强教授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功，考察了翻译家的水平，也衡量了翻译家对于原著的忠诚度。“对我来说，翻译里面所谓的“信”，也就是讲究对等，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语言肯定可以提供对等，也即可以翻译。肯定有东西在翻译过程中会失去，但不要盯着那失去的东西，要尽量表达你所能表达的东西。我这里强调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下就是指语言的物质层面，这在原则上都是可以做到可译的，虽然有时候会啰嗦或笨拙。有些人过度强调形而上的部分，掩盖了他没有做到“信”这一基本功。只要基本功做到了，就没有难以翻译的东西。我强调对等，也就是一定要忠实，忠于原作。尤其在国外

待得时间越长，越长时间地沉浸在语言环境中，就越会觉得“信”是绝对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总是抱怨老外不理解我们，他们在陈述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时总会有些片面，那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东西全，他们看到的东西偏。“信”就是要尽可能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去看全，在这个基础上的传递，肯定比那些不了解的人要强。”

董强在对译著原作的选择上有很大程度也是出于“用”或责任的考虑。“我翻译的东西是相对生僻的，我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作品得了个奖就去翻译它。我的译著是有标准的，第一我觉得它有用，第二是出版社在中国转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可以翻译的那些作品，我觉得翻译这些这是我该做的。”

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是一个翻译蓬勃发展的时代，通过译著引入了大量国外的文化和思想。相比之下，现在的翻译处在一个低谷时期，但总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董强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不认为自己是做翻译的，但由于我对语言的认识，对两国的认识，和对时代的认识，我选择性地翻译一些东西。所以内容比较广，涉及许多领域，当然主要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一直觉得当今中国对这个太不重视了，一个不重视翻译的国家只看到自己，总的来说会造成一个狭隘的局面，没有世界眼光。现在我们不能算一个文艺的大时代，所以翻译也不可能辉煌，但翻译总得有人做，因为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我们很少有

人没有受到过翻译的影响。如果没有翻译，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不会是这样的。我相信未来有一天对翻译的重视会带来文化的新繁荣。”

### 法国文化：理性与感性的高度和谐

法国以浪漫风情著称于世。当置身法国尤其是巴黎时，会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怡然自得的文化气息。法国的宗教气氛，法国的绘画、雕塑、音乐和建筑，法国的哲学、文学和美学，法国的葡萄酒、香水和时装，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无一不是它丰富而充满魅力的文化之组成部分。

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董强对法国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评价说，法国文化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和谐。从理性时代的笛卡尔，到浪漫主义的雨果和超现实主义，感性和理性始终以一种完美的平衡呈现。这样的平衡，体现着法国文化对艺术创新和艺术表达的重视。时至今日，各种相关机构和保护措施，仍是使这艺术与自由之独特性得到展示和保存的依托。

在董强看来，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文化处在一个不那么繁荣的状态。董强希望，人们能够在物质等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再次感觉到文化的重要性。

“恒定性”是董强对法国文化的一种体会，但同时他又深感文化有着其多样性的一面。“比如普鲁斯特和萨特说话是不一样的；萨特和福

柯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都是哲学家，生活的时代差不了太多。”文化的难以把握在于多样性，很多人放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许多国人喜欢法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时观者喜欢简单化处理，说喜欢看法国电影，往往指的是一种类型，也便好像法国电影只有一种风格一样。应该认识到法国文学所蕴含的丰富多样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我们在恒定地看待法国这个文化体系的同时，一定要看到它各个领域的多样性。”

### 知性地生活：做文化交流的使者

能在翻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董强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视作关键。“在法国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要做好一个译者，或者说学好另一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深入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发现这一点后我就去补了很多中国文化的课，大有裨益。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积累，我是无法做出今天这些成绩的。”

董强兴趣广泛，书法创作是一大爱好。在揣摩书法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对行书的兴趣；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他爱上了宋、明时期的艺术。2006年4月，董强两次在巴黎举行讲座，第一场以《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空间问题》为题，从古代最早的山水画讲起，以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画论为依据（宗炳的《画山水序》、郭熙的《林泉高致集》，以及石涛的《画论》等），详细地讲述了中国古代山水画演变的各个阶段，并与西方绘画作比较，强调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哲学、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以及画家如何运用“散点透视”、“三远法”等手段，营造出特有的诗性空间。第二场则讲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及其影响、“水”的象征意义、“扁舟”和“渔夫”的象征意义。董强专门到法国讲述中国文化，勾起了华人华侨的思乡情结，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受到国内外观众们的好评和称赞。

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董强也有意地“拿进来”。说起人人熟知的奥林匹克，董强和它的缘分也不浅。2008年1月1日，在顾拜旦诞辰145周年之际，中、法、英三种文字的《奥林匹克宣言》通

过《文明》杂志在中国首发。同时，《奥林匹克宣言》朗诵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宣言》在中国发表，是我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每四年有一个国家举办奥运会，有不少人关注体育赛事，但很少去探究奥林匹克精神。英文文本的《奥林匹克宣言》也仅限于专家范围内阅读，并不能为中国人完全理解，董强作为第一译者，不仅向中国人传达了奥林匹克精神，更是体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强是一个用心体会生活的人。对于他来说旅行也是如此，不是简单地走景点看古迹，而是对文明有种感性的认识。全世界文明都有各自的特点，只有融入文明，才能仔细的体味。董强也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听说日本的生鱼片和亲自吃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这也就像杜甫说的“行万里路”，董强的旅行已经能让他对世界上的各种生活样态都有所感知。“人的知识就是靠相似性和实际经验的互相融合。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可以想象了。纯想象总是比不过有经验的想象，但有时候经验多了又会束缚人的想象。所以这其中有一个平衡。旅行可以给人提供一种经验，给人更多的机会接受这种可能性和多样性，让人看到更多的层面。”同样，对于专门研究一个国家的专家来说，“对该国家的了解越透，见过的人越多，读过的书越多，了解的风格越多，就越不容易出错，而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参照，会从一开始就犯错。这样的人，就算文笔再好，都不会成功。”从这样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董强对于法国文化，对于旅行中的感悟，是顺其自然的，更是一种升华了的自觉。

在不太忙的时候，董强会回归自己的家乡，给中学生讲述法国文化和在法国的经历。他希望身体力行地做一些事，一些更好地扎根这个社会的事。他希望自己珍视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可以分享予更多的人。

### 后记：

作为一个获得他国文学最高荣誉的文学家、翻译家，董强教授著述丰富，内容横跨中西文化。这里把他的著作整理罗列如下，以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查阅。

专著：《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中文）、《亨

利·米肖：内与外》(法文)、《松绑的手》(诗集，法文)

汉译作品：《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宗教理念与信仰史》(第三卷)、《西方1500年视觉艺术史》(共6卷)、《西方绘画中的流派》、《小说的艺术》、《身份》、《波德莱尔传》、《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浪漫主义艺术》、《古典主义与巴洛克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巴黎》、《世界宗教理念史》(第三卷)等。

## 【背景链接】

### 法兰西国家联盟大奖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最初由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设立，旨在吸纳法国文学界和思想界泰斗加入，以捍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后由国王

亲辖，亲自任命院长，是法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法兰西学院每年颁发60多个大小奖项，涉及人文、艺术、科学各个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中有21项为大奖。“法语国家联盟金奖”在所有大奖中排名第二，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1986年，加拿大政府设立基金，委托法兰西学院设立“法语国家联盟大奖”，旨在全世界范围内奖励一位为法语和法语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术界人士，法国政府和其他一些法语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相继响应，参与基金的投入。由法兰西学院院士组成评选委员会，每年作为该学院第一大奖项颁发；法兰西学院为此同时设立“法语国家联盟金奖”，以学院本身的名义奖励给一位做出同样贡献的人士，在整个大奖排行榜上高居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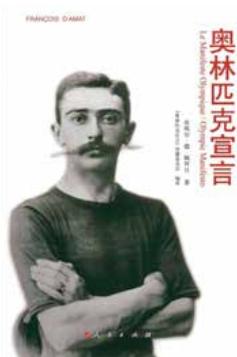
## 董强教授译作欣赏

董强的译著体现了他中法双语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迄今已有二十多部法语作品经他手翻译成中文，包括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董强的译笔传神典雅，忠于原文，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寻求中文和法语最恰当的衔接，保证读者在阅读译作的过程中能有和阅读原著同样的感受。

### 《奥林匹克宣言》(节选) 顾拜旦著 董强译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如此悲剧性地开始，又在当今一种动荡不安的和平之中行将结束，延续了一个智力活动极其丰富而体育锻炼确实贫乏的世纪。或许有必要从这个巨大反差中寻找那些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是注意到，18世纪末各地不再进行剧烈运动和男士们的竞技活动，人们去别处寻找消遣与快乐。从这个角度看，英国那里的状况尤其令人惊

讶。人们不再像处在都铎王朝时代那样充分享受户外活动，不再陶醉于大自然之中，那时候托马斯·阿诺德和其他田径教育的创始人尚未出现。要不是拿破仑前去像北风阻止冰雪消融般地巩固了大不列颠，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就不会如此鲜明，他们身上混合着的天生粗暴与萎靡不振，很可能是衰颓的前兆。在法国，网球场荒废了，人们在里面交换誓言，而不是在打球。一个时代远离而去：那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德·古贝维尔老爷在科唐坦的沙滩上打球，身边围着一群周边村庄的健壮小伙子；在一个又一个乡村教区，人们热衷于传统的角斗和摔跤活动，西梅翁·路切先生查阅到的羊皮手稿中描述了这些情景。那时候，阿弗朗什



的教士们每年都在宗教节庆期间,成群结队来到沙滩上痛快地打一阵曲棍球。所有这一切在督政时期都消失了。曾几何时,带着对古希腊的怀念,督政府希望在巴黎的战神广场上组织某些能够使人想起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活动,但缺少一个必须具备的因素:竞赛者。总是会有人来参赛,像小孩儿们那样来到热闹的大市场,争先恐后爬上挂有奖品的彩杆,为了赢取传统的羊腿或者甜烧酒。然而,这些活动不足以形成运动会,缺少一个体育俱乐部和一个法国体育场来组织支撑,督政府举办的赛跑活动实际上是昙花一现,也就是持续了一个早晨。

事实上,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边境,甚至在边境以外更遥远的地方,在金字塔脚下,在多瑙河边,在西班牙,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墙下,法兰西的战士们历经长达20年勇猛而悲壮的战争史诗,向世界展示了前所未闻的、最卓越的强健实力。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他们耗尽了整个民族几个世纪积聚起来的力量。战士们倾洒的鲜血,是那些打网球人和德·古贝维尔老爷的鲜血,决不是懦弱者的,也不是摄政时期那些放荡者的,这是法兰西的热血,在城市变得污浊,在乡村依然纯净。

还有,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战士是怎么样的吧,在他们用尽最后力气的时候,居然还会生出新的力量!

啊!在这长年累月英勇征战之后,法兰西是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呵,上帝!我们是多么理解,为何人们不去锻炼疲倦的肌肉,却玩起了多米诺骨牌游戏。法兰西就是这样沉浸在胜利之后,陷入酣睡。然而在她旁边,一种阴沉、彻底、可怕的失败却唤醒了一些人的能量,他们为建立那个诸位所知道的目标——德意志帝国而疯狂努力。于是,在柏林产生了军事田径运动。<sup>1</sup>

### 《记忆的群岛》(节选) 保罗·安德鲁著 董强译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时间像一道平静的水一样流过,没有终结,漠然而无动于衷。我有时候会在脑中完全停止工作,不再看到任何东西,不再听到什么,不再感觉疼痛,不再抱有希望,就这样在空无中待着,只是努力地感受时间从我的一个脸颊到另一个脸颊流过,并在脑子里跟踪一个瞬间的流逝,仿佛我与它有足够的距离,可以观察到它,仿佛在透明状

态中,它可以显示出它的内在运动。我从未做到过,也许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的努力,无论怎样集中,都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一个瞬间跳跃到另一个瞬间,就像一个轮辐被扭曲之后的轮胎的转动。就像在一条不



平整的、因雨水而变糟糕了的道路上,手强力地抓住刹车挡时造成的震动。先是一阵突然的震动,遍布全身,身体一下子动用全部的意志,又一下子将之全部耗尽。一个热烘烘的、野蛮的声音。接下来,在一种依然令人担忧的、向正常状态的回归过程中,震动开始没有那么连续,但依然强烈,直到最后,手开始松开,时间又开始它漠然的流程。也许对我来说,没有现时,只有过去,在遥远的遗忘和应当成为瞬间的东西的痛苦的不可能性之间摇摆。在清晨的宁静中,在因夜晚的汗水而潮湿的床单的清冷中,有一段非常短促的休息时间,让我相信,平静和宁和已经回来,现时可以被触及到、被感知。于是,可以听到一些新的声音,就像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天空中飞机穿行的声音,远远的轰鸣声,旋涡刺耳、沉闷而交替形成的声音流,渐行渐远,渐渐变弱,直到最后,成为一道萦绕不去的东西,我有时会觉得它就是第一道记忆之流。这一感觉会马上被一种明显真实的、非常弱,但又十分明确的感觉所纠正:其实它只是在时间光滑的伸展中一道极小的折皱而已。正是在这一消失中,我离现时最近。接下来,很快,一种新的忧虑升起,并开始弥漫:我呼吸的声音回响起来,占据整个空间。仿佛我成为这一切的责任人,仿佛我的意志已经被调动,以让它持续,仿佛这将永久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职责,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职责,必须去维持在我的肺部、胸口以及永远半张着的嘴唇之间流动的这道空气流。每当我想遗忘或者变得对此无动于衷,就会有一种即刻的窒息感告诉我,必须是这样的。我必须做好几次深呼吸,逼着我的思想远离,直到这一切最后终止,直到最后我进入一种水状的睡意中,化去疲

1 摘自《奥林匹克宣言》第一部分

劳、恐惧，以及焦虑的精髓。<sup>2</sup>

### 《身份》(节选) 米兰·昆德拉著 董强译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位看不见的观察者的嘲讽的目光，一回到家中就向衣橱走去。她看到她的那一堆胸罩，有件东西让她吃惊。当然，昨天她就发现了这一点：她的围巾没有像她折的那样折叠着。她昨天那种兴奋的状态使她很快就忘了这一点。可这一次，她不能让这一只不是她的手留下的蛛丝马迹从她眼皮底下溜过。啊，太清楚了！她读那些信了！他在监视她！他像个间谍一样在窥视她！



她心中充满愤怒，冲着不同的对象，冲着那个陌生男人，他也不说声对不起，就拿一些信来烦她；冲着她自己，居然傻乎乎地把它藏起来；也冲着窥视她的让-马克。她取出那堆信，走向（她已经多次这样做过！）洗手间。在洗手间撕毁它们、扔到水里冲走之前，她又看了最后一遍。她越看越有疑心，觉得笔迹很可疑。她仔细检查一下，每一次都是同一种墨水，字符都很大，微微向左倾斜但每一封信又都不同，仿佛写信的人没能保持住同一种字体。这一观察让她感到十分惊讶。她不撕信，坐到桌前，又读起来。<sup>3</sup>

### 《厄瓜多尔》(节选) 亨利·米肖著 董强译

海洋，你的表面若是可以承载一个人，人们可以将你做成多么漂亮的玩具啊！因为你的表面时常似有一层坚实的膜，令人咋舌。

我们可以在你上面行走。在起暴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在你高耸的浪坡上飞快地滑上滑下。

可以坐雪橇。甚至直接用脚。

谁独自一人在大西洋的一大块浪上冒险，可是够勇敢的，一个人，带着一只小羊，或者一头驴，在鞍

的两边再放上一袋饼干，或者就像以前一样，骆驼商队，许多骆驼商队。

突然来一阵暴风雨。一会儿之后，所有的驴腿都折断了，暴风雨让它们跪下，然后摔到浪面上，就像火腿一样。（同时被摔倒的还有那些像一个屁一样快速出发、到海上去捕海蛇的人……）

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沙漠，这令人气喘的沙漠！宽广的海平线突然开放，可以在上面滑旱冰。可是，在远海上突然掉了一只冰鞋的滑轮的人，可就惨了。很快，滑轮就不见了，一个浪头吞没了它，另一个浪头又卷走它，然后那人就在后面追，而它总是又看不见了，而且那人脚下只剩下了三个滑轮，却还要滑。

暴风雨中在加勒比海上折断了一只滑轮的人，可就惨了。他到了一个浪尖突然滑不动了，摔倒在边上，手臂瞎摆，再次掉入浪底，但是，带着那么一线最后的希望，他保住了自己的四肢。啊！一分钟的休息！要是能有足够的时间换上一个滑轮该有多好！但是，像闷罐一样不理睬他想法的浪头，但是，像皇帝一样不理睬他想法的浪头，将他卷起，连同他的三个滑轮，还有另一个滑轮的残骸，高高地抛起，大笑着，在它们之间互相传来传去，而且玩得很开心。

而他呢：就像一条山沟里的自行车运动员。可是山沟突然鼓起，变成了高山，让他一下悬空，又把他扔到山底，然后，山底又变成了高山，把他高高举起，再把他扔到边上，然后，高山又变成了山沟，山沟、高山，高山、山沟，滴答、滴答……

在他的紧身套衫下面，肋骨已经断了，他觉得整个脊背好像拍在了硬板上，嘴角出现了血，好像在说，很严重，必须叫个医生来。

可是，哪个医生会来加勒比海呢？<sup>4</sup>



2 摘自《记忆的群岛》第五篇

3 摘自《身份》第29章

4 摘自《厄瓜多尔》第二章

## 北大翻译百年掠影： 那些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什么是翻译？就方梦之先生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的定义来看，翻译若作“翻译过程”讲，指的就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这个定义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的“社会认知需要”；其二，翻译的媒介物存在于“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其三，翻译的性质是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sup>1</sup>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一起探寻北大翻译百年渊源背后，那些行走在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上的身影。

康有为在1912年写的《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一诗的第一句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林者，林琴南，林纾也。其人未出国门一步，不懂任何外语，1897年和王寿昌（子仁）合译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于1899年2月，一时风行海内，不胫而走。而这位被誉为与琴南先生有并世之才的严某，正是191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不久后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校长的严复。



严复（1854-1921），初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后改名为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其父是乡间儒医，在他十四岁时死去，家境转穷。他便考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楨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与航海术之类。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曾涉足沿海各省和南洋、日本诸国。1877年，又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两年。期间，他还曾到法国游历过。

直至甲午海战中中国惨败，才使得他惊醒和激奋起来。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政论文，提倡通过创立议院和推广西学的办法来救中国。而最使他一举成为全国著名人物的，是他在1898年发表的译著《天演论》（赫胥黎原著）。他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思想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就在翻译《天演论》的同时，他还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对后世

---

1 方梦之主编；张顺梅等编，《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P9

的翻译理论影响颇深。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的《社会通论》、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sup>2</sup>

虽然严复的译学理论上存在不少问题并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翻译实践，但是他大力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其实是抓住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而严复之所以在我国近代译坛占有独特的地位，是因为他从步入翻译生涯之初，即以译介西方先进思想改造中国为己任。在他所译的八部西书中，内容包括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他的这一工作，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世界观，对当时和“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sup>3</sup>

不过，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将西方先进的思想引入到中国，启我国民固然有益，而通过翻译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就其难易程度和经验的缺乏而言，其重要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许还更甚于前者。1915年受聘于北京大学，主讲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先生便是我国将中文经典译介给西方的一位著名学者。



辜鸿铭（1857-1928），又名辜汤生，福建同安（今厦门）人。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侨世家。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少年时便跟随义父赴英国求学，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兼精中华文化的他非常热衷于把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艺术、道德与政治介绍给西方，在他的努力下，《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著述被译成英文，并且迅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目，在很多欧美国家掀起了不小的汉学研究热。

除此之外，辜氏还用英文翻译过《春秋大义》，撰写过《尊王篇》与《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二书。在英诗东输的初期，他用五言诗体翻译了英国诗人柯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长诗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可谓是起到了先驱的作用。<sup>4</sup>

然而，幼年即出洋留学，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西方化的辜先生，虽说得一口流利英文，却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文化，甚至连纳妾、裹小脚、留辫子等也不愿意放弃的保守主义者。而这一点，恰恰与是时正风起云涌的五四浪潮有些格格不入。有趣的是，日趋东渐的西学势力和传统保守的儒家根基的斗法的另一边，领头的正是与辜先生彼时同校为师、极力倡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号召学习西方的胡适先生，而这所学校，便是彼时由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由陈独秀先生任文科学长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1894年开始涉猎外国译著和有关新学著作，1898年开始学习日语，1899年又学英语，1903年学德语，1913年学法语，1923年又学意大利语，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基础。他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译著虽不算多，但也有诸如1902年办爱国学社、编《警钟日报》时，从日文翻译或转译的《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伦理学原理》等有关哲学和伦理学著作传世，其中《伦理学原理》更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课外精读书籍之一，足见其影响力。<sup>5</sup>



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留日。他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家。除了翻译实践，他的贡献主要是表现在他担任《新青年》的主编时组织团结一批译者，为译介外国文学提供了机会和阵地。由他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对“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产生过推动作用。<sup>6</sup>

2 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P117-118

3 方梦之主编；张顺梅等编，《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P416

4 同上。

5 同上，P418。

6 同上。

就具体的译作而言，他在190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很可能就是他最早的译作。陈氏1901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据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目目录》称，陈独秀曾翻译过日本斋藤鹿三郎的《地理教授法》一书，可能就是这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不过从其署名上看：“皖怀宁陈乾生重辅编辑”的字样，表明他不只是单纯的译者，还有所加工，也是编者。之后，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上即刊发了如俄国屠格涅夫的《春潮》，美国马克威·斯密士的《青年论》，以及他本人翻译的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以后每卷各期的翻译作品都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亦不乏他本人的译作。除此之外，另有零星由他参与编译的单行本出版，如1904年他接棒苏曼殊翻译的《悲惨世界》等等，均获不俗评价。<sup>7</sup>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著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戴东原的哲学》、《国学文学史》（附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尝试集》、《尝试后集》、《短篇小说集》等，编选有《词选》。<sup>8</sup>

其中，《尝试集》和《尝试后集》中收录了不少译诗，如《哀希腊》、《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篇，而这之中，《老洛伯》一诗更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译诗，可见他对我国译事所做之贡献。同时，胡适还非常重视西洋短篇小说的翻译，并且从1930年起，由他主持、由丁文江、赵元任等诸多知名学者参加的编译委员会更是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名著的计划，成果斐然。

胡适一生对翻译也发表过一些见解，虽然谈不上是翻译理论方面的大家，但是他在文学革命、新文化

运动初期的一些看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有一对兄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二人便是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俩。他们的生平、事迹想必是人尽皆知的，这里便不做过多叙述了。他们都是跨越近代文坛和现代文坛的佼佼者，虽然三十年代以后，两人逐渐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这二人在清末和新文学运动初期仍然是携手进行翻译活动，译介欧洲新文艺作品并提出了一些颇为重要的译学见解的，比如说强调翻译工作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重大意义以及翻译文学作品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主张直译等等。



鲁迅主要的译学论著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关于翻译的通信》、《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论重译》、《再论重译》、《非有复译不可》、《“题未定”草》。并且，他的翻译活动贯穿他战斗的一生，自1903年他二十二岁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他总共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共计300余万字，其翻译作品的范围之广、体裁之多、数量之巨，在我国翻译史上均是罕见。



周作人的翻译始于留学日本之时，并多与其兄鲁迅合作，后因一些私人事宜遗憾告终。其中两人合译的作品如《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等。而由周作人单独译出的作品有（波兰）显克微之的《酋长》、《炭画》，并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等。解放后，多从事翻译工作，新译和修订旧译多种。对于译学理论方面也是贡献良多。<sup>9</sup>

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年的时间，但却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启蒙的时代，一个文坛和译坛上名家辈出的时代和我国的翻译理论方面取得

7 转自翻译家李季的博文，“陈独秀的翻译功绩”，[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de7c1e0100s4wc.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de7c1e0100s4wc.html)

8 同注释7，P423。

9 同上，P419-421。

较大进展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和周氏兄弟一样，很多曾经任教或者受教于北大的文学大家，往往在翻译的领域也是明星巨擘，大多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和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进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影响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均可见一斑。



林语堂（1895-1976），原名林和乐、林玉堂，福建龙溪人。他早年便在教会小学读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英文，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留学，后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

究语言学，故而对英文和西方语言学造诣颇深。1923年回国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写作等工作。曾经参加鲁迅支持的语丝社，为该社撰稿，针砭时弊。三十年代曾创办或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称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

林氏一生中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章颇多，堪称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贡献之最者。其最有名的译论当属长篇论文《论翻译》，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并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sup>10</sup>他的中、英文著译笔法娴熟，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冥寥子游》、《不亦快哉》、《东坡诗文选》、《幽梦影》、《板桥家书》、《老子的智慧》、《浮生六记》等。



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西滢是他为《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撰稿时使用的笔名。16岁那年即赴英国留学，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政治经济，获博士学位。

1922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执教。他与王世杰、周鲠生、杨振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主编该刊的《闲话》专栏。主要译作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梅立克小说集》、《少年维特之创造》等，并著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等。1929年，陈氏在《新月》上发表了《论翻译》一文，借鉴了美术创作中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

中国译论史上是具有创见意义的。虽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颇受争议，与鲁迅先生的论战一时间也将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确实配得上“现代中国翻译界一帖对症的良剂”（曾虚白语）这一称号。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为生计所迫开始工作。他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编译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五四”之后，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是为新文学运动奠定基石，而且特别重视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工作。1920-1921年间，他就翻译并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党纲》、《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以及[土]哈里德的《桃园》等短篇小说八九十篇。终其一生，茅盾一共发表过40余种外国文学译作，240篇译文，堪称多产。

在翻译理论方面，他针对每个时期译界争论的问题，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写出翻译理论文章，前后达20余篇，1954年他撰写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更是成为了我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总纲领和翻译理论的新发展。<sup>11</sup>

在翻译理论方面，他针对每个时期译界争论的问题，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写出翻译理论文章，前后达20余篇，1954年他撰写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更是成为了我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总纲领和翻译理论的新发展。<sup>11</sup>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系我国现代杰出的美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贡献的翻译大家。早在留学英伦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写作和翻译，几十年来，著译等身，硕果累累。他早期翻译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更是为我国介绍西方美学的事业开了先河。他的译作主要涉及的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例如《谈一词多义的误译》、《〈共产党宣言〉译文校对的小结》、《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等，以及文学作品（包括派萧伯纳的戏剧集二册等）。<sup>12</sup>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历任中国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历任中国

10 同注释3，P329。

11 同注释10，P426-427。

12 同上，P427-428。



作协顾问、中国译协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鲁迅博物馆顾问等职。1949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是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自20年代初开始从事俄苏文学的翻译工作至1946年底的20多年中翻译出版作品40余种，达300万字。其主要译作辑为《曹靖华译著文集》(共11卷)。<sup>13</sup>



梁实秋(1902-1987)浙江余杭人，生于北京。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是以胡适、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的骨干之一。译著颇丰，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于1977年出版，行销海内外，影响广泛。而梁对译事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他用接近40年的时间(1931-1967)独自译完的《莎士比亚全集》。对于翻译理论，除早期与鲁迅的论战外，梁氏在《翻译的艺术》等著作中亦有所阐发。<sup>14</sup>



罗大冈(1909-1998)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家。1952年至1964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研究员，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他的译著和专论甚丰。大学时期即开始发表诗歌并作文学翻译：根据法文译文转译高尔基的中篇小说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苏佩维埃尔德散文《塞纳河上的无名女子》，并将《唐人绝句百首》、《古镜记》译成法文，又用法文撰写7位中国古代诗人小传等等。<sup>15</sup>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他除了发表许多富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外，还译有：[苏]米丁《新哲学大纲》(与郑易里合译)、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

史唯物主义的信》、蒲格达诺夫《火星》、《伏尔加船夫曲》、[日]菊池正士《最近物理学展望及宇宙线问题》、高尔基《论现实》等。关于翻译理论，艾还发表过《谈翻译》等著名译论，提出“要用最适当的字句表示原意，就同时要正确地理解和融会原意”。他主张“准确的直译”。<sup>16</sup>

而回顾中国当代的翻译史，可以以“文革”为界分为大概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翻译工作取得了不俗成绩，翻译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初步的繁荣。纵然动乱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顿也无可记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很多国内外的研究者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默默地进行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七十年代后期我国翻译事业重新起步后，很快又取得了甚至超越第一阶段的成就和发展。其中，在红楼飞雪、黄河晓月的北大，就有一批批对翻译事业怀有高度热诚的学者们，季羨林、许渊冲、臧仲伦、闻家骢……历史的面纱之下，有着数不清的身影，他们主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西方优秀的、先进的思想能够传播到中国，更让古老东方的智慧得以在大洋彼岸落地生根。

面对未来，我们不仅需要横向的引进，更要纵向的继承。前辈们这种“视天下为己任”的治学态度和翻译精神，其实正是北大精神的一种真实写照，而唯有将这种无形的财富好好地保存和发扬下去，北大翻译百年之后，才可以继续绽放出“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的文化魅力。

幸哉，吾北大人！

参考资料：

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方梦之主编，张顺梅等编，《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许钧著，《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3 同上，P428。

14 同上。

15 同上，P436

16 同上。

# 跨越太平洋的梦想

本刊记者 / 何滨柔 林起贤 赵雅娇

2013年春天，北大有三位校友在太平洋彼岸的国度获得科学届的崇高荣誉，成为各自学术领域里殿堂级的人物，他们是1978级数学系校友张益唐，1978级生物系校友邓兴旺，和1984级生物系校友陈雪梅。

三位校友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波留学浪潮初期赴美留学，他们在北大打下学术的基础，在异国他乡摘得成熟的果实。表面看来，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着相似的轮廓，在这相似的轮廓之下，各人却有着迥异的际遇和经历。唯一相同的也许只有那对梦想的执着。

张益唐，北京人，祖籍浙江平湖，出生于1955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2—1985年，师从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國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今年4月，张益唐向世界顶级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提交了名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的文章，5月得到接受。同月，《自然》杂志以“第一个无穷组素数成对出现的证明”报道了张益唐的研究。他的研究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被视为孪生素数研究方面的突破性进展。



“我习惯了默默做事，这是我的性格使然，不是刻意的选择。我对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不高，我不跟别人攀比，所以我就不大容易受这一类东西的困扰。名利对我不重要。把这些看得太重，一定会影响做学问。在研究之外，我对别的东西看的比较淡。”

邓兴旺，湖南沅陵人，出生于1962年。1978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在获植物生理生化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89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1992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建立实验室，任助理教授；1995年为副教授，2001年成为终身教授。1995年，因他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2003年，他获得世界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Kuhmo奖。在今年春季举行的第150届美国科学院年会上，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特别想做的，就是对农村、农民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中国是挺大的事，而且只有在中国才能有所作为。因为中国的农村我比较了解，而且它比较落后。落后，就说明有发展的空间，能有所作为。”

陈雪梅，1984年考入北大生物系，1995年获康奈尔大学理学博士。1995—199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9—2005年任Rutgers大学助理教



授，2005—2010年分别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副教授、教授、Furuta讲席教授等。在今年春季举行的第150届美国科学院年会上，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一荣誉旨在表彰陈雪梅教授在microRNA的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为探索生命奥秘所做的贡献。

“2005年我的导师开了一个派对，庆祝他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当时我是博士后，觉得导师好厉害，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评上了。所以，我现在常跟后辈讲，不要把梦想看成是遥不可及的事。”

1978年，23岁的张益唐和16岁的邓兴旺迈进了北京大学校门。那时候的北大“劫后余生”，刚刚整顿了教学秩序，软硬件条件都只够勉强维持教学的需求。然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憋着一股奋发向上的劲儿。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极其浓厚，自习的教室不够，同学们常常跑到树林里去读书。

来自于北京这座大城市的张益唐喜欢基础数学。从儿时开始，数学世界的美就带给张益唐无尽的快乐。张益唐阅读了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了解到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开始对数论产生兴趣。1978年《人民文学》刊登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讲述了数学家陈景润刻苦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掀起了一场全民猜想的热潮。张益唐也被这个故事打动，投考北大数学系，成为该系“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但是专业分配却不如意，张益唐被分到了计算数学专业，于是只好常常逃掉专业课，去听自己心仪的课程。幸好他在数学上的天分极高，本专业的考试成绩也都优秀，成绩和兴趣两不误。

1982年张益唐本科毕业，接下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张益唐终于可以遂了自己的心愿，跟随著名数论专家潘承彪读了3年的硕士。慢慢地，张益唐发现解析数论是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从事纯数学研究的理想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邓兴旺是这么描述自己对于专业的选择的：“当时报了物理、化学两个志愿，因为高考考物理和化学嘛，就那么简单。当时考的，除了文科以外，有数学、生物、化学，数学是太老的学科，是吧？重要的定理都是几百年前说好的事，好像最近发现一个以

后能写进教科书里面的东西可能太难。但是物理、化学作出新成绩的可能性大一点，特别是物理，跟什么发电、工程之类的都有点关系。而且自己接触得多一点。（但）说到底专业还是随便报的。”

看起来对于专业的选择，张益唐全凭自己的兴趣，邓兴旺则在一开始就渴望作出新的成绩。这个来自偏远山村的16岁少年身上几乎寄托着乡亲们对于外部世界，对于人生成功的全部渴望。这似乎隐隐暗示了他们以后几十年将画出完全不同的事业轨迹。

从1978年到1984年，时间过去了6年，就在张益唐和邓兴旺即将完成他们在北大的学业时，一个名叫陈雪梅的小师妹跨进了北大校门。早在孩提时代，陈雪梅就对植物有着浓烈的兴趣，采集植物标本、养盆栽，是学习之余消磨时光的最好娱乐。1984年，陈雪梅参加高考。“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当时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陈雪梅受到这股生物热的感染，再加上对植物的兴趣，考取北京大学生物系，开始接受生物学的系统训练。

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入校园，同学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校园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氛围，人人都在追寻新的理想生活，追寻自己的价值所在。新的留学浪潮渐渐形成并且变得越来越波澜壮阔。张益唐、邓兴旺、陈雪梅在这股浪潮中先后赴美留学。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同一片蓝天下，他们付出了同样的艰苦努力，走过不同的人生旅程，各自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最后殊途同归，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科学梦想。



## 张益唐：“半生潦倒”的传奇数学家

2013年4月17日，一篇数论论文被投递到纯粹数学领域最著名的刊物《数学年刊》。不到1个月，论文所涉及领域的顶级专家罕有地暴露自己审稿人的身份，信心十足地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突破的重要工作，文章漂亮极了。这位评审人就是当今最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亨利·伊万尼克。这位作出重大数学突破的就是张益唐，由于对数学界最著名的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的破冰性工作，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跻身于世界重量级数学家的行列。

1985年，张益唐来到了位于美国的名校普渡大学读博士，希望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纯数学研究，但在异国他乡却遭遇了种种坎坷。张益唐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是雅可比猜想。博士毕业前夕，他宣称解决了雅可比猜想，并且有几个专家对他的证明很感兴趣。不幸的是他的证明里的一个引理是其导师莫宗坚的一篇发表的成果，本以为是对的，但再排查时，发现莫教授之前的结果是错的。这意味着，7年的主要心血付之东流了！好在张益唐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还是有贡献的，才拿到了博士学位，但眼界极高的张益唐不屑把这篇有瑕疵的博士论文结果整理出来发表。更糟糕的是，他和导师的关系不佳，这里有学术上的冲突，也有性格上的不和。因为博士论文的结果没有发表，加上导师连一封推荐信都不愿意写，张益唐毕业后连个博士后的工作都没有找到。

一面要继续做数学，一面还要糊口。毕业后的前六七年他干过很多杂活，包括在赛百味做临时会计、餐馆帮手、送外卖。

1999年，在北大数学系系友的帮助下，张益唐才找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做助教的职位，2005年以后转正，变成了比较稳定位置的讲师，主要任务还是上课。虽然张益唐的教学工作比较重，比起研究系列的教授、副教授的工资性价比低很多，也没有研究经费，但能回到学校，做自己驾轻就熟的事情，还能利

用图书馆、办公室作研究，对一个胸有大志的数学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满足的了。

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14年是张益唐研究的黄金期。不需要研究经费，靠自己坚实的数学功底，充满智慧的大脑，以及潜心钻研的精神，他终于演绎出数学史上的一个神话。2012年7月3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张益唐在科罗拉多州好友齐雅格家后院抽烟，20多分钟里他有如神明启示般的想出了主要思路，找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特别突破口。

2013年5月22日，老牌英国报纸《卫报》刊登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鲜为人知的教授在折磨了数世纪数学精英的大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印度主流报纸把作出这一非凡贡献的人，与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相媲美。

2013年5月13日，《自然》催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哈佛演讲。一个学术界的“隐形侠”，第一次站在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并告诉世人：我走进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哈佛的讲台下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演讲内容被即时传到网上，网上不少人在刷新网页等待最新消息。

张益唐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轰动的原因在于，作出巨大数学贡献的他已经接近60岁，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讲师。为了潜心研究数学，他几乎把自己与世隔绝，在美国的偏远省份“潜伏”下来。他的妹妹曾在网上发寻人启事寻找哥哥。当时在美国当教授的老同学给他妹妹回了个电邮，表示他哥哥健康地活着，在钻研数学呢。

从30岁出国留学，到60岁作出举世震惊的成绩，中间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张益唐经历了学业的挫折、求职的失败，以一个北大数学才子的身份，一个数学博士的身份做过各种杂活。后来的14年虽然谋得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但一直只是个没有正式编制的讲师，可谓半生潦倒。可是他心安理得，始终不改其

志。2013年5月20日，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特在《彭博》上撰文《可以是电影明星的数学家》，他认为张益唐的励志故事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网上也有人建议文学家、编剧、导演们可以把张益唐的故事搬上银幕，拍出比《美丽心灵》更美的电影。

## 对话张益唐(以下简称“张”)

**记者：**之前全世界对您知之较少，如今一夜成名，您的心态和生活有改变么？

**张：**心态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生活被打乱了，这不是我原来喜欢的安安静静一个人的日子，我想到了这项成果出来会在数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我没有想到在数学界以外也会有很大的轰动。刚开始头疼，现在习惯一点了。我希望这个阶段能够很快过去。

**记者：**从何时开始着手研究孪生素数这一命题并把它作为重点方向的？

**张：**我的习惯是同时考虑两三个比较重大比较难的数学问题，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想要专攻某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出来。大概是三四年之前开始想这个问题，但不能确定某个时间点。因为前人已经做出了成就，距离孪生素数的最终证明只有头发丝那么远的距离。但是谁都知道，就是这一根头发丝，一直困扰着数学研究者们，跨不过去。有很多的相关的数学研究者都想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好些年都没有进展。于是也产生了很多说法，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希望的，是无法做出来的。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做下来了。

**记者：**当时为何想选这个高峰去攻克？

**张：**我没有因为它是高峰就要选它，我就是知道它是个问题，就一直想，一直想，直到去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己能够把它做出来

了，突破了证明的壁垒，这时候才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个问题上。

**记者：**突破的灵感从何而来？

**张：**灵感是一种积累。成年累月持续不断的想，总有一天你能看出其中的步骤。直觉的来临靠的是成年累月的思考，这是通过训练可以获得的。

学习一个定理，不要只局限和满足于课本上给出的证明，可以去尽可能的想想，自己能不能给出另外的一种证明。有些东西已经很漂亮了，但是要能够回到一个最原始的形式。虽然费劲、麻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看出来是哪些因素在证明中给出了重要的贡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记者：**数学的研究过程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是这样的吗？

**张：**最多是一根笔一张纸，最少就只要一个脑子。

**记者：**很多研究者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放弃了，为什么您可以坚持下来？

**张：**心理状态很平常，想问题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想停都停不下来。有时候适当放松一下可以促进灵感的激发。去年去了一个朋友家放松，什么都没有带，但是有了灵感。

**记者：**您对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即使一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但是最好是能够自己试一试，回到它最初的出发点，从头到尾把它想一遍，这可能更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我有这样的习惯。喜欢自己给自己提一些特别的问题。

记者：您下一步会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么？

张：进一步缩小孪生素数这个问题的范围还需要新的方法。其实我还有一点东西没有拿出来，我还有一些新的工具。但是要把范围缩小到2的话还需要本质上的突破。

记者：当您开始专注于某个问题时，您对自己的研究进程会有一个自我的要求么？

张：我不会给自己定时间表。因为这种问题是属于好几代人的，不一定能做出来。尽可能做好，但是不刻意规定自己，不给自己一个很高的期许。我有信心，但是我坚持一颗平常心。

“做学问是自得其乐。”我一直记得北大恩师潘承彪教授给我说过的这句话，我很认同。

记者：有没有放弃过觉得很难的问题？

张：我不会放弃每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我会一直想下去。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对数论感兴趣？

张：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数论有兴趣了。我读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有一个模糊的对未来的期待。跟恩师潘承彪读书后我觉得解析数论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孪生素数本身很吸引人。它的叙述很简单，但是证明过程很难，是人类的难题。

记者：对数学其他领域的接触对您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帮助么？

张：在普渡大学做过代数几何。对别的领域的研究的关注和亲身的实践对于孪生素数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影响。它保持了研究者视野的广阔。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您每天用来做学术的时间有多少？

张：研究数学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我这样的时间就不多，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散步中想数

学。我不开车，因为开车不能想数学。如果算上思考的时间，我想每天至少10个小时，多是12、14小时。

我喜欢早晨一个人去咖啡馆，端一杯咖啡，想数学。早晨是很容易出灵感的时候。

记者：您很喜欢音乐，能谈谈对音乐的爱好吗？这种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我喜欢在晚上临睡前听音乐。对音乐的爱好是从北大开始的。78年进北大，那时候文革刚结束，用半导体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名曲欣赏，交响乐介绍。这么一点点开始喜欢。后来到了美国后很幸运认识了一个指挥家朋友，给我很多指点。

记者：您还喜欢俄罗斯文学？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张：应该说什么样的文学我都喜欢，只要是好的文学。俄罗斯文学中，我觉得《静静的顿河》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中特有的浑厚大气。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他对死亡描写得极其逼真。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对大自然的描写无人出其右。

记者：您觉得数学和文学、艺术之间有相通的地方么？

张：数学证明结果是逻辑的，但是在思考和创造的时候是朦胧的，其中有一种美感。这种美感和音乐、文学的美感是相通的。

记者：在北大的学习对您日后的研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扎实基础和严谨思维，治学不能随意。

记者：您是文革后北大数院第一批学生，有什么样的特殊感受？

张：虽然各种条件不佳，但是当时北大的学风非常纯正，学生认为读书读好就是最大的追求，不会想

别的升官发财。教授治学认真严谨，把教书当做最大的责任。

如果说有一定的缺失的话，应该说文革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教授的水平跟世界领先水平有一定差距，他们很少给我们讲世界前沿的研究。虽然说本科生可能对于这些前沿的东西并不能有深入的认识，但是一个轮廓的了解也会让我们视野更开阔，和世界的联系也更紧密一些。比如1982年，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被授予菲尔兹奖章——这是世界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当时我们就只知道他获奖了，但是他为什么获奖，他做出了什么样的重要研究，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老师也讲不出具体的内容。我想，这是我们那一批学生的一个遗憾。

**记者：**研究生阶段的潘教授对您的影响在哪里？

**张：**潘承彪教授带领我在“算”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教会了我在解析的过程中看出每一部分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这成为我后来一直保持的习惯。

**记者：**当时有偶像么？

**张：**华罗庚是我们一代人的偶像。从高不可攀到逐渐了解。陈景润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我从大一开始看陈景润的文章，看得比较慢，比较吃力，但还是努力看懂。

**记者：**您怎么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您认为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张：**我很喜欢教课，所以教学虽然会占用一些思考问题的时间，但是不会对我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个好老师应该激励学生对一个学科有热情，帮学生创造条件发挥他的才能，

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忠告和鼓励。如果学生能比自己更好，应该感到高兴。

现代社会中的老师不是私塾先生，但是中国的这句古话“为人师表”说的很好，老师应当以身作则。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学生是好的学生？

**张：**好的学生是永远不满足的学生，是没有顾忌的，要有胆量去做难题。我从学习到科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兴趣的引导。老师和社会应该鼓励有这样的兴趣的学生。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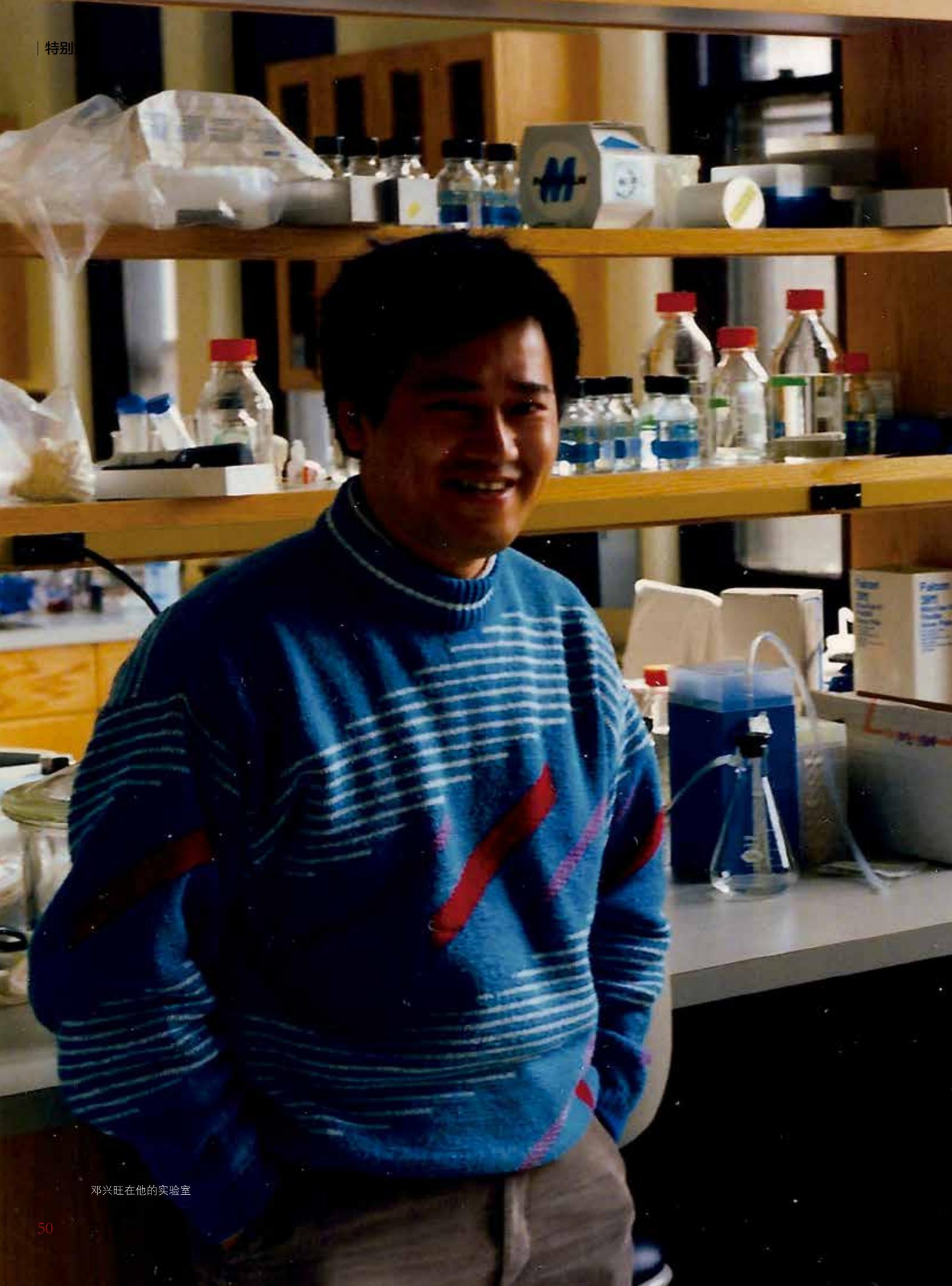
**张：**课题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找不到路的困扰，这也是考验一个研究者的地方。

**记者：**您的成就观是什么样的？

**张：**对待成就，我很高兴。因为我实实在在把它做出来了，而且很快得到了承认。但是我不会得意忘形，不会觉得趾高气昂，我还是保持我的平常心，我希望能做出更多的东西。我还在想问题。

**记者：**就您的经验，美国的科研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内在世界领先？

**张：**体制完善，学术标准制定得好。对人没有太多的约束，可以自由发展，反而可以促进优秀的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一个人如果有真才实学，在美国不太可能会被埋没，社会可以为他提供支持。



邓兴旺在他的实验室

# 邓兴旺：从少年英才到科学大师

1985年，张益唐赴美的同一年，邓兴旺带着从北大导师那里借来的50美元，也踏上了留美之路，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的博士生。与张益唐遭遇的曲折磨难不同，邓兴旺的经历不折不扣的体现了“天道酬勤”的真理。

在读博士期间，邓兴旺一直从事“植物光形态建成及光信号转导”研究，研究植物对光的感知并调控生长以适应其环境的基本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还是一个有着太多未知的新领域。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邓兴旺避开不必要的社交活动，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长达16个小时。天道酬勤，再加上硕士期间的积累，读博期间，邓兴旺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细胞》、《生化》等生物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不到四年时间就博士毕业。

之后，邓兴旺的科研事业一直平步青云。1992年成为耶鲁大学助理教授，担任长岛冷泉港实验室植物分子生物学高级研讨组的3个主持人之一，并带领实验室取得的成果成为行业标杆；1995年因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研究获得美国总统青年学者奖；2001年成为了耶鲁大学终身正教授。2003年，获得由国际植物分子大会组织颁发的年度全球植物分子生物学最高奖。

就在邓兴旺的科研事业节节高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能不能有新的突破，不仅仅是在某一个狭窄的科研方向从事研究，不仅仅是个人奋斗，而是做对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有更大的开创性的事。邓兴旺想起那片养育自己的故土，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却无法改善生活，走出大山的父老乡亲牵动着他的心。他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航向：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克服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难题，用生物科技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现状。带着这样的决心，邓兴旺从1998年开始往返于中美之间。2000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长江特聘讲座教授，将“北京大学植

物分子生物学与发育遗传学暑期免费讲习班”发展成800人的大课，成为国内接触该领域前沿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2001年促成“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北大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进入国际快车道。

2007年邓兴旺带了一个美国学生到家乡湖南湘西沅陵考察中国农村、农业现状。所到之处，河里没了鱼虾，地力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退化，环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邓兴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高产要求和生物技术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可逆的结局，出路只有一条，尽一切可能真正提高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整体水平！他回到美国后，就与学生一起写了一本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着这本书，邓兴旺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国和世界的种子产业发展前沿，世界种业公司也知道了中国的邓兴旺。

当邓兴旺早期代表北京未名凯拓与美国海外先锋公司（杜邦公司的子公司，全球最大的种业公司）谈合作时，邓兴旺提出，由先锋公司每年出2000万研究经费，而中国出人才，出核心技术，对于这样的条件先锋公司最终接受了。中国人占了主导，这在先锋公司的对外合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相信邓兴旺的学术水准，更接受了邓兴旺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如果先锋公司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对手，中国全面开放种子市场的时间表只可能无限期的延后。

在国内种业公司对外资公司一片严防死守的紧张空气中，宽容的中关村也接受了邓兴旺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合作的方法，对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邓兴旺组建了一个高层次人才团队，创制前沿核心技术，并与本土原有技术完美结合，邓兴旺解决了常规杂交育种过程中资源利用率低、育种周期长等瓶颈问题，建立了稳定的、能自我繁殖的、恢保一体的新型不育杂交育种体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指出，这样的新型不育系兼具三系法的稳定性和两系法配组灵活性的优点，比三系、二系又进了一步，并称之为“第三代杂交育种技术”（G3育种技术）。新技术是种子领域的通用平台技术，可以更精确高效地培养出高产、耐旱、抗虫并可以自我繁育的后代。中国的农民有福了。

在北京市支持下，2009年8月，未名兴旺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成立，邓兴旺出任首席科学家。为种植业企业和机构提供核心技术与研发服务，如分子设计杂交育种技术、全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邓兴旺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自主创新现代农业生物核心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心。

## 对话邓兴旺（以下简称“邓”）

**记者：**您刚从小山村到北大的时候，您看到的北大校园是什么样的？

**邓：**和现在太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因为是文革之后刚刚恢复高考，学校的校园环境全国都差不多，北大还是相对不错的。但你要和现在比，那学校环境差多了。（比如）宿舍，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摆了4个上下铺，住7个人，还有一个床是给大家放箱子的。屋里根本没法学习。在宿舍里学习基本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坐在床上，个子高点的人头都伸不直的。就是那种状况，所以自习一般要到教室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占位之风特别厉害，去晚了就没地儿了。白天还可以在树林下、树林里学习，晚上就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学习的氛围都是很好的。大家都是在学，最多周末出去爬爬山，玩一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社团组织、活动。

**记者：**对于我们这代大学生而言，做学术研究已经是一条比较艰辛的路了。那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投身科研的呢？

**邓：**上了大学，到生物系以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做科研了。因为你读了大学以后，要么做研究，要么当老师，一般是主要的两条路子。从生物系你

要当个什么国家领导，好像也不太对得上。所以那时候基本确定就走学术的路子。

**记者：**您做研究是以效率高出名的，不管是读博，还是博士后，都是用2-3年的时间就读完了。您是怎么做到的？

**邓：**我觉得主要是对机会的珍惜吧。特别是从农村来，先到了北大这么好的环境。虽然那个时候北大比现在差，但也是全国最好的，是最高学府。那么好的机会，不把那些东西用好，你会后悔。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把环境、条件用好，做到最好。这个做到最好，实际上就是效率。效率有的时候就是努力、多想想多做事。你做课题，很多时候做一个课题，中间肯定会有很多（时间）要等一下、要放一放，但你就可以做几个事情，把时间都用上。有心的人能够把效率提高，这是一个。另一点，做科研，你花同样的时间和努力，但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课题，这个收获会不一样。

**记者：**您刚才说，做科研选一个好的课题非常重要，那您是怎样把握科研动脉，保持在前沿？

**邓：**就是把你这个领域最新发表的一些最前沿论文多看看，有的是别人发表的原始论文，有的是会议上的摘要，把这些东西多看看。这类东西图书馆反而读的人不多，挺容易借来看的。那个时候都是影印的，我就看一看。看了之后想想，大家都做这个，那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小空白。那个时候，在大学研究生的初步阶段，也就想能够有一个空白，填填空而已。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我稍微能往前走小半步，那个时候就想这些事。当然越到后面，能力越来越强，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能够想更多的事。别人走到这，我可以跨远点，别人明年能做的，我今年就把它做了。

**记者：**您在美国时，已经在耶鲁取得了终身教职。为什么还想到要回国呢？

**邓：**应该说和想做的事有关吧。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从92年到13年，马上就22年了。当一个教授

当了22年，差不多就是一个教授平均的工作年龄吧，我个人偏早一点，我不到30岁就任教了。一般都是30到40的区间，你再工作个二十多年，差不多就退休了。

我做了20多年，觉得好像还有时间可以做一件大一点的事。因为（我）在美国做科研，在最好的大学之一找到了教职，又当了院士，也觉得这个职业做得比较满意了，比较完满了。在这个之外能不能做另外一件不同的事，不仅仅是专研一个研究方向，更有对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有更大的开创性的事，而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事。

第二，我特别想做的，就是对农村、农民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中国是挺大的事，而且只有在中国才能有所作为。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比较了解，现在中国农业、农村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落后，就说明有发展的空间，能有所作为。

**记者：**您对国内的科研环境有什么个人建议吗？

**邓：**我觉得现在的环境、设备、经费支持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一个：要更加改善的应该是学术氛围，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钻研学术问题，不要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要做科研的（人），不要每天开这个会、想那个事，还要搞汇报，一天教个五节课，那是不行的。做科研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在不愁吃住、不愁穿戴的情况下，专心一意地做学问，这样才能真正做出好学问来。

**记者：**现在的北大学生和您当年在学校时的北大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吗？

**邓：**现在的学生年龄都特别整齐了，差不多都是同岁的，我们那个时候年龄的差别特别大。有小的，有老的，差20岁的都有。而且现在一般的学生都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说没有经历过当初那种落后的环境，是比较幸福的一代。但是幸福有幸福的好处，也有坏处。没有吃过苦，吃苦的能力差一些。从来没吃过苦，突然要你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不一定能做得好。有的时候往往能够

吃苦，能够坚持下来，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记者：**您09年的时候成立了前沿实验室，为什么优先选择了水稻这个品种？

**邓：**这与我的个人情感有关，科学依据也有。说实在的，重要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小麦、水稻，水稻研究是最好做的，研究效率最高，所以从技术上讲是应该的。第二，中国的水稻有特殊意义，中国人吃饭主要是吃水稻，所以水稻对于中国有特殊意义。

**记者：**您从一个科学家变为企业家，您觉得其中的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哪？

**邓：**比较多，我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它可以永远生存下去。所以你要为社会留下一个比较长久的事情，能不能建立一个机制，（让）它可以永远自己更新、自己延续，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记者：**那您觉得前沿实验室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邓：**我觉得现在做的非常好。从开始到现在，可以说组建了很有实力的团队，而且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这些技术还是很前沿的，肯定是有用的东西。做到这两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还不够。还有一点就是把这些有能力的团队、有用的技术，怎样为社会、为别的企业做事情、做服务、做产品、产生经济回报，让它自己可以持续发展。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一旦这第三步实现了，这个前沿实验室就会永远走下去，这是了不起的事。

**记者：**那前沿实验室出了什么代表性的成果吗？

**邓：**挺多的，你可以看我们的墙报。我们新技术包含有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油菜方面，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杂交小麦方面，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发展一些新的杂交育种技术。在现在所有的技术之上，能不能用最前沿的生物技术，把杂交技术发扬光大，做出新的更好用的技

术。技术是没止境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总能做出前沿技术，保证是这个领域的最新的东西。等别人做出一个技术的时候，我又率先推出了其他新东西，这就是一个研究型企业必须要做到的事。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邓：这看你针对什么说，（这）不是一个泛泛的问题。对于上了北大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可以说就是要坚持下去。认准的事就坚持，不成功就不放弃。因为北大人人都够聪明，对于一个进入北大的学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件事再坚持下去，不要今天觉得物理好，明天觉得化学好、金融好。看别人做的事情就好，自己做的事情就不好。这种心态是最初级的社会心理。我觉得作为北大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人，不能被这种最低级的社会心态干扰自己的选择，干扰自己的事业。要坚信自己的选择。

记者：您的夫人也是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儿女也非常优秀。您觉得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应该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

邓：我觉得家庭和睦是事业成功的一个保证。要把事业做得好，一定要有一个理解和支持的家庭，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得做一些让步，为了家庭，在某一时段、在事业上稍微做一些让步，也是必须的。一个人，家庭不和睦，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是谈不上事业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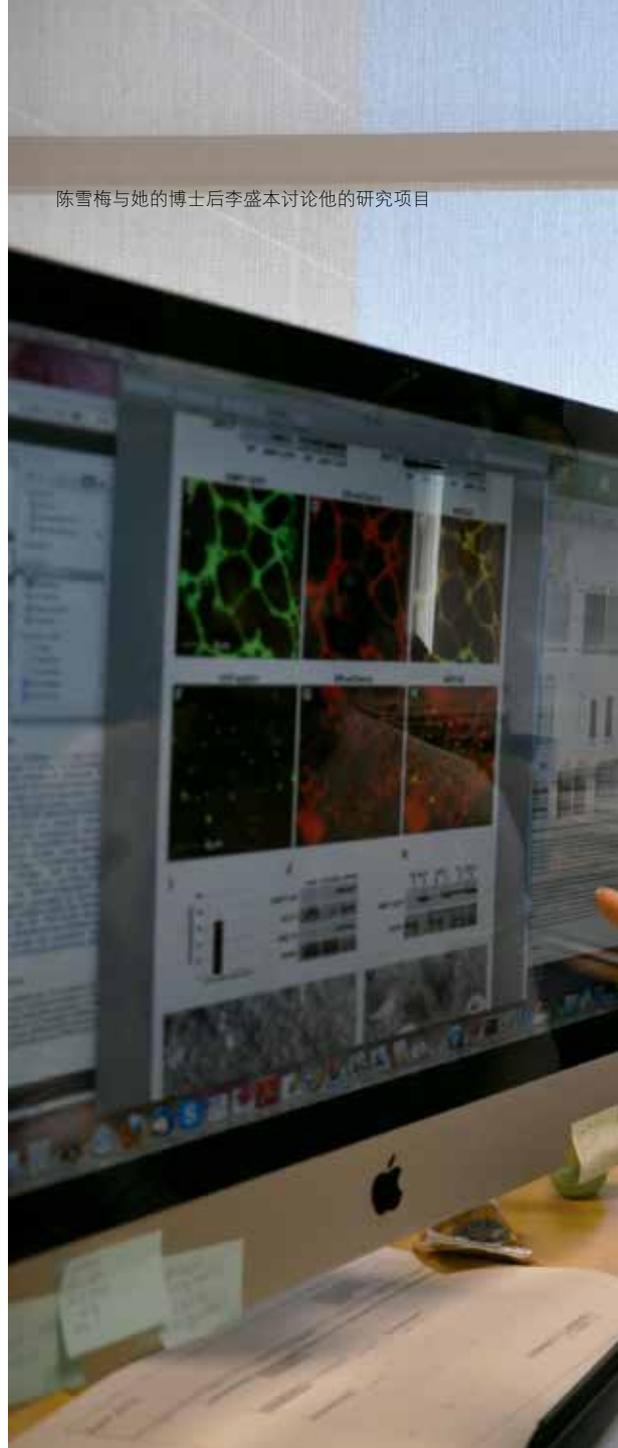
记者：您是一个“乐天派”吗？坚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目标？

邓：我坚信要努力，一定要争取最好的机会，珍惜每一个机会。但只要努力了，没成功也可以接受。只要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而把事情做砸了，那就没办法了，那我就认命了。但是自己不好好做而做砸了，那就太可惜了。

记者：您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您觉得自己更多是一个幸运儿，还是因为您的努力而走到了今天？

邓：两者都有。一个是努力，一个是运气好。为什么（说我）运气好？（我）刚好可以考大学，要是邓小平再晚点出来，我们就错过了。我要是太晚出生，说不定也不能上大学了。现在在农村想上大学多难啊，上北大更少了。我们那个时候百分之四五十都是从农村来的。现在的（北大）孩子真正来自农村的很少。这些都是运气。但是这些运气对（我那）同年代的人都有，有的人把握住、用上了，大部分人没用上。我努力了，就用上了。

陈雪梅与她的博士后李盛本讨论他的研究项目





## 陈雪梅：女性也能撑起科研的半边天

2013年4月26日，陈雪梅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一荣誉旨在表彰她在microRNA的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为探索生命奥秘所做的贡献。无限荣光的背后是一个女人顽强的斗志、宽广的想象力和辛勤的汗水在支撑。

MicroRNA 是长度约为22个核苷酸的小分子RNA，却并不编码蛋白，而是在基因调控中发挥作用，其影响了从发育、生理到应激反应几乎所有的生物学过程。这一理解生命奥秘钥匙的

microRNA，事实上直到2001年被发现普遍存在于动物中才真正进入生命科学研究者的视野。2002年，陈雪梅实验室与另一个实验室同时发现microRNA在植物中广泛存在。不久，陈雪梅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学界看来想法十分新颖的假设：microRNA在花的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实验将这个新颖的想法证实为真理。2004年，陈雪梅在《科学》上发表了独立署名的论文A microRNA as a translational repressor of APETALA2 in Arabidopsis flower development。此后，陈雪梅实验室在microRNA的生物合成及降解机制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尤其在揭示microRNA甲基化这一机制上引领了植物及动物小分子RNA的研究。

生命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实验占据重要的位置，耗费巨大的时间和人力，因而要独立完成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绝非易事。事实上，独立完成研究是陈雪梅出于无奈的选择：当时实验室里的学生和博士后没有人能有时间加入到这项研究中，如果要采取立项申请经费组织新研究团队的做法，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开始研究，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想法，一旦被证实将会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重大发现，需要马上行动。于是陈雪梅决定放手单干。所幸，凭借陈雪梅深厚的学识积淀与精准的判断，一个“大胆的假设”很快通过了“小心的求证”。

“microRNA本身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发现，但是它是怎么起到调控机制的，怎么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发育，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科研过程就是这样，新的发现之后又是新的问题，这是让不少人对科学望而却步的原因，但对于真正热爱科研的人来说，这种一步步探索的过程特别让人着迷。”陈雪梅这么描述她对自己工作的体验。让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分头单干”的女院士是怎样踏上梦想之旅的。

1988年，陈雪梅大四。当时北大生物系对当时世界前沿的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不多。生物系唯一一个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的陈章良老师邀请了一位专家王侃来北大做报告，介绍了植物分子生物学前十年的一个重大突破：土壤农杆菌在侵染植物的过程中，把自己的DNA插入植物基因组中，以诱发植物产生有利于土壤农杆菌的反应；科学家揭示了这基因转移的机制。这一重大突破奠定了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基础，而

转基因技术以及八十年代已渐成熟的DNA重组技术开拓了植物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陈雪梅当时立刻就被深深吸引了，觉得这个领域既奇妙，也很有应用前景。

陈雪梅开始将植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并跟着陈章良老师完成了相关的本科生毕业论文。1988年，陈雪梅考取CUSBEA中美留学生计划，于1989年跨越太平洋，来到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世界级植物发育专家Elliot Meyerowitz。

生物学研究常常会遇到假设不成立、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情况，这意味着生物学家在求索中不断经受精神和体力的磨练；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时，争取科研经费也会给教授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不过，这些不如意对生物学研究者而言是“家常便饭”，并不算特别的困难。身为女性，陈雪梅遇到的更大的困难是要在科研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

1999年，陈雪梅带着九个月的女儿，转到Rutgers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在美国，助理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申请经费组建研究团队，但是团队的规模，取决于研究经费。当上助理教授时，陈雪梅资历尚浅，团队的规模不大；同时还要授课，需要得到学生相对好的评价；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如审稿、经费申请审批；再加上论文发表的压力、照顾女儿，当助理教授的这段经历对陈雪梅来说，无疑是最辛苦的五年。每天她都要一大早就去上班，5点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到学校加班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陈雪梅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

不过，陈雪梅看来，这5年虽然辛苦但过得既充实又幸福。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去攻克感兴趣的课题，尤其进入microRNA这一全新的领域，实在太幸福了。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自己越来越坚定了科研的志向，虽然辛苦，更多的时候乐在其中，丈夫也十分支持自己的选择。有一年姥姥去世，陈雪梅回国，丈夫还会到Elliot Meyerowitz的实验室帮忙收种子。陈雪梅相信女性可以在家庭和科研上得到平衡，“一旦轻车熟路了，教授工作时间上的灵活性较其他职业更有利于对家庭的付出”。

2005年陈雪梅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此前的执着为

日后的科研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候上天又给了她另一份特别的礼物：儿子。在怀着儿子期间，陈雪梅还独立完成了microRNA调控花的发育的研究，陈雪梅的同事都开玩笑说，这篇文章其实是“两个人完成的”。

虽然现在陈雪梅的经费压力小了很多，但她还是没有放慢脚步，每天工作8-10个小时，周末一般上半天到一天班，剩下的时间培养孩子。“对于周末加班，心里并不觉得勉强或不情愿，做科研做进去后，就停不下来。”

## 对话陈雪梅(以下简称“陈”)

记者：北大有没有让你特别留恋的回忆？

陈：有。我以前住在36楼，刚上大学时，北大还没有熄灯的制度。到了大三，女生宿舍开始熄灯，那时候我们寝室六个人就开始卧聊。我们的感情很好，让我一直回味。

我还记得有段时间校园里经常举行游行。但当时我已经大四了，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

记者：除了脑力劳动，科研工作同时要承受身体上的压力，比如同位素实验就非常危险？

答：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自己做同位素实验时还怀着儿子，但是继续在美国做实验。只要遵守安全守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记者：您觉得什么是科研领域的原创性？

陈：原创性不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现在更多的是靠Incremental（逐步累积）的进展，即使是一个小的发现，如果能产生世界性的impact（影响），也是能被顶级的期刊认可。科学发现是一次次刺激的探索之旅，但是却常常具体呈现为长期的积累，一次次枯燥的实验。这种突破性的发现靠积累也靠灵感。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把自己的发现产生新的假设，再去检验，这个过程很漫长。这种原创性的发现是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的领域。

记者：听说您在加州河滨学校上课时，十分受学生欢迎？

答：我感觉我上课并不幽默，通常只能就事论事，上课靠的就是耐心和责任，课前认真备课，课上耐心回答问题。在美国，学生们都比较努力学习，尤其是研究生，每堂课二十来人，他们向我多提问题，我就多改进。

记者：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您在美国做科研的压力大吗？

陈：记得早期去开会时，我和人都说不上话，但现在就很好了。在美国做科研，华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通过学术会议认识更多的同行。但这也不是致命的困难。在科学界，虽然不同的科学家有不一样的个人癖好，但基本是以事实作为评断你的标准。只要你做得好，就能被接受。

记者：目前国内的生物学科研究生中女生与男生比例相当，甚至多于男生，但最终能坚持下来并做出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中有一股很强的“阳刚之气”，而女性仍属凤毛麟角。您觉得女性如何才能能在科研领域作出更多的成就呢？

陈：在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会议做报告的90%是男士，而听报告的女生则数目很大。这不仅意味着女性比较难融入男性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顶级学术圈，无形中也影响了年轻女性对从事科研的自信。而在美国博士后中变成faculty的女生比例很大。因为她们在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可以获得社会的帮助，比如美国在助理教授期间生孩子的话，是可以给你多一年的时间。学校选助理教授，在能力相当的前提下，选拔时还要适当考虑男女比例。现在中国女性进入科学界的性别障碍已基本消除，关键是要让这些刚刚步入科研道路的女性看到更多成功的女科学家的例子，让中国的女博士生他们看到希望和前途，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与理解，女性才能真正撑起中国科研半边天。”

“生活在别处。”这是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

张益唐、邓兴旺、陈雪梅，他们三位只是北大海外校友群体中的千万分之一。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

月，北大人一直唱着这样的歌，带着对于远方的希冀，怀揣求知的心，一批批北大学子走出国门，走向大洋彼岸。求学与研究之路并不平坦，对于有学术追求的学者更是如此。经历过筚路蓝缕的艰辛起步，遭遇文化冲突的挑战而去努力跨越，在新环境与新挑战中不断超越自我，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稳扎稳打，终于在异乡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并且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被世界认可。

远方成就了他们的梦想，但是他们的根永远在这里。

### 【背景链接】

## 关于美国科学院院士

据初步统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陆大学教育背景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共十位，其中四位为北大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体现了北大在培养理科高精尖人才方面的成绩。在本届以前当选美国院士的其他两位北大校友是：谢晓亮，毕业于化学系，目前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兼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长江讲座教授”，并在生科院的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IC）任主任；朱健康，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后来到北大攻读生物硕士研究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植物科学系正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与邓兴旺、陈雪梅一样，都是研究植物生物学的学者。

大陆背景的学者还有一批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包括此次当选的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清华生物本科），以及以前当选外籍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北大化学本科）、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安徽农业大学本科）等等。

## 关于孪生素数猜想

远在中古时代，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自然数的概念，人们也因此创立了一个古老而漂亮的数学分支：数论。数论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素数，指的是那些只能被1和其自身整除的数，比如5、7、11、19等。孪生素数是指差为2的素数对，即 $p$ 和 $p+2$ 同为素数。前几个孪生素数分别是（3，5）、（5，7）、（11，13）、（17，19）等。100以内有8个孪生素数对；501到600间只有两对。随着数

的变大，可以观察到的孪生素数越来越少。2011年，人们发现目前为止最大的孪生素数共有20多万位数。但这个数后面再多找一对孪生素数都要花至少两年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再也找不到新的孪生素数对呢？数学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几百年前就有个孪生素数猜想：有无穷多个素数 $p$ ，使得 $p$ 与 $p+2$ 同为素数。这就是孪生素数猜想。但至今人们都不知如何证明这个猜想。张益唐在《数学年刊》上发表的这篇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的文章，证明了存在无数多个素数对 $(p, q)$ ，其中每一对中的素数之差，即 $p$ 和 $q$ 的距离，不超过七千万。如何理解张益唐的结果呢？诺丁汉大学物理教师安东尼·帕蒂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假如在素数王国里素数只能找邻近的同类结婚，那3、5、7、11这种小素数找对象都很容易。但是素数越大，对象就越难找。但是根据张益唐的发现，素数和下一个素数的距离，应该小于或等于七千万。孤独的数字不会持续孤独下去，总有另一个素数与之匹配。换言之，对于“大龄光棍”素数来说，七千万步之内，必有芳草。七千万听起来是个巨大的数字，但在数学上只是一个常数而已。虽然它和孪生素数猜想的距离为2的结果还有十万八千里，但用张益唐的方法把七千万缩短到几百以内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实际上，在文章被公布于众后，短短的一个月以内，七千万就被菲尔茨奖获得者陶哲轩发起的网上讨论班缩小到六万多。张益唐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大海捞针的力气活缩短到在水塘里捞针，而他给出的方法还可以把水塘捞针轻松变为游泳池里捞针。也许最后变成在碗里捞针还需要一些再创新的工作。但给出了这一伟大框架已经是让全世界数学家瞠目结舌的壮举了。

本文以对三位校友的采访为基础，并参考整理部分已发表的文章，综合编辑而成。这些文章包括：

《校友张益唐：孤独的数学家》（中国科学网7月19日）

《土地的召唤——记邓兴旺教授的学术与创业之路》（北京大学校报，2013年6月15日）

《美国新科院士邓兴旺：难忘遥远的小山村》（人民网2013年5月2日）

《中国留美学生史·继续追求现代化（留美中国学生，1978-2002）》

# 从过去到未来

## ——宋向光老师与他眼里的博物馆事业

本刊记者 / 武宏琛



宋向光教授接受本刊采访

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量增多、种类丰富，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博物馆的参观者数量急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不理性的“博物馆热”也在持续升温。那么处在社会变革中的博物馆，其主要职责是什么？又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办馆方式，做到与时俱进？人们如何从博物馆中真正受益？高校是否真的需要大力投入博物馆建设？博物馆学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博物馆学专业耕耘三十载的宋向光教授，一直走在博物馆的建设、管理以及博物馆教育领域的研究前沿，多次承担国家文物局社科课题。今年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建馆20周年，考古文博学院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的建设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期“燕园学人”，就带着您一起聆听宋向光教授对于博物馆职能的解读，以及北京大学博物馆和博物馆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学者名片】**宋向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

燕园的西北角，幽静的鸣鹤园，有一座二层歇山式中式古典建筑，这里就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宋向光教授所在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研室就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博物馆早已是现代入熟悉的公共文化机构，而“博物馆学”对于许多人而言还十分陌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与博物馆学结缘开始，宋向光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培养博物馆学人才，致力于推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默默耕耘了二十余载。

### 一个偶然促成一项毕生的事业

三十年前，宋向光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使得他由考古转向博物馆学，并见证和参与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及博物馆学专业的建立。

1976年，受中国政府邀请，美国知名医药学家阿瑟·姆·赛克勒博士（Dr. Arthur M. Sackler）来到中国，他热爱和尊重东方古代文化，收藏了很多中国、日本和中亚地区的古代艺术品。改革开放后，赛克勒博士联系到北京大学，决

定资助北大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博物馆，用于教学和科研，并希望该博物馆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博物馆的范例。随后，北大派出包括宋向光在内的几名考古系教师赴美国学习博物馆学及博物馆管理经验，从此宋向光进入了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与博物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长期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宋向光最初对博物馆的认识还很有局限，认为博物馆只是展示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地方，是帮助学生学习考古学的标本室。考古学研究的训练，对宋向光早期的博物馆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他重视以客观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重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具备对考古现象较强的解释能力。然而，在美国进修的一年，中美两国博物馆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对博物馆社会功能认识的差异，促使宋向光对“博物馆”和“博物馆学”有了新的认识。“美国非常重视将博物馆看作一种‘社会声音’，力图通过博物馆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公众的需要非常关注”，宋向光回忆，这与当时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以“文物”为中心的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成为他学习美国博物馆管理经验时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

宋向光非常渴望将他在美国的所学、所思介绍回中国，推动中国高校博物馆学教学的改革，参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适逢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现考古文博学院）设立了博物馆学教研室，宋向光回国后成为了教研室的一员。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博物馆事业都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建成，宋向光出任博物馆的副馆长。宋向光感觉到，在博物馆学这样一个新鲜的领域中，必将有一番作为。

## 博物馆应该“向前看”

博物馆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与近现代科学知识构建相结合的工业文明，促使人们观察自然，用眼睛思考人生。自17世纪，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出现后，公共博物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成为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以及国家形象的展示平台。1753

年大英博物馆在伦敦建成和1793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对公众开放，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筹建了第一个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此后，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中央博物院等相继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也逐步得到了发展。

中国的博物馆学的研究长期具有浓厚的政策研究色彩，将文物标本作为博物馆的核心，文物的“保藏与利用”成为博物馆学研究的核心。在美进修期间，宋向光对这种研究倾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奠定了他对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的新认识。宋向光倾向于将博物馆更多地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是藏品的简单陈列，并将自己对博物馆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博物馆的组织特点以及博物馆社会职能实现的条件和手段上来。

在宋向光看来，对博物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将其视为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怀念，是人类“回头看”的所在；另一种则直承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进步的信念，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机构。他更倾向于后者，“博物馆更应该‘向前看’，不仅要展示过去留存下来的文物，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知识创新的起点。因为博物馆有选择地收藏、保护、展示、研究、传播物的含义，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见证。所以在这里，研究者可以得到研究的对象，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大众可以从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发现新知。”宋向光认为，这才是博物馆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式。

## 博物馆学教育：尊重学生兴趣 发挥北大学科优势

随着博物馆事业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博物馆需要专门的工作语言和业务规范及交流的学术平台，树立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形象，博物馆学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后，传统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并被介绍到中国，而后逐渐进入高校。1948年，北京大学开办了博物馆学专修科，作为辅修课程，帮助

学生了解博物馆的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鼓励他们学成后进入博物馆工作。然而，由于传统博物馆学学术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匮乏，20世纪50年代后的很长时间里，博物馆学退出了高校教学领域。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陆续开设了博物馆学，并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

宋向光分析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学教育的特点。紧密依托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是北大博物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同时，赛克勒博物馆硬件较为先进，也为在北大学习博物馆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一些院校重视应用、体现出较强的职业倾向不同，北京大学博物馆学教育要求学生更多地关注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发展需要，这也就要求更加多元的知识结构和视野。

多年从事博物馆教学，宋向光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认识到博物馆学需要的知识门类非常多，主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如对博物馆陈列设计感兴趣可以选择更多地接触结构、色彩等艺术表现手法的相关知识；对博物馆教育感兴趣的同学则可以选修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希望从事博物馆藏品信息数字化的同学加强计算机知识的学习等。同时，吸取西方博物馆学教育的经验，他对本科生、研究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本科强调基础和通史，发挥北大考古学科优势，打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基础，同时更多地进行考古实习和博物馆操作，而进入研究生阶段，则更注重批判性和思辨性的学习。这也正是宋向光所提出的“技能与思辨的博弈”。

在宋向光的指导下，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日趋多元，既包括“博物馆参观



▲ 典雅别致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外景



▲ 考古文博学院学生野外实习

讲解”、“博物馆藏品信息表达解对称问题研究”、“博物馆陈列的光色初探”等具体的博物馆陈列、展示等问题，也有试析“博物馆疲劳”等以受众为导向的研究，还有“从古根海姆博物馆看21世纪博物馆发展的新道路”、“从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运营看中国私立博物馆的发展”等前沿的宏观研究，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及自然科学的诸多研究方法和手段。

宋向光开设的课程，如“博物馆导论”等，不仅对本专业的同学开放，也成为了全校通选课程，不少非博物馆学专业的同学也选修了这门课程。“博物馆的前台与后台，区别非常大。”宋向光希望通过“博物馆导论”等课程，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并更好地利用博物馆，让他们真正对博物馆感兴趣。

2011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宋向光荣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师奖。

说到教学科研的苦与乐，宋老师强调道：“这是一项事业，我是伴随博物馆学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北大博物馆学专业刚设立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同事们一起边学边教，摸索着前进，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吃得了苦，挖得了土，弯得下腰’，不仅要置

身挖掘现场，也要埋头钻研最新的学术成果，向一流水平看齐”。“高科技普及以来，博物馆学的老师和学生不一定需要像以前那样每天埋在‘土堆和书堆’里了，但一定需要多元的知识结构和广阔的视野，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对服务社会的公益心。”

## 中国博物馆事业：可喜可贺 可忧可虑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文物是历史的沉淀，各大博物馆也以其年代久远的镇馆之宝为自豪。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也以“文物的保藏”为中心，博物馆成为文物陈列的平台。对于这个看法，宋老师认为这是“对博物馆功能的认知和理解不够。博物馆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对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赞颂，也是培养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地方”。

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是新技术全面、深刻影响世界的十余年，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快的几年。2011年3月，经历了4年扩建改造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些都丰富了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

宋向光始终关注博物馆学发展的新热点和前沿问题，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涉及博物馆学及博物馆学教育、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管理等领域的诸多问题。近几年，与国家文物局合作，进行了“中国当代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与管理”、“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中国博物馆职业道德”等课题的研究。

2011年10月，中国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常委会选举宋向光教授为主任。

当谈及业界对其著作《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的赞誉时，宋老师摆摆手，笑着说：“能对这个学科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我非常高兴。但是，我们的博物馆建设管理跟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项事业

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2008年开始，我国各地公立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去博物馆参观的观众的数量增加了很多。各地也纷纷把博物馆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和城市形象宣传窗口，民办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兴起。

但是，对于博物馆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宋向光认为“硬件上可喜可贺，软件上可忧可虑”，并提出诸多建设性看法：首先，免费开放后，博物馆自身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发生改变，而观众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不仅要提高观众服务水平，更要在策展时，以观众为主导，关注公众需求，不能只是政策、经济效益、专家导向，不考虑观众需求，只会让公众把博物馆当成享受免费空调的地方，就越来越难促进公众对博物馆的全面认知。

其次，博物馆发展是城市化的反映，每个城市确实都应该建博物馆，但是要明确博物馆重点不在新奇的博物馆大楼、不在博物馆的数量，而在质量与内涵，博物馆应该能切实起到传播知识、为公众服务的作用。

再者，大多数博物馆依靠政府资助，这也使得博物馆常常只是宣传的窗口。因此博物馆自身也要在坚持专业特性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做好经营，例如：给公众提供租用场地举办画展、文化交流活动等，筹集博物馆运营经费，反过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助力文化科学进步。同时，对于民办和行业博物馆，政府要做好规范和引导，保护民间博物馆人士的一些利益以及珍贵文物。

最后，数字化博物馆可以为观众提供更好地服务，但是花钱太多，因此不能全中国什么样的博物馆都数字化，应该先试点再推广，先在有些馆进行实验性数字博物馆项目，看看新技术能不能在博物馆用，用得怎么样，等摸索出一些经验之后再推广给其他博物馆，用成熟的技术建设性价比更高的数字博物馆。

## 对公众免费开放的高校博物馆

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组建与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建成相伴相生。宋向光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北大的博物馆学教育，也要归功于先进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作为中国高校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建馆之初，博物馆展示、安防、保存设施堪与当时世界一流博物馆媲美，为在北大学习博物馆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条件和展示平台。

走进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靠近门口的展厅里展示的不是古代文物，而是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老师和学生们的实践成果，这些成果的介绍同时被列入博物馆的入馆前言介绍中。宋向光说：“北京大学作为百年学府，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众不能非常直观地了解北大的文化。赛克勒博物馆藏品丰富、展陈设施比较先进，也有对公众开放的很好的条件。这里展现了北大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可以让大家看到北京大学的学术科研实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江主席、胡主席到习主席，三届国家领导人和学校领导等都来参观过我们的博物馆，对我们的科研成果深表赞赏。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博物馆对于一所高校而言，尤其是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摆设或者面子工程。北大的博物馆既要成为北大的基础教学设施，以及提高北大学生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场所，也要成为北京大学展示学术成果、回馈社会大众的平台。在学校财政的支持下，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于2010年元旦正式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这里也成为燕园“一塔湖图”之外的又一张名片。同时，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积极与各地博物馆、研究机构合作，引介最新研究成果，例如：目前，右侧展厅正在展出的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一个新展览：“与猪同行——中国古代猪的驯化、饲养与选育技术及其影响研究”。采访前，在赛克勒博物馆碰到一些外地来的参观者，他们的评价是：“被这个展览的名字吸引了，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当记者把这个评价转达给宋老师的时候，宋老师立即展现出专业学者的学术思维，说道：“这说明博物馆要学会表达，其中如何布展、信息讲解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适逢学期初，采访到宋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身兼数职的宋老师既要忙于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又要忙于准备新学期博物馆学专业的三门课程，指导研究生博士生论文。尽管我多次打电话叨扰，但每次宋老师都会在挂电话前说一句谢谢。采访时，恰逢教师节，宋老师的电话不时响起，来自各地学生的祝福，让宋老师十分欣慰。在与南开大学研究员梁吉生的一次通信中，宋向光这样写道：“博物馆学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要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运用个人的智慧，解读博物馆业务表象下的观念、价值和联系。”这正是宋向光近三十年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而学生的成长与挂念也始终伴随宋老师的教学历程。

## 背景链接

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2000年，考古学系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改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

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如：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他们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

作为考古与文博学院重要的教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大学校园西部，由北京大学和美国友人阿瑟·赛克勒博士合作建成。1986年破土奠基，1993年5月27日正式开馆。展厅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收藏有数万余件藏品，其中多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商代甲骨文，山西曲村西周古墓葬出土的铜器、玉器等，还有陶器、钱币、封泥和民俗文物等。这些藏品始于本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以后陆续汇集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和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的收藏。50年代后，陆续增添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系)从田野考古工作地点获得的教学标本，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和博物馆调拨、赠送的物品，还有海内外文物收藏家捐赠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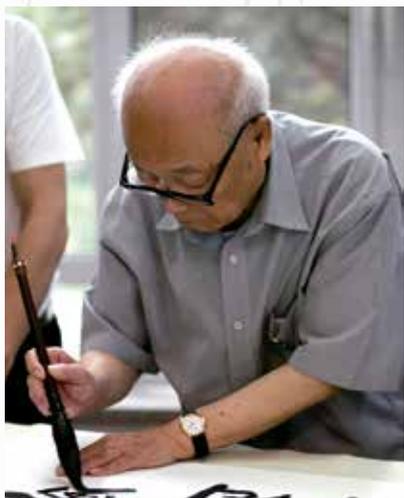
置身其中，你会感到一种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博物馆常年展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收藏的考古教学和研究标本，定期组织展示考古学重要工作成果的陈列，组织由其他博物馆和学术科研机构主办的交流展览。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参考文章：《宋向光：博物馆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北京大学新闻网，2013年5月2日】

6月29日，第三届“北大人”大师论坛在朗润园里新建的北大李兆基人文学苑举行，主题为“书与中华文化”的演讲吸引了众多校友慕名前来，而主讲人正是欧阳中石先生——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学家，北大五十年代初的老校友。先生年逾八旬，视力和听力都已被岁月磨损，腿脚也有不便，然而精神却依然矍铄，谈起中国文字来兴致盎然。演讲中他随时挥墨，用富于变化的字体，向听众介绍了自己对精妙的中国文字的心得体会，与听众一起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与智慧。

和其他五十年代的北大人一样，欧阳先生的人生见证了许多起伏跌宕的世纪转变：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传统文化世界走向民主科学的新天地……在轰轰烈烈的青春里，也有不得已的苦涩滋味。

而他依然平和如是，把时光酿成酒，愈久益甘。



欧阳中石，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学家。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哲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主修中国逻辑史。1954年自北大毕业后，先后在通县师范学校、通县二中、北京171中学任教，任教期间提出语文教育改革方案，取得显著成绩。1981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现首都师范大学），主持创立了高等院校中首个从专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

大师  
论道

## 莫问君得失， 随心自去来

——欧阳中石先生的艺术人生

本刊记者 / 何滨柔

张爱玲的名言常被人提起，“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少年得志固然快意，然而天道往往更偏爱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之人，比如这里将要讲述的欧阳中石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他，师承名师，精通中国文化；然而，当他真正得以施展拳脚，以书法家、教育家的身份享誉大江南北时，已是“知天命”的五十高龄。老先生自嘲：“我这个人啊，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无家可归，只是个教了一辈子书的教书匠。”就是这样一位自称什么都不是的教书匠，却成为国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的大家。

### 少无大志：名师指路，初尝文化

1928年10月29日，欧阳中石诞生于山东省泰安市。这座位于泰山之麓的小城，至今仍保存着“国泰民安”的济世情怀，然而欧阳中石出生的年代却没有半点“国泰民安”的氛围：就在这一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五千多名日军从青岛一直攻到济南城下，焚杀了万余

人。欧阳中石的幼年生活就在这样动荡而艰辛的环境下度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欧阳中石回父亲的老家避难，在农村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私塾授课沿袭古制，上午背《四书》，下午习写字。欧阳中石的古典文学功底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战乱的时局并未泯灭欧阳中石爱玩好动的少年天性。从幼时起，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热衷于尝试，无意之中，竟陆续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有幸与许多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师们结缘。欧阳中石十四五岁时，听说济南城外的古庙有个隐蛰的老和尚，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他拿着自己的作品登门拜访，要拜老和尚为师，过后才知道，这位老和尚就是武严法师。武严虽一口答应，却要欧阳中石向自己买一块钱一张的宣纸练习。当时市面上的宣纸一张才一毛二分钱，欧阳中石家境拮据，一边咬着牙答应，一边则卯足了劲地看老师写字。短短数月，他就熟练掌握了中国书法的各种流派、笔法。不久，法师云游他方，欧阳中石才得知，自己每次上交的“学费”老师早就悄悄还给了自己的母亲。多年之后，欧阳中石在此基础上师从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开始涉足篆、隶、甲骨等书体，逐渐自成一家。

1942年，欧阳中石来到济南读高中。在那里，他遇到了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苏步青觉得这个中学生的数学思维很不错，鼓励他今后钻研数学。欧阳中石摇摇头，“你看错了，你不知道我的数学差点不及格。”时局动荡，令欧阳中石错过了系统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自己的数学成绩在他的印象里从此落下“差劲”的标记。尽管如此，苏步青不久后仍然给这个中学生写了封信，让他今后上北京去读书。

当时的济南中学里有一位从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叫顾谦，是著名诗词学家顾随的弟弟。顾谦在济南中学举办的诗社，吸引了众多学生慕名参加，其中就有欧阳中石。从那时起，这位好学的少年就不止一次地表现

出对顾随的仰慕。甚至有一次，他托上京探亲的顾谦老师为未曾谋面的顾随带两瓶香油，作为学生的年礼。可惜火车太挤，香油洒满一地，没能如愿送到顾随先生手上。这个遗憾怀揣了十几年，直到1950年才得到弥补：就在欧阳中石考取辅仁大学后不久，经顾谦的引荐，欧阳中石成为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听老先生陆续讲授了音韵、杂剧、书法等传统文化知识。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传统戏曲的天下，梨园班子活跃于大江南北。耳濡目染之下，欧阳中石不仅喜欢听戏，常常还跟着在台下唱两句。久而久之，他的唱词有板有眼的，讨人喜欢。1943年的一天，欧阳中石到某票友家里串门，兴致所之，他随口唱起一段京戏。唱声刚落，屋里走出一个人，问：你唱的是什么？欧阳中石说，这是奚派的《白帝城》。那人又问：“那你还会唱别的吗？”欧阳中石应声说会，唱了一段《珠帘寨》。这时，票友才告诉他，这位就是京剧奚派的创始人奚啸伯。就这样，欧阳中石神使鬼差地被“奚老板”收为徒弟，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

少年无心，观者有意。与这些名家的邂逅，令自幼“见异思迁”的欧阳中石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为他后来的厚积薄发埋下了伏笔。欧阳先生对此不无感叹，“我的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骄傲，就是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尽管这些老师教育我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给予我的惠泽是无限的，应该说指导着我的一生。”

## 北大求学：在“民主王朝”苦中作乐

1950年9月，欧阳中石考取辅仁大学哲学系。此时，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全国上下洋溢着斗志昂扬的气氛，各大高等院校也在重建和恢复当中。是年10月，就在欧阳中石刚入学不久，辅仁大学宣布从私立转为国立，其哲学系将携部分同学并入北大。1951年夏，欧阳中

石成为其中的一名幸运儿，来到他心目中的“民主王朝”——北大红楼学习。

如愿以偿进入中国最高学府的欧阳中石非常兴奋，“红楼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不比辅仁那边强，但是学术气氛太好了。”当时哲学系的学生，住在“三院”<sup>1</sup>，学在红楼。一天三顿饭都得以从三院赶回红楼的饭厅。每到用餐时间，饭厅里里外外都是人，学生们还得以在饭厅外摆桌子吃饭。“当时的北大同学以简朴著称，生活都很艰苦。我们看见（这环境），觉得不应该那么艰苦。但一到了那环境，也向北大同学学习，在艰苦朴素中读书。”

生活虽艰苦，苦中也有乐。那时的北大，自是大师云集之处。全国最有名的文化先生们，也经常在北京举行学术讲座，这让欧阳中石开了眼。有一次，欧阳中石和同学正要从红楼穿过民主广场，其间有一段上下的长台阶。同学们正要下楼，看到楼上来一位先生，居然是汤用彤。汤先生时任副校长，却还坚持为学生讲课，深受学生爱戴。两个同学紧张得赶紧站到一旁，不料汤用彤自然地收回已经迈上台阶的脚，步步退了回去。“当时我们说不好是什么心情，但是心里很激动。我们让老师上来，但是老师一直招手，让我们下来。我们实在拗不过老师，我们就下来了。越是这样，越觉得心里愧疚。”

受到如此热情、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自幼“不学无术、见异思迁”的欧阳中石决心好好学习专业知识。“我过去不懂要学专业，只知道让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让学什么就学什么。”来到红楼不久，欧阳中石就写了一篇关于特称判断的专业论文。当时在清华教书的张岱年先生曾在辅仁大学讲过课，与欧阳中石熟识。欧阳中石就去清华把论文交给了他，张岱年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在北大搞逻辑的金岳霖和王宪均。

此时的北大哲学系正迎来风风火火的发展时期。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北大同时从沙滩红楼迁至燕园。一时之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大哲学家齐聚燕园，出现了哲学系教师比本系学生还多的盛况。这让作为学生的欧阳中石很是激动，“就这一下，我们太幸福了。全国的哲学家我们都见到了。”

在北大求学的时光是欧阳中石最幸福、也最怀念的岁月。“我在北大的时间有3年。所以思想一直在北大，特别是在红楼。”有一幕至今令他印象深刻：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北大的所有学生在红楼汇合后，集体上街游行，队伍的前方抬着红楼的模型。当北大的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东的马寅初校长小跑到楼中央，对毛主席说，那就是沙滩红楼，我工作过的地方。大家看到这一幕，倍受鼓舞。

尽管在毕业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欧阳中石没有直接从事逻辑学的相关研究，但哲学的基本思维一直对他发挥着持续影响。他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课上，老师问：“学哲学是学什么的？”大家众口不一，有说中国哲学定义的，有说西方哲学定义的。老师笑了笑，说：“我认为学哲学，学的是俩字：学聪明。”当时大家引为笑谈，事后越想越有道理。欧阳中石说，“我到以后连化学都教了，为什么？因为哲学确实可以囊括一切，它的道理可以用于各处。逻辑就是我的方法学。”

### 基层教学：数十年如一日

1954年，欧阳中石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等待着组织的分配。他本以为自己会

1 注：此处的“三院”应指沙滩红楼外的学生宿舍，而非今燕园校区静园草坪西侧的三院。

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但分配结果却出乎意料：去河北教育局报道。报道之后，欧阳中石才得知，由于苏联当时反对逻辑，大多数学校不让开逻辑课，欧阳中石顿时失去了一技之长，被分配去通县师范学校教数学。

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他的同窗李泽厚、谢龙等已经在学术界大放异彩，积累了骄人的学术成绩，欧阳中石则默默地在河北省的一个普通院校从事着基层教学工作。他从数学教起，后来又陆续转教语文、化学、历史、甚至体育等学科，有什么需要就教什么，不懂的科目就边学边教。尽管现实不遂人意，欧阳中石的心境却始终平和，他把这视为生命的历练。“我（人生的）前半截教书，教这个那个，看起来我的路很坎坷，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是对我的培养。学哲学之前，要我概括这个学科、那个学科，很困难，但现在就有条件了。哲学的思想在我的教学中得到了实践，我觉得太好了。”

1977年，欧阳中石迎来他生命中的一次转机。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社会各界从一度批判、否定知识的姿态中走出，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人才调动的大潮。在欧阳中石与一些高等院校联系调动事宜的过程中，北京一七一中学看中了他，抢先一步调走了他的档案。1978年秋，欧阳中石离开生活了二十四年的通县，拄着拐棍来到一七一中学任教。此时的他，已经因一次抢救学生的见义勇为行动而导致左脚残疾。

经过二十年的“卧薪尝胆”，欧阳中石很快就在北京语文教学界崭露头角：他向东城区教育局提交了一套语文教改方案，指出中国语文教学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年，按字法、词法、语法、修辞法、思维法、章法重新选编语文教材，系统掌握汉字的规律；第二年，在初略涉猎所有文体的基础上，重点学习议论文和抒情散文；第三年，学习中外文化史，开阔学生视野。这一超前的教改方案获得了一七一中学的支持。校方拿出四个班作教改实验，采用欧阳中石编写



▶ 欧阳中石“北大人”大师论坛演讲

的语文教材授课。实验班的学生参加高考语文测试时，平均成绩比区内其他学生高出了整整6分，引起轰动。

凭借出色的才干，1981年，欧阳中石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结束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基础教育生涯。此时的欧阳中石已经五十三岁。

### 大器晚成：韶华过景人未老

在北京师范学院的头几年，欧阳中石一边继续研究语文教改课题，一边拾起自己的老本行——逻辑学。除了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兼授逻辑课，欧阳中石不分日夜地埋头于典籍当中，参与逻辑学教材和逻辑史的编撰工作，合作出版了《中国逻辑史》、《逻辑》等著作。而为公众所乐道的“把书法教育引入高等院校”这一成绩，却是“事出偶然”的收获。

八十年代的中国洋溢着一股讨论与研习传统书法的热潮。不仅在国内，日本、韩国等国家也都热衷于学习和交流中国传统书法的问题，中国书法教育体系的创立呼之欲出，只差一个领头人了。在此之前，就曾老同志向中央建议设立高等书法教育专业，却由于时机不合而被搁浅，这个想法在业内却未消散。在一次跨越多省的实地文化考察中，欧阳中石注意到，全国基层文化馆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精通业务的干部都没有相应的学位文凭，而这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书法专业的缺位直接相关。这激

发了欧阳中石创办高等教育书法班的灵感。在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欧阳中石带头向首都师范大学申请，创立了成人书法教育大专班。提议一经公布，便获得学界和书法界的广泛响应，季羨林、李泽厚、叶秀山、启功等文化大师纷纷到校讲学，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业内活跃分子的优秀学员。2005年，首届书法大专班的毕业作品展在香港、北京两地举行，引起广泛反响。初试成功，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欧阳中石的提议和推动下，首都师范大学相继创办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书法教育学位，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从大专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中国书法教育体系的高校，欧阳中石担任硕士、博士生导师，成为书法家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书法教育工作者。

公众都把欧阳中石视为一位书法家，欧阳中石却不以为意。“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比我写得好得多的人。”与其留心于外界的赞誉和追捧，欧阳中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字上。“我的注意力现在不在书法上，在汉字上。我觉得书法艺术、戏曲艺术和科学知识有共通性，而我们中华文化的字把这一切都连在一块了。”从早年广泛涉猎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欧阳中石一步一步地走向对中国汉字的追寻。在他看来，汉字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对于自己颇带传奇色彩、“大器晚成”的一生，欧阳中石的慨叹都浓缩在“教书匠”这一自我总结当

中。“应该说，我这一辈子从启蒙上学开始就没离开过学校。对于这些经历，应当这么说：我想这样做吗？我不想这样做，我没有想到，但是，时代和环境让我就是这样做了。当时看不必为此而烦恼，今天回头看，是有钱都买不来的财富。我想来想去，教书匠对于我是最确切的。”

当了一辈子学生，教了一辈子书，欧阳中石极为强调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个学生成不成才，老师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一定要深刻地知道自己身上的负担，不是能开玩笑的。”他以为，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德，“我们就是要让学生保持他的德。用德把他竖立起来，成长为一个。我们教学生，就是使学生得到成长。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参考资料：

《蒹葭苍苍》，欧阳中石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石访谈》，黄殿琴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金石为开：金岳霖的人生艺术和欧阳中石的艺术人生》，卞毓方、杨清汀著，作家出版社。

# 欧阳中石谈文论艺

## 汉字：

汉字作为人们的信息，它所能表现的能力太强了。有的语言只能解决声音问题，声音和意义到底有什么联系不知道。“book”都懂，这是书，和声音概念本身没瓜葛。但是我们中国字呢，想了个办法：画个画，就有直接联系了。画个人就是个人；说个手，画出来，一看就知道是手啊；画个山就是个山。用画画出个图形来表达事物，很高明。你懂，我也能懂。中国的这个文字就有直接的联系，用画的画代替事物的那个样，人们有感受。所以，中国字的形成，中国字的发展就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我们有象形，先画出来一部分，再用不同的形让你猜出里边的意思，就是会意的一部分。根据这个原理再扩大，还不够使啊，就加了形声，带有声音的事儿也参与进去了。我们按部首分类，就等于把天底下的事物都进行分类了。对事物的分类，看来就是对文字的分类，实际上就是对人世的分类。比方一个木字边，带木字边的有多少，考虑一下这是什么类，我光认识一个“木”字就能认识一片木字。要认字的话，一个个的碰，得碰到哪一年才能认全了？这个中国文字的思想系统不代表人类的思维高度，不代表人类的文化高度吗？所以中华文字的出现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成熟的标志。（《中石访谈》）

汉字的特质以及字体、书体特征对书法作品风格有充分的影响。书法艺术是在符合汉字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拓展艺术蕴涵。文字学研究汉字字形结构、书体特征等方面的规则规范，书法首先必须遵循这些规范，然后发挥、超越。书法家首先要对文字烂熟于心，继而淋漓挥洒，达到“物我两忘”、“我物合一”的境界，由此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洞察、体验。（《文化漫谭》）

我认为文字走向简化，这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汉字也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简化中。但汉字简到一定程度就不简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思考。我想这有它的原因，有它不能动的原因。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第二，我认为如果要简化的话，一定要简得合理。如果要用减少声音、合并字形的办法，这就不好。这是压缩文化的办法，把文化缩小了。这就不是简化汉字，而是简化文化。所以说，繁体字、简化字都是中国字，我们最好不谈繁体字和简化字的好坏，我们说中国文字有一些不合适的就要改变，不管它是繁的，还是简的。（《弘文载道，切实如需》）

## 书法：

有人以为书法就是写字，这个观念不对；“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在流传中，认为如果只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书写的内容是文字，文字的展现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写出来让人如果不认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须写的是字，写出来的字还应尽可能地好看，否则就会降低它存在的力量。书法技艺是在人生阅历、自身文化不断丰厚之后而日渐完善的，写出的字必须正确、美观，怎样才能正确、美观，就需从多方面考虑：字的形体、字意的组合、辞意的合时、合体。字的形体是重要的一项书写内容，在历史上有成功的规范，历史上早已经有了评定，不能粗疏任意。世界上所存在的学问，一点瓜葛都没有的学问几乎没有，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许多的学问不能是无用的，有些是近距离的，有些是直接的。诸如文字学、文学中的诗、词、曲、联，字体书体的历史、美学、哲学、品鉴理论、行款格式、称呼仪礼、纸墨笔砚都有许多讲求，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书法”是一门有

著名书法家田英章曾说，“欧阳中石先生应称得上是当代一位奇才，不可多得的奇才。”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的业余爱好——京剧和书法都超过了专业水平。启功先生曾诗曰：“三管齐挥书画诗，丹青之外见奇思。郑虔应逊今贤博，檀板轻敲乐句时。”后记便是：“中石先生并善，按拍可称四绝。”

在书法技艺上，欧阳先生兼通书法各体，而尤擅长行草书，形成以唐楷筑基、以晋书为风神、以魏隋为参化的审美趣味。在整体风格上，欧阳先生的作品以“飘逸沉稳、刚健温润、灵动厚重”的风格而称著，线条优美，但不媚、不艳、不俗（美学研究者曹利华语）。而其草书则达到了“高古醇厚、精彩动人，劲险刻厉、妙于取势”（田英章语）的艺术境地。

“书虽一艺，与性道通。”从欧阳先生的书法作品走近其本人，不失为一条近距离感受其人风采的捷径。本刊特摘录欧阳先生的书法作品若干，与读者共赏。



▲ 天下三春无正色，人间一味有真香

关书写的学问。

书写点画组合而成的字并不是书法这门学问的全部，写出的字的功能是要“载道”，表达一定的意义，为生活需要服务，为我们的社会服务，让人们在看了书写的内容之后，启发思考，获得教益，这就是“启动情思”。这就需要我们启动思考，把人生的道理、哲学的思想、世界观，自己努力的方向都融会起来，把自己的情趣、追求都容纳进来，用各种恰当的题材展示我们的思考，这才谈得上“载道”。（《文化漫谭》）

书法是说的关于书写的学问，而绝不能拿着一张字就叫书法。书写，如果从实际来说，就是从写文字传达实意来说，这是小学、中学可以解决的，可是作为这门学问，它已经源远流长了，它已经从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字的问题，它需要有它一系列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很深。所以我们一说到字和文，就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书学研究者需要牵扯到多少辐射到的知识。那么说，它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看来是小事情，却是大学问。但是，我们得做得好，我们做这方面的教育工作者，能不能使它满足我们国家现在形势的需要？所以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书法是串珠外的一层光环。字是结晶，文是串珠，书法是光环，这是三个点。（《蒹葭苍苍》）

书一事，析之为三：书艺、书学、书道。

艺者，法也。技之为艺，必眼会心，手会心，皆须能得于人，能出于己，能将千古置于左右，必待无所不能，始可游刃其中也。

书之为大学问，必应知其所以然也。书者，书字也，汉字也。古者如何，今者如何，如何变来，皆有所自。史学者，有迹有论，言之、记之、论之成理，有体系，有资料，有佐证，即可信也。书论者，论求书之优劣高下。如何而优劣，如何而高下也，以至于定其标准、尺度耳。

所谓书道者，或谓之书德，皆可，但绝非日人之谓也。道者是其本质，德者是其所守之本分也。（《蒹葭苍苍》）

## 艺术：

艺术是一种追求“美”的方式方法。

“美”是什么呢？我想：她首先应当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一见钟情”，或者“渐渐倾心”，但“不能离去”、“越来越深”、“思之益坚”的感受。

为什么会有了“美”的感受？当然首先是对象有“美”的素质、

“美”的条件。否则，对象本身没有让人感受“美”的素质，这对象就没有让人得到“美”的条件的条件。这就是说“美”有着客观的条件。（《京剧艺术漫谭》）

搞艺术“要有灵感”。灵感对于艺术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灵感的人不要去搞艺术，勉强去搞是费力不讨好，所以灵感几乎成了艺术所特有的一种秉赋。（《京剧艺术漫谭》）

灵感是人们所特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受”，一是“放光”。这种能力基本上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的。“感受”能力强的会在某些方面感受的内容丰富或者强烈。譬如有人对多种花的欣赏上有特别的研究，无论是花朵花瓣、花蕊、花色的鉴赏方面，他都很在行，理解、掌握上也很准确。我们必须认识到，感受的能力强，这是从客观世界取得更多的一种表现，是多一份幸福的表现。对什么都麻木是一种无知与贫瘠的表现。人们唯其能感受外界，才有可能认识外界。因此，我们要在许多方面发挥“灵感”的感受能力。“放光”是“灵感”中最为珍贵的能力。当然这种“放光”的能力必须在感受能力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正因为有感受，才能使感受放出“光采”。所谓“放光”，就是使美的感受得到更高的重现与升华。这种现象是灵感的展现，是灵感综合了感受而发出的火花。（《文化漫谭》）

艺术使人从精神途径触摸到外部世界，加以理解，加以欣赏。因此，艺术是人生离不开的一种自己安慰自己的重要手段。光凭想象，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无法体现出想象的程度。艺术把它们具体出来，展示出来，画出来可以看得见，变成声音就能听得见，艺术把它落实了。艺术活动具有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一点展示出“艺”的功力。甚至说，艺术是人类生活走在前头的东西，引领着人们不断向前。（《蒹葭苍苍》）

科学与艺术，都是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人的能动性，认识它，整理它，并把它理出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改造一个世界，向更美的世界走去。科学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无论科学还是艺术，哪个方面都不能离开，都是我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一认识在我的思维中形成了这样两句话：“搞艺术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搞科学最好也找一点艺术的灵感。”（《京剧艺术漫谭》）

“人情”是社会生活中“规则”性的要求，我们应当看到“天理”和“人情”在人的生活中是并行不悖的。“人情”应当在“天理”的制约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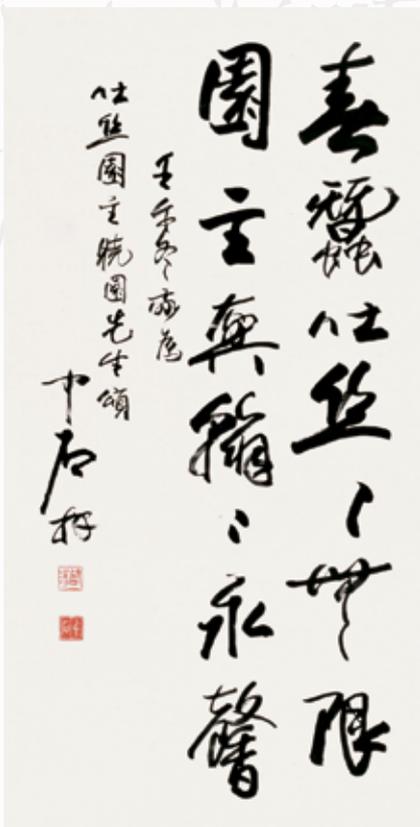
春潮滚滚水滂沱，极目汪洋泛海波。  
莫道礁礁拳洞小，洪流过后淤成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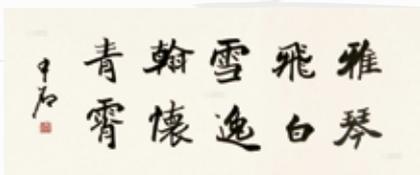
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



▲ 朝益暮习



▲ 春蚕吐丝丝无限，园主奋翰翰永馨



▲ 雅琴飞白雪，逸翰怀青霄

形成自己的规范，可以在“天理”所容纳之下，充分地施行“人情”，甚至于很好地去发挥。“艺术”正是要在“天理”的制约下充分地去满足“人情”的需要，更为“美好”地使“人情”闪出“火花”而放出光彩。（《京剧艺术漫谭》）

### 戏曲：

中国人有着了不起的想象力，在戏曲艺术中，为了更好地表现，便有了一些形式上的办法，用这些办法，把历史人物，把传说中的人物，把神话中的人物，把许许多多的假人假事装扮成真人真事，集中到一个舞台上，让它有形、有声、有节奏、有感情，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种要求是在中国的戏曲中随着想象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戏曲，不光是京剧，以至于各种地方剧种都是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蒹葭苍苍》）

戏曲反映到舞台上是一种表演艺术，讲究三点：劲，数，味，汇集成一个字，便是“擞儿”。在京剧界，唱腔有颤音，叫“擞儿”。余叔岩曾说：“我无句不擞儿。”“擞儿”到底代表什么呢？奚啸伯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蚰蚰相斗之前，伸伸须子，蹬蹬腿儿，使出的劲儿很有力量，这股子劲儿就是“擞儿”。“擞儿”就是一个振奋的动作，京剧演员子在舞台上的表演有令人振奋的特点。“擞儿”是戏曲的神儿和魂儿，整个舞台都能用这一个字统一起来。（《京剧艺术漫谭》）

传统戏曲的表演比较重视表演规律，规律就是体系，掌握了这个规律，演戏就开了窍。舞台经验很丰富的燕园，很善于总结演出规律，因而，那些在表演上自成一家、独立成派的好角儿，在表演创造上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戏路子，而且有独到的表演见解。

戏曲表演中的许多技能或者说是珍品，大多收藏在老艺人身上，人在技在，人亡艺丢，所以说戏曲表演特别需要继承传统。传统这东西，听起来寻常，其实非同一般，说起来简单，细捉摸起来道理深奥。（《中石访谈》）

表演也是有程序的，不管是谁都得上下场、都得坐下，都有唱念做打，都有下场，我们往往把它归到程序化。程序化甚至成为了戏曲的缺点，然而我们仔细地思索一下，正是因为程序化，才沟通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共识，而观众正是通过这些程序化的表演，认识了历史上的一切，也认识了现实的一切。因此戏曲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蒹葭苍苍》）

看戏干什么？是单纯的娱乐吗？台上杀了很多人，我们就没有娱乐了？不是。我们是看戏的情节，看那里面表现出来的感情，它们都是我们谈话的资料，但是结论呢，是给我们兴趣。应该说，我们的京剧、我们中国的戏曲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来感染我们的情绪。她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蒹葭苍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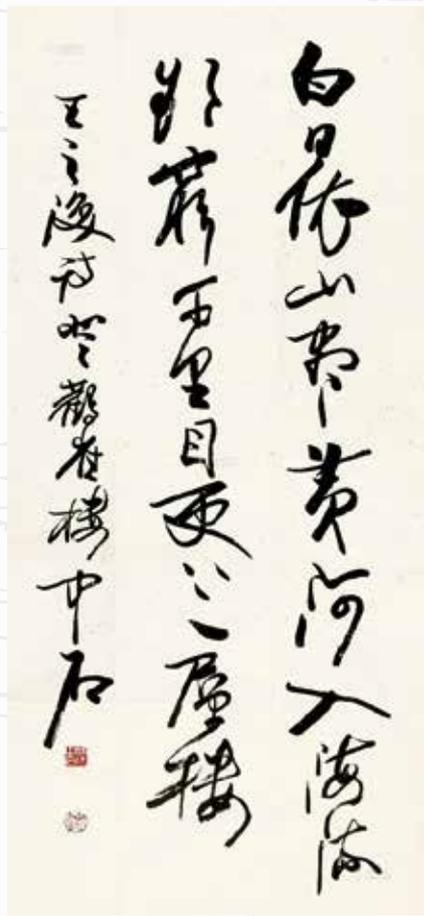
## 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这个字，不是文字、文学，它是一种美好的形象。“文”本身是一种美好的形象，一种美好的现象。自然界五色成文，各种颜色集中在一块儿，不乱，很有章法地排列出来，这就是“文”，这就是“文”的要求。什么叫“文化”呢？就是把这种“文”，大家都具有了，普及了，每个人都符合了这个思想，都符合了美好的思想，这个本身就是文化。就是使美好化及天下，以文化之，这就叫文化。（《京剧艺术漫谭》）

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天人之际”，两大关键要素就是人和自然，这两者之间当然也可以分出主次。我们研究文化，立足点非常要紧。关键是要抓住文化的根本，抓住文化问题的因果关系。

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看法就是：天人合一，人为主。人与自然，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天、地、人“三才”。汉代王符《潜夫论·本训》中说：“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天、地、人相待而成，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密切，密不可分。人站在天地大自然之间，确实能够理解自然，乞求自然，自然也能按人类的意思作出贡献。人对自然的要求时时刻刻从自身的主观需要出发，人对于自然的理解无法超越自身在特殊阶段的文化局限。所以在文化系统之中，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主。地是舞台，天是背景，人是主角。我们研究文化，一定要研究人，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研究人类，研究人与之间的关系。（《文化漫谭》）

美好和谐是文化的核心要求。要能够如此公平、和谐地相处，达到全人类的“美好和谐”，没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不定出一个共同的规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的先贤对这个问题早有认识，他们提出了一个“德”字。早在《庄子》这部书里就提到过“德”，以为“德”就是“得”，“物得以生谓之德。”德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虽然不是东西，但是一种很不一般的内在的一种能量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东西”生长，会使“事情”成功。可见德是一种可以增强生命的力量，可以推动成功的力量。我们怎么样来说明这种力量呢？我体会它是一种“劲儿”，说是一种“契机”似乎更容易被理解。



▲ 王之涣诗《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德往往首先被理解为是一种品性，也就是“品德”之德。这种德以一定的规矩作为判断依据，就有是非对错的问题。符合这个德的标准了，就是对；违背了，就是错。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的要求尤其严格，公德、私德两方面都很注重。

德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信念，人类在文化发展的问题上任重道远，“行百里路半九十”，更何况文化之路可以说是有始无终的。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毅力，只有一时之“能”，我们就很难坚持到最后，往往功亏一篑。当对事业、对文化有坚定不移的想法的时候，人能坚持不懈，一代一代传承积累。

总之，人应该具备不同层次的“能”，这是实现目标的基础。而“德”往往决定“能”所实施的方向。为了保证全面的美好和谐的要求，人们必须有一个“德”的契机，这才是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美好的文如何得到和谐，要通过“德”这个契机；如何达到全面的“化”，也必须依“德”的契机。所以中华文化能有如此的生命力、凝聚

力，与这一个“德”字，分离不开，也可以说：“德”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本质性的核心。“德”和“能”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德”与“能”的有机、和谐结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充分保障。（《文化漫谭》）

我想讲一个概念，关于传统。这个字眼应当怎么理解？我估计有很多同志这样理解：传统就是旧的，不是现代的。这句话不全面，传统不等同于旧有的。传统是从古时开始，一直到现在还被这样理解的这种认识，到今天，甚至于到明天、到后天，还起作用的，叫传统。历史上有过，但传到现在不实用了，这不叫传统。这里有一个规律，就是代表人类大多数的好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把它纳入到传统中去。因此，传统是在无限地延长，而不是到今天为止。如果今天出现真正好的东西，也会纳入到传统中去，如果入不了传统，那只是一时的昙花一现，没有历史的生命力。（《蒹葭苍苍》）



▲ 《少昊颂》：己家少昊号穷桑，德羨金天摯奉王。世世相承尊教化，龙传一系继炎黄。

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述三个校友的故事。这三个校友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北大人，他们成长的环境，生活的经历可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他们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追求也各不相同，各有属于自己的执守。然而他们所走过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投入百分百的努力，焕发生命的精彩，抒写跨界传奇。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你愿意。

校友  
风采

## 一生所爱 一世辛勤 ——罗益锋的赤子传奇

本刊记者 / 王佳宁 赵福斌

罗益锋，印度尼西亚归侨，浙江勤县人，1957年6月回国，1958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会长、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主任、《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主编、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组长、中德固体钒电池合作项目中方首席专家。

先后获国家级、六部委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和科技信息调研成果奖37项。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2次）、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次）、全国化工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4次）、在国防化工创业和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侨界“十杰”等超百项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曾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他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任岁月动荡，时代变迁，他自岿然不动，潜心科研，取得一个又一个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成果；他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日以继夜走访群众，积极履行为民众排忧解难的职责，被海内外众多媒体誉为“议案大王”；他是一名归国华侨，兢兢业业为维护侨益，进而至于为维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而奔走前后。如今他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担负着常人难以负荷的工作量和重任，为攻克关键行业技术难关而夙兴夜寐。

一个人究竟要怀着怎样的信念、意志和精力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在见到罗益锋以前，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在见到罗益锋之后，问题变成了最真切的感动和震撼。

无论是从身姿上还是谈吐中，都看不到太多76年沧桑岁月在罗益锋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精神矍铄、热情质朴、平易近人，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浑身上下充满了“正能量”，甚至令人不禁想到了“朝气蓬勃”这样的词语。



## 一颗丹心向祖国

回首看当年，今日的一切其实早就在生命的开始就播下了种子。对于罗益锋来说，一切都和那一颗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无限眷恋之心有关系。

罗益锋出生在一个印尼华侨家庭，和兄弟姐妹们一样，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印尼度过的，不同的是，罗益锋是家里唯一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我祖父的遗愿是去世后要安葬在家乡，我是在父母回到浙江勤县安葬祖父时出生的，满月后才回到印尼。”说起这件事情，罗益锋脸上有着淡淡的满足的笑容，似乎在祖国出生是一件非常幸运且值得骄傲的事情。

吃的是印尼的米，喝的是印尼的水，心中却对祖国怀着深深的爱和向往，听起来颇有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浪漫味道。“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华侨在国外无依无靠，很有一种寄人篱下，任人欺凌的感觉。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都觉得高兴极了，觉得终于有了强大的依靠，不知不觉间对祖国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归属感。”



▲ 1959年罗益锋（前左1）与同班同学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



▲ 1957年罗益锋（前左1）离别印尼回国前与好友合影留念。

说起在异国他乡的感受，罗益锋犹有沉重之感。

青少年时的罗益锋虽然生活在印尼，但仍和祖国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华文学校，读华文报纸，关注中国的一切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印尼的青年华侨们普遍的生活状态。此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寻找一切与祖国直接联系的机会，罗益锋经常与生活在上海的表哥书信往来，这位表哥从来没有出过国，是一名在50年代非常活跃的党员。这帮罗益锋了解了国内的很多事情。

有三件事情对少年时代的罗益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筑起罗益锋回国之路的至关重要的基底。

第一件事情发生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不久，中国第一次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国际经济博览会。那时刚考上雅加达中华中学的高一学生罗益锋作为品德兼优的学生，获得参加中国馆的建馆义务劳动的机会，这消息让他兴奋不已。此后这些参建学生收到了中国

大使馆的邀请，参加博览会的开幕仪式和首日参观。罗益锋看到美国馆就在中国馆的斜对面，两馆之争十分激烈。当时美国馆展出了50年代初十分新颖的电子高技术产品，观众刚进馆不久便可看到自己刚才进馆的场景；还建造了人造冰场，派冰上芭蕾舞团助兴，以此吸引来自热带地区的观众。然而中国馆却以建国三年来自力更生的成就，展出别开生面的农业馆、轻工业馆和重工业馆，罗益锋从未看到如此巨大的南瓜、土豆，也想不到国产钢笔头结实得可当小标枪往黑板上射。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他看到许多从千岛之国的边远岛屿赶来的老华侨，大家看到中国馆的建设成就，激动之情由心底涌出，难以名状。他第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光荣，并暗暗下定了回国深造，建设祖国的决心。

第二件事是1955年初，罗益锋又被派遣参加了第二届国际经济博览会开幕式的服务工作。闭馆后，

罗益锋和中国馆工作人员一起品尝着祖国各地的美酒，畅谈至深夜，听着工作人员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罗益锋酒不醉人人自醉。

第三件事情则是周总理的访问印尼之旅。1955年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后，周总理正式应邀访问印尼。当时正在上课的学生一听说总理的专机下午抵达雅加达，学校一下子便空无一人。几经周折后，罗益锋终于见到了周总理乘坐的敞篷车缓缓驶来，当车快到跟前时，人群中的罗益锋使劲伸出手臂，终于握到了总理的手。那一夜，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上学时，罗益锋一下被同学们围住争相握他的手，来分享这种幸福，有一位同学竟问他有没有洗手，想沾总理的福气。

受到这些激动人心的经历的鼓励，罗益锋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从高一时勉强上学校优秀生红榜的总平均分81分，升到高二的89分和高三的95分，荣获了1955年中国学生代表团访印时赠予学校的12枚和平鸽纪念章之一。

1957年在印尼警局办回国手续时，警长为了挽留罗益锋这样的人才，甚至提出推荐他去万隆工学院的条件，但罗益锋执意不肯。警长于是便取出一张白纸要他按上十个指头的指印，白纸上写着“保证永远不再回来”，考虑到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这几乎意味着与父母的永别。罗益锋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指纹，警长又领他到一间地上涂有墨汁的小屋，要他走一圈，出来时在一张白纸上留下重重的脚印。陪同他的母亲看到此时的情景，知道她的孩子从此将永远离开自己的身边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罗益锋说，那时自己的



▲ 罗益锋在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办公，在这里他铸造了事业的辉煌。

心里像刀割一样一阵酸痛。

提及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稀如昨，罗益锋的情感变化甚至还会随着叙述跃然眉宇之间。那个时代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是如此自然、淳朴、深厚，是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的。那种感情实实在在是那一代华侨奋斗的理想、目标和方向，是足以战胜一切阻碍的力量源泉。罗益锋说，正是这种力量让自己强忍着与双亲分离的痛楚和辛酸，毅然决然踏上归国的征程。

##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57年，罗益锋正式回国，对于一路上看到的景象和经历，罗益锋印象深刻。“我们坐船一路到香港，进入香港九龙，然后由小船再上岸，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大陆，那时候的香港九龙甚至还不如印尼。每个车箱里都有香港警察，防止有人会跑到香港。”罗益锋回忆道，“但是当火车到达香港罗湖海关，香港警察看到我们的边防战士时都低头折腰，这种场景让我们非常振奋。此外，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听到歌唱祖国的歌声，让人心潮澎湃。”刚刚走下火车的罗益锋就不禁流下了热泪。

然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与罗益锋和同学们想象中的祖国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当时的香港罗湖海关只有一个招待所，空间有限，罗益锋只能在大食堂打地铺休息。第二天坐火车路过广州，那时的深圳也只是一个小渔村，非常荒凉，要到口岸需要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沿路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子。看到这样的中国，很多人都后悔了归国的决定。罗益锋则跟随提前一年回到中国的姐姐的脚步，来到北京开始人生新的里程。

1957年6月，罗益锋进入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补习政治等课程，次年便考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当时正值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之际。国内似乎并不是像自己之前在印尼了解到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和谐友爱的关系，反而各种各样的揭露和斗争扑面而来。罗益锋当时还是少年心境，刚刚回到祖国，迫切想要跟上国家建设的步伐，于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连滚带爬”地跟上形势。罗益锋还记得当



▲ 罗益锋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就座(左)。

时为了响应号召，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只好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搜寻自己“思想上的弱点”，最后就说自己上北大是出于名利思想作怪。

很快真正的磨砺开始了：周总理到北大动员全校师生到湖南和广西参加大炼钢铁，他被分到湖南高崇山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和教育。每天早上军训，天未亮便背着书包跑遍湘南的山山水水，傍晚背着沉甸甸的铁矿石回来，吃完饭还要参加高炉炼铁的艰苦劳动，并培训当地的化验人员，就这样整整100天的锻炼。回忆起这段经历，罗益锋认为自己还是收获不少，使自己具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且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他们培养了感情。

吃苦耐劳、愿意付出或者也更有可能是罗益锋的天性，而并非全出于环境的压力。1959年的寒假，罗益锋和姐姐罗彩云一起到天津河北纺织工学院度假，罗益锋姐姐的男友是该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他们姐弟俩主动参加学校的积肥义务劳动。除夕晚上全校师生要返校聚餐，姐弟俩一早

就帮厨房大师傅一起赶包饺子，晚上又当起服务员给师生端饺子。当姐弟俩返回各自学校时，北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的系宿舍门口已张贴了河北纺织工学院团委的大张红纸表扬信。随后北大校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谁是真正的主人？》的文章，介绍他们姐弟俩寒假期间在他校房客为主，积极劳动的故事。

就在这一年六月，《新北大》校刊刊登了罗益锋写的“我为什么要求入团”的文章。“七一”前夕他们姐弟俩几乎同时加入了共青团。

六年大学生活不算很长，但是也足以成就一个人，按照罗益锋自己的说法，他从一个“公子哥儿”逐渐转变成了初步掌握现代化学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北大的六年着实让我得到了不怕吃苦的历练。”罗益锋这么评价自己的大学生活。

### 莫管风吹浪打 只求科技进步

1964年罗益锋从北大高分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化工部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从事腈纶的科研工作。他凭借在北大所获得的扎实的高分

子基础知识，很快在科研实践中掌握了基本聚合和纺丝技术，并根据需要自学日语和德语，半年后，便能够查阅和翻译专题组所需的所有专利和文献，而且很快当上了课题负责人之一，并提前完成了高难度的攻关课题，被所党委命名为全所第一个大庆式的专题组。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罗益锋和他的同事们要继续大展宏图之际，“批判三家村”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不久罗益锋就因为不符合“三代红”的条件被抹去了领导职务。那时在全所批判“白专道路”和“崇洋媚外”的运动中，稍不留神就会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随后的“造反有理”运动使全所陷于瘫痪。正常的科研生产环境完全被破坏了。

但罗益锋始终坚信中国总有一天还是需要科学技术，需要靠科技振兴中华。于是他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应付复杂环境的同时，闲暇和节假日便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偷偷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抄录快速发展的国外新技术，自己抄不过来，星期天还叫他女友一起抄，女友不会日语就让她照猫画虎写，冬天手都冻僵了还在空无一人的阅览室查阅资料。罗益锋戏称自己和女友就是在这样的工作中谈恋爱的。1968年罗益锋和女友结婚，寒风中的爱情等来了甜蜜的果实。

就这样，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迁，都不会影响罗益锋开展科研的脚步。罗益锋的坚持、执着，还有一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定

神闲，让他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到1977年初粉碎“四人帮”时，他一人就已经完成了十多项专题任务，内容涉及合成纤维的全品种，无形中他成了全国最了解国内外化纤最新情况的专家。1977年3月北京市科技局在天文馆举办“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报告会，罗益锋是唯一一个以技术人员身份发言的人，然而他的报告却引起了轰动，并作为五篇优秀论文之一被选送到北京市科技大会交流。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科技人员开辟了广阔施展才能的天地，罗益锋更迎来了自己各项事业的巅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归侨有海外关系，许多人在文革中被扣上莫须有的各种罪名，政治上不受信任，工作上不予重用，因此在1977年我国提出“来去自由”的政策后，全国侨界掀起了出国热，罗益锋姐姐一家也移居香港，姐夫很快被英国公司聘为中国区销售经理，住的是北京饭店，外出乘出租车，工资相当于罗益锋的18倍。而他在香港的表妹夫在英国轮船公司当高级职员，工资是他的80倍。他们以及罗益锋的父母都曾来信问罗益锋要不要去香港发展。如果赴港，罗益锋每月拿到3000港币不成问题，而当时他在大陆的月薪只有62元。

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罗益锋坦言自己有过思想斗争。但是回想起自己当年回国的情景和初衷，想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在面临崩溃边缘的状况，想到祖国对科技人员的需求，罗益锋还是毅然决定留在



▲ 罗益锋参加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代表团出访萨摩亚时与萨摩亚总理亲切交谈。

祖国继续自己的科技研究工作。

### 步入政界 为民请命

1984年在全民普选中，罗益锋被选为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最初他对代表工作的意义没有认识，他曾到选民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工作实在太忙，不想承担这份工作。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告诉我‘人大代表不是谁想当就能当，谁想不当就可以不当，这是选民的意志！’”罗益锋笑着说。他后来以最高票当选，从此成为了一名兢兢业业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

罗益锋会在会前走访附近的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和机关，甚至向工厂中班的职工征求意见后，继续征求夜班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切实关系人民利益的议案，解决了红领巾公园长达八年未解决的严重污染问题，涉及到近8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经向当时的市长反映后，由市、区政

府和附近大企业捐助，终于开工治理，当天人民群众竟燃放鞭炮为告别臭气熏天的日子而欢庆。诸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1987年罗益锋被朝阳区人大常委会评为“优秀人大代表”，并在朝阳和通州区全体区人大代表会上介绍履职经验。

1988年起他连续四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起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他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每年要征求500人次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意见，代表人民参政议政。

2000年《中国新闻》和香港《文汇报》记者不约而同地在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展开调查，了解谁提交和被录用的“议案”最多，结果罗益锋被海内外各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及网络媒体封为“议案大王”，其中包括香港的凤凰台、英文版的《南华早报》及印尼的华文报纸等。

2000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托罗益锋反映了7件涉侨案件，

其中有一件是香港上市企业的房地产案子，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大案，在过去五年间该公司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要求改判，但因证据不足维持原判。经罗益锋仔细阅读材料并通过全国人大信访局转国土资源部后，国土局回函称对方未办理土地转让手续，不得与港方或其他合作方开展合作建设项目，从而依法获得了改判。从此，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仅涉及港澳台和15个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国内侨眷的案件便有近百件。2007年罗益锋被中国侨联评为“全国维护侨益先进工作者”。

罗益锋怀有一种非常朴实的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这种信念加上对社会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远见，以及超出常人的执着和艰苦努力，使罗益锋总能看到问题的关键，并能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

无论是在科技界还是政界，罗益锋的成就都堪称卓越。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工作任务，我们问罗益锋如何平衡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认为要想科学合理利用时间，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关键在于个人认识和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一个人的动力源泉。”事实上，无论如何“科学合理的利用”，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罗益锋只能舍弃他的休息时间。对祖国的爱和对人民的责任感就是罗益锋的动力源泉，在这一动力的激励下，罗益锋最忙的时候甚至每天只休息短短三四个小时。采访进行到一半我们发现罗益锋始终未喝过一口水，我们请他喝水，他说：“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已经喝过了。”长年累月的繁忙工作甚至让罗益锋因为没空喝水而逐渐养成了少喝水的习惯。

##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2008年5月罗益锋正式退休，但继续担任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主任和《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主编，并被中国化纤工业协会聘为顾问和高新技术纤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被北京化工集团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因此工作依然繁重，仅2009年就应邀在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台湾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10篇不同内容的大会报告，创历史新高，其中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应台塑中心、台湾尖端材料科学协会及逢甲

大学的邀请，作四场不同内容的报告，在岛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好评，促进了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的交流。2009年国庆和60周年前夕，在第八届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罗益锋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评为“全国侨界十杰”，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奖。

此后他每年都要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8~10篇论文，在国内不同期刊至少发表10篇论文。2010年6月他的论文集和专题调研报告汇集，分获全国石化系统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他所领导的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被评为“全国优秀信息机构”，而他任主编的《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一等奖”，次年被评为“全国中文科技核心期刊”。2011年2月罗益锋被聘为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组长、中德合作固体钒电池项目中方首席专家，这种全新的电池具有超高能量密度、体积小、质量轻、安全、无污染、无需充电而靠纳米钒化物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产生电流，可使电动汽车、手机、电动自行车、笔记本电脑等大大延长运行时间，对未来国防现代化和诸多产业领域的升级换代，将作出历史性的贡献。2012年罗益锋被推举为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会长。

当被问及对自己大半生的评价时，这位76岁的老人坦诚真实得可爱：“应该说是我的理想和抱负都实现了，我自己很欣慰。每次去国外，同学们都蜂拥而至我的家里，我的父母也很为我自豪。”但是对于获得的荣誉，罗益锋认为那都是对自己的鞭策：“每次参加先进人物表彰大会，每次得到一个荣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鞭策，让我找到自己和其他荣誉人物的差距，也让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先进人物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长达50年的辛勤工作，罗益锋所创造的成绩数不胜数，而发生在他身上的有趣又感人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而简述之，希望在这种近乎于“浮光掠影”的叙述中能画出一个真实的罗益锋。在2013届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罗益锋这样告诉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无上的荣耀。”“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要计较得失，而要坚定的付出，持续的努力，你们终将获得成功。”

# 华丽转身，不忘初心

## ——记跨界女人刘怀宇

本刊记者 / 赵雅娇

刘怀宇有很多身份。重庆出生的美籍华裔作家、北大和美国加州大学文理兼修的高材生，美国IT行业和金融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可在这所有的身份中，她念念不忘的是“北大毕业生”这个名字。

### 从山城到北大：文艺女孩的快乐生活

怀宇出生在重庆渝中区较场口，她的整个童年都在重庆度过。“重庆南岸青山环绕，储奇门河滩鹅石板层层叠叠，缆车缓缓爬向上半城。”怀宇带着怀恋微笑着轻轻讲述。那个年代的重庆物质上虽然很匮乏，但孩子纯真的童心总能生成一个明媚神奇、其乐无穷的世界。跳皮筋、攒糖纸，简单的游戏，她和小朋友们也可以玩得有滋有味。

“北大是我成长的起点。”怀宇这样描述自己的精神故乡。进入北大是她独立生活的开始。在英美语言文学系刚开始的分班考试中，她发挥不理想，没能进重点班，为此她懊恼了许久，可她终于调整好心态，迎头赶上，最终在毕业时荣获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时至今日，说起当年各式各样的校园活动，怀宇的脸上流转着兴奋的光彩。艺术团、文学社，当年文艺青年的集聚地，怀宇一个都没落下。她印象最深的是“逆光”文学社，是一个反传统的青年阵地。北大风物和北大生活成为怀宇日后不断回溯的记忆，甚至在梦里，她还轻快地跑着步，穿过宿舍，穿过当时静园那一片的果树，醒来，梦境依然清晰可辨。如今和故园短暂的重逢，让她不禁感慨：“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园。”

### 在美利坚的日子：中国女人的IT传奇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完本科的怀宇受家庭影响，更怀着开眼看世界的心思，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国土，进入爱荷华大学学习语言学。在北大就读期间，她就发现自己对文学研究并不感兴趣，她难以接受抽丝剥茧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于是毕业论文就选做了语言学方向的内容。爱荷华大学给了她机会，让她系统深入地进入到语言学领域。

尽管在北大学的是英美文学，但当她真正进入到美国本土环境中，才发现自己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仍然存在严重障碍。怀宇记得，文科课上，老师



刘怀宇，重庆出生的美籍华裔作家，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后留学美国，获爱荷华大学心理语言学硕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电脑语言学和电脑科学双硕士学位。曾在全球最大企业软件公司甲骨文（Oracle）任软件开发经理。现为美国第三浪潮风投基金管理合伙人。



▲ 2013夏刘怀宇回母校在未名湖畔留影

经常列举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名人轶事，比如流行电影中的情节、人物。身旁的美国同学被老师逗得哈哈大笑，而她却莫名其妙。那段时间她亲身体会到了异乡生活的孤独。为了尽快消除文化隔膜，她租来了成堆的美国电影，恶补美国流行文化。有段时间，她每晚连看三四部电影，经常在录像播放的过程中疲倦得睡着了。

干劲十足，加上适应力很强，怀宇最终以全A的优异成绩在爱荷华大学念完了心理语言学硕士。

位于美国农业区的爱荷华是一个安宁的小城，大片大片的玉米田和周围人家的淳朴让怀宇记忆深刻。不过，怀宇希望能够进入到更好的大学进一步深造，于是，她转学到洛杉矶，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拿下了电脑语言学和电脑科学双硕士学位。

多年的用心体会和认真了解让怀宇顺利融入美国环境。毕业后，怀宇进入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甲

骨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这是她自觉做出的选择。怀宇在校期间就曾在花旗银行实习，毕业季时她一天会参加五六个面试，她想在与面试主管的接触中更多了解对方公司的特点和自己的兴趣。最终，怀宇将目光锁定在了甲骨文。她敏锐地意识到IT行业的市场潜力，并且在甲骨文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发展轨迹。她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干起，奋斗至项目领队，再到软件开发经理，比很多纯理工科出身的男同事都做得出色。怀宇回忆，当时组里有许多名校毕业生，有的比她学历还高，但是做一个开发经理更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在工作中的沟通能力，她在这两方面都有过人之处。而有时，怀宇反而觉得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来源于自己的“半路出家”。她还记得有一次他们组碰到一个服务器软件运作太慢的问题，组里的资深工程师们，包括一位博士钻研了半天都没想出个所以然，而她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两组数据的处理顺序对换一下，“因为我看的比较宏观，有时候会依靠直觉，倒真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种“盒子外面的思考”为怀宇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思路，帮助她完成了很多任务。

## 寻找人生新的起点：从IT转战金融

回忆起写软件的过程，怀宇充满怀念，她喜欢能够让她专注的工作。比起后来需要管人管项目的繁杂纷乱，她很怀念那种坐在电脑前的内心安稳与专注之感，一旦看清某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写软件就变成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从在北大学习文科到赴美转入学习电脑科学这一工科专业，再到在甲骨文这一软件企业做得风生水起，怀宇成功实现了从文到工的跨越。这段经历让她备受鼓舞，她相信，只要是她想做并用心去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做不好的。这为她日后转战商科领域打下了基础。

在甲骨文做久了，怀宇还是感受到了局限。大公司很专业，它把每一个部分都做到最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身在其中的人只能看到局部。于是，怀宇开始寻找能够看到全局的工作机会。正在这时，美国第三浪

潮风险投资基金和怀宇互相进入了对方的视野。2005年，当时恰逢中国一家知名科技公司重组，第三浪潮获得机会介入其中，他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中国背景且具备良好中英文沟通能力的合伙人。第三浪潮着重对怀揣创新技术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和其他一系列的支持，帮助其茁壮成长。怀宇看中了第三浪潮可以为自己提供的开阔视野和平台。

真正决定离开甲骨文的时候，怀宇不是没有挣扎，放弃一个高薪而稳定的职业需要勇气。可她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她想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新的生长点。“我不知道该不该放弃甲骨文，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去第三浪潮，我一定会后悔。”加盟第三浪潮的怀宇说自己像个“万金油”，管理项目来源，跟踪市场，投资组合管理，投资人管理等等，什么都做，可她享受这种状态。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和磨合，怀宇靠自己的能力跻身董事会。现在，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她喜欢接触前沿的科技公司，她期待看到第三浪潮投资的公司不久的未来引导新技术潮流。她喜欢接触各种性格的出色创业者，在他们身上，怀宇看到了惊人的才华与不老的激情，这让怀宇时刻感受到生命的充实与精彩。

## 文学梦回，不忘初心

离开甲骨文还为怀宇开辟出另一块天地：文学。回忆起到美国之初，怀宇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谋生，她曾这样说：“莎士比亚或者爱默生或者杜鲁门·卡波特不能替人付房租、交学费。”很长一段时间，她念着很专业的书，做着很热门很高科技的事，生活似乎不可扭转地朝着某个方向迈进。但是在她的内心中，一直有一簇不灭的火苗，那就是对文学的执着之爱。

从2006年开始，不再需要天天坐班的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她开始投放更多的精力到自己的华文小说里。事实上，文学创作一直是她的业余爱好，自2003年以来，她以“怀宇”为笔名，在海内外大型报刊杂志如《世界日报》、《侨报》、《美华文学》、《红岩》等发表小说、散文和随笔四十余万字，还曾是北美《星岛日报》、《明报》和洛杉矶英文报纸《Israel

Jewish Life》的专栏作家。但是，真正动笔表达些什么的愿望，也许还没有在短小的随笔散文一类的文字中得到满足。这种愿望在怀宇撰写学术论文、项目报告和雇员评语的许多年里悄无声息，但却一直在那些客观严谨的英文字母间暗自生长，怀宇把它叫做“呼唤”。“也许是前世未能参透的禅机、平行宇宙间激荡不息的回音，或者仅仅是今生未了的心愿，这一辈子，无论在哪儿做着什么，那一声呼唤都魂牵梦绕。”

怀宇说：“我始终是‘文艺青年’。”

2012年，怀宇将六年内所写的中短篇小说集结出版，名为《罗马·突围》。美籍华裔作家刘荒田这样说：“我们期待在美华人作家，写出国内作家无论如何写不出、写不到位的作品。独特性是文坛永不过期的护照。怀宇就是这样的一位，读她的作品，尤能体会她惊人的爆发力……《罗马·突围》所写，是凌跨国境线的精神‘突围’，展示这一过程的人性面具和本相，它所抵达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堪称出类拔萃。忽略了这部作品，就错过了一个体察地球上的一处奇异风景、优美情调的绝佳入口。”

文如其人，访谈中的怀宇娴静地坐在那里，优雅而迷人。一天前，在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陈守仁国际中心的讲座上，刘怀宇把她深刻而丰富的生命体验，用她那特有的宠辱不惊的语调，向学弟学妹们娓娓道来，那样细致真情的话语仿佛从她心间流出，又淌进了听者的心里，竟有一种清泉润人心脾的感觉。一天后，在面对面的访谈中，她依然带着那不徐不疾的语调，用絮絮的温语，讲述着她与文字的不解之缘，表达着她世界行走中沉淀的思考。

## 对话刘怀宇（以下简称“刘”）

记者：在《罗马·突围》的后记中您写道：“六年前，我放弃了大公司的稳定薪水，花大量经历来做白日梦。”这个梦就是文学梦？

刘：是的。很小我就对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老师都时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朗读。我的父亲是一位作家，他很重视培养我发表作品的意识。初二时我在《重庆日报》上第一次

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车站送行》。这让我很受鼓舞，我至今还保留着这篇文章的剪报。

到美国之初，忙着求学、适应、工作和立足，真正的写作比较少，不过我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2003年，工作、生活都相对安顿下来，我才有了闲暇，再加上前期生活的积累，逐渐梳理出了可写可谈的素材，我开始给报纸写专栏和随笔。2004年底我萌生了写小说的冲动，第一篇就是《故乡是一枚无花果》。

**记者：**这篇小说的语言是中文，《罗马·突围》中的全部作品也都是中文写作，与此同时，您还用英文为英语报纸撰写专栏。那在您的感受中，用母语写作和英语写作有什么不同？

**刘：**在被英语包围的环境中，中文写作其实是一种奢侈。但是我偏爱中文写作，尤其是在创作小说的时候。

不管我多熟悉国外的文化，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其实始终会感到一种距离感。所以我会用英文去写一些有趣的、幽默的、或者是冷静的、严肃的文章，但是当我感受到来源于内心的需要倾吐的情绪和情感，我一定会用中文。在母语的世界中，我感到内心的回归。

**记者：**在80年代末出国90年代海

外写作的顾城、杨炼等人，他们的母语写作实际上是以语词的漂泊来刻写主体的漂泊，同样，您的母语写作的面向之一也是乡愁。

**刘：**对，但也只是“之一”。移民扎根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接纳异域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愁的体会是刻骨铭心的，母语写作是一种乡愁的排遣。但是除了一己的情思，我写作也会有别的考虑。我觉得把故乡的事讲给海外华人和美国人听，传播中国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我在国外的这十几年间，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外国，我希望能用母语对故乡的读者讲述国外的故事，这像是跟老朋友摆龙门阵，充满乐趣。

**记者：**您会追求在美国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尽可能地保证母语写作的纯粹性和对中国文化的贴合性么？

**刘：**我的亲身体会和阅读经验都告诉我这几乎不可能，我想我的写作可能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海外华人的写作风格。我从小受到系统的中文教育，熟背过很多中国古典诗词，这种成长经历让我的写作有中国文化的底色。但是，近十几年我都处于外国文化和环境中，耳濡目染，外国文化必然会渗入到我的文字中。就比如，有些读者会说，我会不自觉地用英文的句式写中文的句子。

每一位华人作者一定会在母语和英语之间做一个侧重的选择，我认准了我的母语。

**记者：**也就是说您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东西文化和语言的融合体。

**刘：**不仅是我，我想，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

**记者：**您将自己定位为“新一代海外华人”，《罗马·突围》的指向也是“新世纪中国人移民打拼故事”，这种“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罗马·突围》并未将焦点对准以往写移民喜欢关注的底层打拼史，我写的故事，其实是对我所了解的美国社会的自然反映。我来美国留学，然后定居、做白领工作，成为美国社会一员，这也是我这一辈移民的普遍经历，和老一辈中国人来美国打工，语言不通，生活围绕唐人街展开的移民经历不同。所以这本书里看不到如何从唐人餐馆洗碗工到商界大老板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多数人从学校出来，工作，成家立业，可以说进入了外国的中产阶级行列。但即使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也有冒险与挫折，痛苦与幸福，尤其在心灵上，生活稳定性的脆弱所带来的安全感的缺失等等，都会聚集在新一代移民身上。我着重描绘的是这一代人的海外

经历和精神世界。

**记者：**不局限于美国，您的小说中有一种“世界公民”的眼光与胸怀。

**刘：**从纽约、洛杉矶到巴黎，到罗马、莫斯科、耶路撒冷，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愿意细致地观察描绘各国各民族的人文风情，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掘善与美、友情与真爱。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异乡，在创建新生活的过程中，关注的不该只是文化差异、不适应，而更要努力寻求故国文化和新环境中的共同之处，在各族裔间发现共通的人性。

比如《哭泣的墙》写的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巴以冲突是人类困境的缩影或者放大，我在写作中其实一直在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否有可能？能不能在各种文化中找到共通的人性，激发共同的爱心？这一类的思考仍在继续。我想，这是世界公民的责任。

**记者：**有考虑过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么？

**刘：**虽然从初到美国时就总有人拉我入基督教，但是

我至今还没有真正投身。我认为宗教在信仰者那里是一种和宇宙沟通交流的方式，我也在探索这种方式，我生活的环境总有宗教氛围，但是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讲，宗教的形式并不适合我，教会活动没能触动到我。我接受的是真正触动我心灵的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地去领悟，去理解宇宙万物。

**记者：**您的小说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读者们总会潜意识里觉得她们身上有您的影子。

**刘：**我一直觉得，无论主人公和作者的性别是否一致，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某种程度而言都是作者自己。我在小说中写了很多爱情，我觉得爱情和婚姻对男女都很重要。比尔盖茨在一次采访中就说过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娶了自己的太太。人生一定要有爱情，有一个理解你的人始终在身边，是一个人的事业和人生莫大的支撑。

不过作为女性，在海外打拼的确会比较辛苦。尤其在科技和金融行业中，男士自然会更有优越感。我也遇到过看我是中国女人就不把我当



刘怀宇在意大利威尼斯

回事儿的人，我不会生气，我会用实际行动去改变他们的态度，用真实能力去证明自己可以和他們并肩同行。不用去强硬地争辩，消除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实际的表现。

**记者：**您的小说《空白》中有一段这样的情节，李爱军的母亲对儿媳在家写小说相当不满，她质问：“在美国写中文，有什么出息？”在您生活中，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刘：**美国没有拿国家薪水的作家，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一直写下去。英语读者看不懂，会中文的人大多忙于生计，也没心情没时间看。多数潜在的读者在大洋彼岸，对你一无所知。我想，就是一份对文学创作本身的喜爱吧。

对写作的嗜好，有时候像是一种负担，我做什么都放不下。而且，神奇的是，当我坐在电脑前，把脑子里的思绪、故事敲打到屏幕上，感觉到异常的宁静，生活和工作中让我心烦的事统统都隐退了。如果长时间不坐下来写点什么，我会

烦躁，会觉得缺少了什么。我想，也许，这说明我有当作家的命，虽然写作不容易，但这是我的荣幸。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教我背第一首唐诗，此后，她时常提醒我，世上并无天才，也是母亲告诉我，要先顾及生计。这些话很朴实，却很实在。直到如今，写作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但是我始终记得母亲的提点，所以我在做文学“白日梦”的同时不至于忍饥挨饿。

我常常思考，人来到这世上是为什么？奋斗、追求成功又到底为什么？在我看来，精神的成长、人格的修养，比物质成功更能让人解放进而自由。每天照照心灵的镜子，修掉嫉妒、骄傲、贪婪，学会宽容、大度、适可而止。人生是一场修炼，写作是一种精神修炼，它促使我回顾、思考，然后整理、前行。

## 【怀宇小说欣赏】

### 哭泣的墙

怀宇

我看见她，好像突然懂得了，面前的这堵，哭泣的墙。

黑头纱、黑衣，长至脚跟的天蓝碎花裙子，她正仰望一丛杂草，从墙缝蓬出。那丛草大半干枯，接近石头的一段有些绿意，也是残存，也是新生。这堵石墙，环墙而

筑的古城，古城外的国家，都蔓生着无穷尽的寓意，错综繁杂如宇宙本身，让人无从说起。

因为她，我却好像顿悟了。她高挑纤瘦，像我，在几十米高的墙下，几千年的历史和信仰旁边，微弱如一叶草，一丝发。我像飘离体外的灵魂，看见自己的躯体，和它不能胜任的命运。

她回头看我，却像是灵魂，在挑拣可以胜任的躯体。

很美的灵魂，头纱圈起洁白的鹅蛋脸，鼻梁挺拔，漆黑的大眼睛和眉毛，殷红的唇。米白石墙底子上，黑使灵魂深邃，红使灵魂凝重，凝重中暗藏飞扬。

灵魂对我轻轻一笑，很清晰的英语，“嗨，我叫葛丽特。”灵魂对

我伸出修长的手，头纱后尾被秋风翻卷。

灵魂也有名字，我好像又懂得些什么。“葛丽——特”，听起来像把刀：“葛”是刀柄，古涩的木头；“丽”是刀身，雪亮耀眼，看不清刀锋；到“特”，短促的一声，已经结束了，结束的是什么？

果真兵荒马乱的地方，人的联想也染上兵气？抑或因为带兵气的联想，这寸土地总不得安宁？

我环顾四周，右边两百米开外，两辆白色警车，刷了深蓝的希伯来文字。左边，隔着界分男女的铁栅栏，几个黑衣黑帽的正统犹太教徒手扶着墙在低头祷告。再远一点，两个以色列警察来回踱步，他们穿着防弹衣，因为隔得远，像两颗跳棋子，深蓝色。

“我叫欧阳冰，”这几个字说出口，我的灵魂跳进身体，统一到名字里。我轻轻握一下葛丽特的手，柔软冰凉。

接下来该说什么？两颗灵魂相遇，可以交流的很多。我们可以从这堵墙开始，飞越几千年时光，踏遍大漠戈壁，去寻一片阴凉绿洲，像阿伯拉罕身边的牧羊女，脚蹠上铜铃叮当。

或者像所罗门王的爱妾，候在神殿门廊，王出来时，为他捧一碗清水净手，再飞一个眼风，王顶天立地，像神殿的石柱。

我们甚至可以仅仅是两粒尘埃，落在神殿台阶上，仰望耶稣和他头顶的太阳……我们可以萦绕墙上每一方顽石，读透每一段祈祷、每一声叹息和每一滴眼泪，而所有这些，都不需要言语。

可两个陌生女人，除了体型相似，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因为偶然，星期一上午九点，正好是墙下唯一两个女人。而且盖黑头纱的女人，似乎都虔诚而固执，我了解的人世与她认同的，大概相去甚远。我不相信宗教，来神的墙下，只想感受些灵气，寻一种浪漫，我怎么开口，恐怕都会犯忌。

“你许愿了吗？”葛丽特打破沉寂，指指身边的墙缝，里面塞满小纸条。据说这些写满愿望的纸条，第二天总是销声匿迹，被神收走了。我摇摇头。

“为什么不呢？我许了个愿，但愿我的男朋友平安无事。”男朋友？也许她并非我想象那样保守，可这个陌生女人，无故对我讲她的愿望，有什么企图？大都市里，人们最忌讳推心置腹。

葛丽特神情柔和，继续说，“他叫摩西，是软件工程师，两周前被召去服军役了，我一直没见到他。”以色列全民皆兵，这不奇怪，但我同情地“哦”了一声，不是来寻浪漫吗？

也许像酒吧里邂逅的陌生人，喝多几杯，聊得海阔天空，聊完一走了之，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宗教和酒精，都有令人敞开心扉的效果，我向前走进一步。

葛丽特的脸，从近处看很疲惫，缺乏血色，但她眼里，大概出于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我）的好奇，跃动着光彩，脸颊和额的弧线带些稚气。

“你从哪里来？”葛丽特问。

“洛杉矶。”

“好玩的地方，我在好莱坞电影里见过。第一次来耶路撒冷（Jerusalem）？”噢，她看好莱坞电影，也许我刚才纯属以貌取人。

“对，不过我住在黑珐（Haifa），”我说。我随丈夫杰克来以色列一周，终于在临走这天，有机会来耶路撒冷古城，看看被称作哭墙（the Wailing Wall）的犹太圣地——古代犹太神殿被罗马人捣毁后存留至今的一段院墙。杰克在古城要会两个人，关于象征派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的一幅真迹，说好我不耐烦就先回去。

“啊，摩西的母亲就住在黑珐附近，海边的基布兹，我正想去看她。你开车来

的？”葛丽特脸上微微泛起兴奋的红晕，像个小女孩。

转弯抹角，原来还是有求于我。以色列的基布兹，大概是现今世界仅存的集体所有制农庄，又在海边，想必值得一看，我和杰克下午六点才坐飞机，我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在神的墙下，我有一百个理由行善。

所以我在葛丽特请求之前就提议，“你搭我的便车去吧，和我作伴。”

葛丽特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高兴，好像还有点犹豫，也许我自作多情？“我们可以谈好莱坞电影，”我又说。

“那太谢谢你了，”葛丽特最后说。

## 二

车子停在古城南面日安门（Zion Gate）外，从哭墙走过去，要穿过古城的犹太居民区。街心小公园里，空气清明，几个年轻的正统犹太教母亲坐在长椅上，心满意足地看孩子们在身边玩耍嬉闹。阳光落在母亲们的彩丝头巾上，溅起缤纷的光点，再融进孩子们稚嫩的童声，在千年的石板巷道里回荡。

和那几个母亲相比，葛丽特的衣着极端素净，甚至显得哀伤，素净哀伤却都包裹不住一种艳冶，如暗夜里的无名花香，看不见，却沁人肺腑，而我们“可可”的脚步，每一声都使这艳治愈加张扬。

长椅上的母亲们相继抬头打量我们。我的东亚面孔、齐腰长发，一周来常被路人打量，我习惯地报以微笑，他们也微笑，用善意遮掩眼中的好奇。葛丽特却十分不自在，右手扯起头巾掩住半边脸，目不斜视地加快脚步，太阳在她身后拉下的斜影，像沉默的回声，在石板路上来回晃动。

她莫非是从正统犹太教社区出逃的新娘？我看过一部以色列电影，正统犹太教妻子，除了生孩子做家务，没有个性发展空间，最后出逃。

间，最后出逃。

出了日安门，杰克租的银灰马之达靠在路边。我们坐进车里，葛丽特摘下头巾，右边下巴、还有脖子上的紫淤，立刻触目惊心。不等我开口，她哽咽起来，“神……派你来帮我……”神派我？那我是天使，还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谁都有点虚荣心，该死，我启动车子。

“我是巴勒斯坦人，”葛丽特说。我一脚踩上刹车，她的身体猛然向前一扑。

谁开这种玩笑？我瞪着眼前自认的巴勒斯坦人问，“那你来犹太居民区干什么？你该回去哭墙东边，穆斯林的地盘，金顶的清真寺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事，我搞不清楚，更不想卷入。

“可我回不去了！”葛丽特放声痛哭，近乎哀号，但三声之后，立刻停止，她用头巾抹去眼泪，“我只想让你知道，现在让我下车还来得及。”

这时一位以色列警察走过来，问，“没事吧？”我几乎抬手指向葛丽特，像犹太指向耶稣。但我的神志突然异常清晰：如果她真想利用我，根本不必告诉我她是巴勒斯坦人，反正我也分不清楚，她知道我是头一次来以色列。

她为什么说回不去了？我的好奇心占了绝对上风。我对警察（好英俊的脸！）说，“没事，租来的手动车，开不惯。”我把车熄掉，再发动起来。年轻的警察看看我，又看看她。葛丽特用头巾兜着脖子和下巴，抓着头巾的手随呼吸起伏。

警察挥挥手说，“祝你好运。”他嘴边浮起知情的笑：唉，女人开车！

“我只想知道，你在哭墙下讲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我问话的样子大概有点凶，葛丽特双手捂着脖子，身体向后缩了一下。

“当然是，”她掏出一张照片，布满褶皱，但的确是位穿以色列军装的青年，浓

眉，眼窝深陷，神情庄重。

“巴勒斯坦人不都恨死了犹太人吗？你和摩西，是你编的故事吧？”我把车开得很慢，时速不到十公里，准备听出破绽就随时停车报警。耶路撒冷古城附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怕她跑了。

“是的，但摩西不一样。”

“为什么，摩西不是犹太人吗？”

“犹太人是一种分类，摩西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爱他。”葛丽特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我却不禁对她刮目相看：什么样的爱，竟可以超越种族的血海深仇？我嫁给犹太人杰克，比佛利山庄富有的画廊主人，需要超越的是爱情本身，可杰克的财富使我的超越轻而易举。

葛丽特说，她是律师，住在伯利恒（Bethlehem），她每天到东耶路撒冷一家阿拉伯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三个月前在西耶鲁撒冷一个酒吧遇到摩西。很有些后现代味道的酒吧，去那里的，有犹太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偶尔也有像她一样在耶路撒冷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都喜欢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但爱情在他们之间发生，她想都没想过。

“直到一天晚上，酒吧着火。那么多人，出口只有两个，大家争先恐后往外跑，我挤不过别人，落在后面。火焰就在几步之后，我的头发被热浪灼焦，皮肤被灼得生痛，烟，最不能抗拒的是烟，无孔不入。”葛丽特眉头紧锁，好像一口烟还呛在胸口。

“我几乎窒息了，摩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拉起我往前，不，往左边跑，有道窗口，他拼命把我往窗外又推又塞，后面劈劈啪啪，屋顶不断塌下。摩西刚爬出来，一段屋梁就掉下来，窜出的火焰烧着他的衬衫，他扑倒在地上打滚。还好他没受重伤。”

“摩西完全可以先逃出去，幸灾乐祸地旁观我这个巴勒斯坦人被火烧死，被房梁砸死。我问他为什么冒死救我，摩西说他不能见死不救，生死存亡的瞬间，大家都是人。”

葛丽特望出车窗，望出尘世以外，“摩西教会我，超越历史和宗教的偏见看人。”

“好，你爱摩西，不把他归类成以色列人，他也不把你归类成巴勒斯坦人，但你一点不恨以色列人吗？”

葛丽特沉默了。以巴冲突几十年，我的问题，大概像空气一样，她每时每刻都在呼吸，一时却很难用两句话来说清楚。

“我希望不恨……都有权利生存，”她斟字酌句，“所以，我大概不能算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我回不去了。”

原来葛丽特的表兄有时到耶路撒冷打零工，发现她与摩西约会。昨晚他带了几个朋友，去葛丽特家“教训”她。我看看葛丽特脖子上的紫淤，像是被人勒的，隐约还有绳印。

“他们要我约摩西到东耶路撒冷，我说他在军队联系不上，他们说，那你替他死吧！他们……”葛丽特下意识地双手交叉护住脖子，眼里闪过惊恐、痛楚、空茫。“如果我父母不阻止，他们肯定把我杀了，父亲说要亲手惩治我。下半夜，母亲偷偷把我放了，让我永远别再回家。”

“你爱上摩西那一刻，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种族。偷偷和他约会，你难道指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家仇国恨，一瞬间因为你的爱情而化解？”我认为葛丽特早该离家出走。

“不到不得已，谁能义无反顾地背弃家族同胞呢？”葛丽特叹一口气，她脸上的忧伤，比东边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上的雨云更灰暗潮湿。

葛丽特死里逃生，连夜步行十公里到耶路撒冷，等在哭墙下，犹太人心目中最接近神的地方。“摩西的耶和華，应该也是我的阿拉，阿拉把你送在我面前，”葛丽特又说。

### 三

黑珐在耶路撒冷东北，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看到葛丽特说的那个基布兹，路标用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三种文字写明。穿过一片葱郁的香蕉林，映入眼帘的，是一列列白墙红顶的平房，被草坪和棕榈树间开，简朴、齐整、宁静，像世外桃源，没有私有财产衍生的种种矛盾纠葛。

葛丽特用流利的希伯来语跟守门的妇人打听摩西母亲的宿舍。妇人五十来岁，偏胖却灵活，精明而警觉的目光不断在我与葛丽特之间来回扫描，我感觉自

己脸上的微笑逐渐僵硬起来，葛丽特却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放松下来，平心静气地回答妇人没完没了的问题。最后妇人伸出一节胡萝卜模样的手指，指尖无限延伸的远方是开阔的地中海，宿舍与海只隔一片白色沙滩。

摩西母亲不在家，我陪葛丽特坐在海边岩石上，看碧蓝的海水缓缓把苍绿的海草荡上我们脚边的岩石，然后退却；再来时，又把海草冲走，在岩石上涂抹一片白色泡沫。岩石与海水之间，有亿万年达成的默契，人所奢望的地老天荒，最终只属于它们。然而我还是一厢情愿地希望，生活在这片海边的人们，也像海水与岩石，即使对峙，仍然仰望同一片天空。

“不知道他们会把我母亲怎样？”葛丽特说，完全放弃的神情，像海草，任海水漂荡。

“也许是你父亲让她放你走的，他会为她开脱的，”乐观是局外人的特长，我宽慰葛丽特。她不言语，眉头被焦虑与负疚拧紧。

我漫无边际地说了些闲话，又把电邮地址和电话留给她，然后离开，继续开车向黑珐行驶。我和杰克说好，下午两点准时从黑珐出发去机场。

黑珐的家在山顶，远眺地中海，杰克十多年前就买下了，一年却难得来住两回。我们这次来呆一周，许多家具上搭的遮灰布都来不及揭开。

杰克还没回来，房子里很安静，我继续打点行李。杰克的衬衫摊在宽阔的鹅绒床上，散发他的古龙水味道，清凉中带一点辛辣。结婚两年多，我已经习惯了，甚至有点喜欢，在安静奢华的大房间里被这种气味不动声色地包围——我与杰克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既无恋人间的羁绊，又不失安全感。我是希望爱杰克的，尽管他比我大二十五

岁，但我才三十出头，心不肯听从头脑。

我在哭墙下到底顿悟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窗外，地中海远远地在日光里闪烁，我想着葛丽特和摩西的爱恋，石墙缝中的杂草，杰克的古龙水……

#### 四

我和杰克三点半到达特拉维夫（Tel Aviv）国际机场，通过安检后，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头等舱候机室等待登机。四十六英寸的大屏幕液晶电视里，两个节目主持人在谈有趣的事，女的大笑不已，男的因为女的笑，说得更起劲，声色暗哑。我听不懂希伯来语，随手抓起一本英文杂志来看。我和杰克可谈的不多。

“天哪！”我忽然听见杰克惊叹。他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每次电视报导以色列被炸，他就这样，下颌坠下去，嘴微张着，脸上其余部分冻结，包括额头的皱纹。沉重却不夸张，但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绝望的表情。

电视机离我不到三米，屏幕上忙碌的急救人员，好像就在我身边穿行，残砖碎瓦、炸飞的肢体就在我脚下，血染了一地，血腥和焦糊的怪味冲鼻而来。

那家被炸的餐馆在黑珐，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合开的，蓝底红字的招牌还悬在空中，被风拍打着。杰克几天前带我去那里吃过烤肉，邻座有个小女孩，蹒跚学步，跌倒在我腿边，胖乎乎的小脸，眼睛又黑又大。当时我想，杰克说不要小孩，多可惜。

我有点头晕。我抓住杰克的手说，“太近，太真实了。”他拍拍我的肩，反而安慰我似地说，“飞机恐怕要晚点了。”

电视里的以色列人，个个脸色严峻，却不忙乱，好像在处理一起日常事故。每天生活在被炸死的可能性中，恐慌大概无济于

事。他们却死守在这块弹丸之地，像死守自己的信仰。就连杰克，在美国长大、生活，仍然花重金来黑珐买栋有海景的房子，然而这里海景再美，却哪是度假的等闲之地呢？

过了两小时，那个曾经谈笑风生的男主持出来公布受难人数，神情与先前判若两人，嗓音依旧暗哑。二十一人死亡，包括四名儿童，三名以色列阿拉伯人。

想起那天看到的小女孩，我流下泪来。杰克搂着我，什么也不说。

男主持接着公布，人体炸弹是一名巴勒斯坦女子，律师，29岁，叫哈娜蒂，今天早上进入以色列境内。

我听杰克翻译完，突然手脚冰凉，我想到葛丽特，年轻的巴勒斯坦女律师，今天早上入境。如果她说谎，她的真名也许是哈娜蒂……我越想越恐慌，呼吸困难起来。

杰克问，“你脸色苍白，哪里不舒服？”

我说不出话来。我不断在心里说，不会的，谁能够如此卑鄙，靠动人的爱情故事混进人群滥杀无辜？但葛丽特与哈娜蒂两个名字，在我脑子里翻卷混合，像一团在秋风中飞旋的落叶。

我稀里糊涂跟杰克上了飞机。我终于告诉他，上午我送过一个葛丽特，去海边的基布兹。

杰克沉思片刻说，“葛丽特是希伯来名字，不可能是她的真名，这很可疑。但巴勒斯坦也不只有一个女律师，眼见为实，等恐怖分子的照片公布了，才能断定。况且，耶路撒冷警察和基布兹的守门人也都看到她了，没看出破绽。一般临做人体炸弹的，据说都有生理反应，挥汗如雨什么的。”

“可那是上午，离她自杀还有六七个小时，也许她特别沉着。”我当时还自以为很警惕，但旅游者的虚妄无知和猎奇心理，一旦被利用，就可能具备杀伤力。

这是我生命至今最漫长的飞行。我梦见

自己在哭墙下向神祈祷，求神让我超越身体年龄，爱上杰克，葛丽特在旁边微笑，笑容灿若晚霞，霞光一点一点浸染天空，血一样殷红。我被梦中的荒谬惊醒。

## 五

回到比佛利山庄家里，我立刻上网查询黑珐爆炸案信息。哈娜蒂的照片公布了，漆黑的眼眉，殷红的唇，黑头纱包裹洁白的鹅蛋脸。但“谢天谢地，不是葛丽特！”我隔着一道镂空花的门廊大声对杰克说，杰克坐在起居室的古董沙发里，苍白无力地对我笑笑。

我再看电脑上的哈娜蒂，脸庞和葛丽特的一样美，一样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是怎样的不得已，使她选择用青春和生命做武器？她都能这样做，境况不如她的巴勒斯坦人，在人世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呢？我似乎懂得了杰克的绝望。

“但葛丽特不一样，”我不喜欢绝望。想到我对她的种种猜测都充满偏见，我内疚起来，“就是不知道摩西母亲是否接受她，基布兹的犹太人会对她怎样？”

杰克说，“神自有安排。”

五周后，我终于收到葛丽特的邮件。

“亲爱的冰，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摩西休假了，等他服完兵役，我们就结婚。爱总是好的，虽然为了爱，我们要舍弃许多其他东西。”

署名“葛丽娅”，我上网查了，是阿拉伯名字，“葛丽特”大概是摩西对葛丽娅的希伯来昵称。

【本文选自怀宇小说集《罗马·突围》】

# 分形几何绽放美丽雪花

## ——笑傲生命的女孩杨帆

本刊记者 / 林起贤



杨帆，北京大学力学系2002级本科生，2006年毕业时获得了力学系和数学系的两个学位，并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参与超级碳纳米管力学和超级分形纤维几何与力学研究，研究生期间共发表SCI检索论文15篇。2008年5月，已获得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全额奖学金的杨帆被检查出患有脑肿瘤，凭借坚韧的意志，杨帆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继续科研，博士期间已发表4篇论文。2013年杨帆获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初次与杨帆见面时，她刚刚结束了与博士生导师每周一次的讨论。她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包，手里拿着一瓶消暑的花茶，从丰台区赶到海淀区。一路的夏日曝晒让她的脸变得通红，但身体逐渐好转的她还是一副精神爽利的模样。

### 此间的少年

从进入清华读研究生以来，杨帆已发表论文19篇，曾获清华大学第十四届“航天海鹰杯”学术新秀特别奖、清华大学研究生特等奖学金。

当杨帆跨进北大燕园的校门，懵懵懂懂地开始成为一名“此间的少年”时，她就渐渐萌发了对学术的热情。

2002年，杨帆以北京民族乐器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进北大力学系。那时，北大理科专业中，艺术特长生少之又少。因为高中时期当了六年数学课代表，自己特别喜欢数学和物理，杨帆自认能爱上这个陌生的专业。但是大一第一学期微积分的第一节课上，当老师提出“为什么 $\sqrt{2}$ 是无理数”这个问题时，许多同学踊跃地侃侃而谈。杨帆一下子感到，在高手如云、竞赛金牌扎堆的力学系，基础薄弱的自己必须要加倍地努力才能“不垫底”。于是每一堂课的作业、每一次考试，她都丝毫不敢大意。第一次期末考试，杨帆得到了一个满意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她拾回了信心：艺术特长生也能学好理科。

大一下学期非典肆虐，不少北大同学回家。杨帆一人住在寝室，笑称自己提前享受了清华女博士的单间待遇。那个时候，游人稀少的未名湖比往日更显宁静。杨帆经常一个人到湖边，或绘制工程制图，或低头沉思。“未名的风景那叫一个美！”时隔好几年，杨帆说这是记忆中最轻松、最自由的一段时光。

进入大三，杨帆又开始修了数学系的双学位，大学生活步入正轨。

### 分型几何学拓荒者

2006年面临毕业选择的杨帆决定到有工科优势的清华“杂交”一下，保送到清华航天航空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如果说杨帆在北大本科求学是博雅

立基，在清华攻读研究生的她则开启术业有专攻的模式——她参与了超级碳纳米管力学和超级分形纤维几何与力学研究。在对超级碳纳米管的研究中，她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拓展到了无穷级。杨帆更满意的是分形几何学与力学的研究，尤其是超级分形雪花的构造。杨帆坦言，进入这一融合力学、生物学和分形几何学等相关知识的新领域，是有一定风险的。做新方向的拓荒者，可能意味着首开先河的突出成就，但没有任何积累、太多的未知因素也将使研究背负着极高的失败风险。基于应用已有力学、数学知识积淀的考虑，又受21世纪初“生物热”的影响，杨帆马上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而本科练就的扎实的数学与力学功底，使得杨帆在专业细分领域中很快崭露头角。在对分形几何学的探索中，她用圆构造了现有教科书上没有的一系列分形图案，特别是超级分形雪花。超级分形雪花为真实的雪花提供了一种生长模

版。杨帆和导师在研究中忽略了真实雪花生长过程中的复杂随机因素，只保留了最主要的六分对称生长模式；并且，在材料学和化学实验中找到了与超级分形雪花极为一致的花样。受荷兰著名画家艾舍尔作品的启发，杨帆和导师尝试对超级分形雪花进行染色。受水墨画重留白、展现空灵的艺术风格启发，杨帆和导师对分形雪花留白部分进行着色，以兼顾分形空间和分形空间的对偶空间（即留白）。基于这些科研成果，2008年以来，杨帆一共发表SCI论文15篇，最高影响因子达8.479，远远超出了对研究生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

“我和导师所研究的课题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空间，充满了科学、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无穷魅力。”对于杨帆来说，日积月累的科学耕耘，不仅是“技”，更是“艺”。分形几何的魅力吸引着杨帆不断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仍然专注于分



▲ 杨帆（右一）和其他获得“第八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的同学在一起

形几何的深入研究。“对于博士生而言，学术生涯刚刚开始。在对研究的大格局没有清晰把握之前，扎根于一个具体的细分领域会让自己更踏实。”杨帆说，分形几何研究的推进仍会遭遇很多困难。“我们在做的是全新的东西。它意味着需要突破学界已经形成的基本认识，所以很难一下子被接受。”杨帆介绍，“分形几何学虽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即使是规则分形集的定义和代数描述也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出了规则分形集的定义以及代数描述。由于以前的定义写进了教科书，所以说需要突破已经形成的基本认识。”在研究上遭遇冷眼时，导师常用挪威数学家阿贝尔的故事来鼓励杨帆。阿贝尔自费印刷了证明当时数学界的世界难题——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由于经费有限，他把内容压缩在了6页上。他拿着这篇论文晋谒欧洲大陆大数学家们，但直到死后也不受重视，使这些极具天才的构想迟迟不能揭开面纱。杨帆说：“导师经常提醒我，要有勇气去开拓新的世界，也要有勇气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

### 以辛勤的汗水焕发生命的光彩

也许很难想象，这些丰硕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是在杨帆罹患恶性脑肿瘤之后完成的。

由于研究生期间出色的科研表现，在2008年的毕业前夕，杨帆获得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

金。然而命运弄人，就在杨帆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张开怀抱迎接更广阔的平台与更美好的生活时，她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噩耗：平素热爱运动的她竟然得了恶性脑肿瘤！

杨帆不得不放弃出国留学，立即接受治疗。在长达7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之后，主刀大夫告知杨帆，这类病如果控制不好，手术后的平均寿命在两年左右。由于开颅手术需要在头皮上切开一个U字型的口，她的头皮上留了个疤。

手术之后，杨帆又接受了6个星期的放疗与化疗。化疗会出现掉头发的后遗症，她开始戴起帽子。吃完化疗药之后，杨帆就会极度恶心难受，为了不呕吐出药影响治疗，她在服药一个小时后要通过练琴来分散注意力。

“在很多人看来，一辈子也就这样养着了。”这样的恶疾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联系起来，让人唏嘘感叹，而经历这一切的杨帆本人倒是对这些治疗的痛苦轻描淡写，反而对当时休养在家的状态不太满意。她打趣地说：“每天在家养病，除了吃就是睡，养猪呢嘛。不能用电脑、看电视、用手机，一天过得好漫长，每天都在想太阳什么时候下山。”

决心找点事情排遣无聊的杨帆想到了未完成的硕士论文。在因病延期毕业的一年里，杨帆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做研究，结果出色地完成了科研任务，并为后来的研究成果打下基础。2008到2010年接受治疗的时期也是她的论文高产期。

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帆

拾起未完的科研梦，鼓起勇气继续攻读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杨帆不同于别的同学，她住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做研究。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10点半就寝，确保有几个小时处于研究工作状态。每周她都到学校与导师殷雅俊教授讨论研究进展，除了春假，一周两次从不间断。

这对杨帆来说，不是易事。放化疗之后她落下后遗症，每次感冒都要一个月才能康复。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繁重的科研任务，无疑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杨帆说：“家人、学校、老师、同学都在给予一种正能量，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阳光明媚的。”尤其忆起重病时，自己在病房躺了13天，母亲就陪着睡沙发睡了12天，杨帆充满感激。

在博士入学第一年，杨帆就完成开题，目前她已经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要求的全部课程，并已发表了4篇文章。那朵超级分形雪花就是在治疗期间完成的。难以直接掌握生命长度的杨帆，积极用勤奋和智慧拓展了生命的高度。

杨帆用强大的生命力与斗志回馈了师长亲友的关爱，也感动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2013年她获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并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

在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申报的自述里，杨帆写道：“我记得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的母亲曾经说过：‘Death is just a part of life. Something we all destined to do.’这句话让我很有同感。我不知

道我还能走多远，但是活着的每一天，我都会努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用辛勤的汗水焕发生命的光彩，以知识与智慧折射生命之光的璀璨！”

## 特别不文艺的搞文艺的人

四岁就开始学古筝的杨帆无疑是“搞文艺的”。由于父亲在北京民族乐器厂工作，耳濡目染下杨帆很早就开始学音乐。1990年，6岁的杨帆在北京市少儿民族乐器大赛中获得幼儿组二等奖。渐渐地弹古筝成为她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北大，杨帆是北大民乐团的成员。除了每周日的集中练习，她还随团出访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并曾为连战、王金平等中国台湾地区政党领导人演出。教过一名历史系大四的男生学古筝。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举办的活动里也经常能欣赏到她的演出。患病之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杨帆举办了“梦圆清华”个人古筝音乐会，演奏了《高山流水》、《春到湘江》、《打虎上山》、《林冲夜奔》和《满江红》等经典曲目，深深感染了在场观众。

不过，在“文艺”这个词被矮化为“细腻敏感、情绪化、耽于幻想”时，杨帆坚决与这一脸谱化的“文艺青年”形象划清界线。

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姑娘，杨帆天生有一种直爽气。她兴致勃勃地忆起最爱吃的松林包子和糖火烧；她曾经滔滔不绝地和一位清华学生记者谈了整整6个半小时。更有谈及病情时的从容、科学攻关中的坚持，都体现了杨帆的硬朗豪爽。

除了地域文化的熏陶，腹中诗书也造就了杨帆的“大气”。杨帆打小就喜读经史，并将之作为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时，开始读《史记》8册；大学读完了

二十五史电子版；她认为历史小说《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儿》很是生动；研读北大风物的历史渊源亦觉有趣。杨帆谦虚地说自己读史就像是在读故事书，但聆听渺远时代的回响，终究可以拓眼界，亦可广胸襟。经书《周易》是杨帆最喜爱的古籍之一。“生病之后读《易经》，豁然明白很多道理。”煲药时，她理解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中药是五行的统一：最底下是木（柴），木生火，火生土（煲药的瓦罐），土生金（药物），金生水（汤）。更重要的是，她结合人生经历慢慢理解了《易经》中素朴而隽永的道理。“有个成语叫‘否极泰来’，就是你处在否卦时，要经过六十三卦才能到达泰卦。”“我最喜欢的谦卦讲的是谦谦君子。‘地面有山，地卑而山高，是为内高外低。’这是《易经》对谦卦的解释。”

“每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过得很充实。”这是杨帆所期望的生活。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的她仍然在继续接受治疗，也在为科研成果从量变转向质变而努力。现在的杨帆有一个愿望，就是明年迎来博士毕业时，能够留在高校任教，继续科研道路。

张友仁先生已年逾九十高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老教授。他1943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就学，1947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在先生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更“以淡泊名利、奋斗不息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几代北大学子”（朱善璐书记给张友仁教授九十华诞的贺信中语）。

今年恰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定址昆明七十五周年纪念，这所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的大学存在不到十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给后学带来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文中，张友仁先生以一颗拳拳之心，满怀深情的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其中有给他言传身教、关爱照顾的老师，同学习共战斗的同学们，也有给联大师生的教学生活、民主活动以支持的政府官员、社会志士，等等。

受篇幅所限，我们从全文中节录一部分先生对联大老师的回忆文字刊登于此。透过先生平实真切的笔触，我们得以领略大师们的绝代风华。

## 故 人 故 事

# 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文 / 张友仁

我生于1923年，1942年1月在浙江省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当时，由浙江省教育厅派官员到浙江黄岩灵石举行全省高中毕业生的会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免试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育部批准了我的志愿。由于战时东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断绝，我请黄岩籍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替我保留学籍一年，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43年秋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入学后，老同学告诉我，在中国学了航空工程，毕业以后，也不能自己制造飞机，只能在美国运来的飞机零部件上加工组装。而且要在这加工飞机零部件的工厂工作，首先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那时是不愿参加国民党的，所以就想转入经世济民的经济系。

于是我打报告向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石先教授要求转入经济系，杨教授是主张科学救国的，他批示：“不准”。

我又向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申请转入经济系，这时适逢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赵迺传教授（他和陈岱孙教授、陈序经教授轮流担任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路过李继侗教授的办公室外，赵迺传教授同李继侗教授说：张友仁想转入经济系，他是经济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请你帮助给转一下吧！于是我就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了！

## 陈岱孙教授

陈岱孙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任教长达70年之久。他自称：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我自1943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做他的学生，到他1997年逝世，长达54年，受到他温暖深切的教导。他是我公认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教授、主任。清华大学派他到湖南长沙筹办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确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认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反对通货膨胀，反对腐败，等等。

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他是经济系主任。我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原来是萧蓬教授担任的，不久萧蓬老师出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课非常认真清楚，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



陈岱孙



周炳琳



赵迺诤



朱自清

政学课程。他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打下西方经济学的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份。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共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回到北京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他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文的主

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

“文革”中全国的干部都在学习《反杜林论》。可是对于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该书第二篇第十章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章，视同天书，全国无人读懂。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均告阙如。直到他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楚原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反杜林论〉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全国干部学习的困难。

他治学严谨，对《反杜林论》一书恰切的评价，而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本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的见解，反映了陈先生的胆识和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先生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从这本书的科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吴晗



冯友兰



沈从文

## 周炳琳教授

周炳琳教授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7年8月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内，签发文件，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女士是长沙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北大之迁长沙和她有关。1938年1月又签发文件，将临大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11月13日联大常委会决议聘周炳琳为教务长，由杨石先暂代。12月5日周炳琳竭力推荐潘光旦为教务长，他本人则在经济学系任教授，开设“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法科研究所所长。1944年陈序经教授赴美，辞去了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联大聘请周炳琳为法商学院院长。他还是联大教授会的成员，并且多次担任教授会主席。

在联大，周炳琳教授经常应邀在校内讲演。1942年4月讲《战后经济秩序》，11月12日讲《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时代意义》，1944年5月4日讲《五四运动》，5月26日讲《宪政中的经济政策》等等。那时，周炳琳是国民参政员兼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每次在重庆开参政会回到昆明，同学们都要请他作报告，讲国民参

政会会议情况。1944年10月2日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归来，在联大作《我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的报告，介绍参政会上民主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情况。在参政会上，他曾力主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反苏。当参政会通过一项由顽固派提出的恶毒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而迫使中共代表愤而退席时，周在会上指出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并于会后邀约部分参政员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表示慰问。他在参政会上还曾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区“政治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顽固派的参政员则大叫大骂，攻击他是“诋毁元首”。1946年国民参政会迁回南京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

周炳琳教授和联大许多进步教授一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后期，1946年春，周炳琳担任停战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五·五”宪法草案审议会专家，同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多次在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

联大常委会本由三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经常由周炳琳代

理，张伯苓长期不在昆明，由陈序经代理。常委会主席则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9月梅贻琦主席赴重庆出席教育复员会议。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在周炳琳代理联大常委会主席期间，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周炳琳等受教授会委托，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罪状。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教授会还委托周炳琳同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一起，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控诉屠杀师生的党政军当局。在12月14日的教授会上，他的罢教7天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教授们的赞成，并且通过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12月11日梅贻琦在重庆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会晤中，朱十分紧张地告诉梅，国民党政府准备解散西南联大。12日晚8时梅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赶回才盛巷与周炳琳等长谈，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家。后来，他又多次与周在一起长时间地研究工作。他们力图保存西南联

大，希望同学早日复课，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极为重大。15日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由梅贻琦、周炳琳等讲话，劝告同学于17日复课，不复课则有联大被解散的严重后果。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19日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冯友兰、赵迺抃教授一起草拟劝导同学复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其中写道：教授会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对于非法禁止集会禁令，教授会已推举三位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仍望同学于20日照常上课。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抃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在这以前，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已被蒋介石以“防范未周”为理由，令其“停职议处”，并于12月8日宣布由霍揆彰继任云南警备司令。12月24日“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被调离昆明。同日，梅贻琦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然后，1945年12月25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言自即日起“停灵复课”，并继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将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到底。这就使蒋

介石的解散联大等“最后处置”的计划无法实现。到此，“一二·一”运动告一段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在这以前，西南联大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委员，并请周炳琳为召集人。6月周到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重庆的联合招生工作，7月17日他惊悉闻一多教授被刺殒命，极为愤怒，当即致函梅贻琦：“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他又与复员途径重庆的联大教授们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致电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至祈从速办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

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将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受到广大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与拥护。

## 赵迺抃教授

赵迺抃教授，号廉澄，1897年生于浙江杭州。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3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北京大学当时最高的学衔，也是最高级别的教授。后又被任为经济学系主任。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在经济学系任教。1938年春，临大迁往昆明，他担任旅行团团长，同部分中老年教授一起，经桂林，出镇南关（今睦南关）到越南同登，改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

1938年3月临大改称西南联大，赵迺抃仍担任经济学系教授。他讲授必修课“经济思想史”和两门选修课，从“商业循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经济思想”等课程中每年选出两门讲授。在国统区的大学里正式开设“社会主义”课程是十分罕见的。这门课程中，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篇章和内容，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听课，同时，他还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担任研究生导师。1944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赵迺抃受聘讲授英语，直接为抗战尽一份力量。

在联大，除教学之外，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专著《欧美经济学史》一书的初稿，就是在滇南的鹅塘完成的。这一时期，他还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经济工作要“竭力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福利”，“务使人类之最大多数，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最大量的幸福”。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

策作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是“买办政治的财政”，经济是“官僚资本的经济”。他公开主张：“集中力量，铲除买办政治的财政与官僚资本的经济。”1945年10月15日，他在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战后之中国”系统讲座上讲“战后的复员问题”。

在昆明，他和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济学系有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都竭力支持，有时甚至拿出现金资助旅费。记得陈忠经学长等就得到过他的支持。1945年暑假，他曾应同学们的邀请到澄江县抚仙湖畔，指导同学们作地方经济调查。

“一二·一”运动中，他对同学深表同情和支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前往四烈士灵堂致祭，并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和挽联，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送的挽联全文是：

“徙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的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

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在教授会上通过了罢教一星期以响应学生罢课的决议。后来，在联大面临被当局“最后处置”（解散及其他）的危险时，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上，他和许多教授们一起，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在12月9日的教授会上，推举他和周炳琳、冯友兰一起草拟《教授会告同学书》。还推举他们代表教授会，往见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取消禁止集会之禁令。

1946年初，北大复校，他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讲课之余，他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以抨击。文章内容包括：“打倒官僚资本，实行经济革命”；“平均财富分配”等等。他撰写的《欧美经济学史》学术专著，1949年初在上海正中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登上接往南京的飞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北平解放后，他主动开设新课程，还聘经济学界的进步人士来经济学系任教。从50年代起，他从事大型学术专著《披沙录》的编写工作，写成初稿约600万字，后经修改压缩为300万字，前二卷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等

媒体认为它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

钱家治先生是赵迺抃教授在浙江杭州杭府中学任教时的校长，他的儿子钱学森早年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曾请赵迺抃教授为他补习中文和英文课程，又请赵迺抃教授的夫人骆涵素教授为他补习数、理、化课程。

1981年钱学森等在他任教50周年之际，写道：“赵迺抃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埋头著书，锲而不舍，对于中西学术思想之源流，俱有精湛的著述。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在祖国经济科学的教育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在他年事已经很高的时候，仍夜以继日地从事《披沙录》最后一卷的定稿工作。不幸脑病发作，于1986年12月逝世，终年90岁。他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的教学和研究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 朱自清教授

我在西南联大一年级必修的“大一国文”课程是朱自清老师（1898—1948）教的。他曾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我的出生地驿亭镇五夫村附近的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教书，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大一国文”的教室是在昆明城北郊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东南角的一间教室里。他讲课十分简洁清楚。我还听过他的“宋诗”课程。他说宋诗的特点是淡泊宁静。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教授1946年夏遭暗杀后，朱自清教授负责编辑《闻一多全集》。我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听闻一多教授的政治性的讲演的记录稿整理后寄给吴晗教授转给朱自清教授编入《闻一多全集》中。这些讲演稿非常重要，都是原来

没有收集到的，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引用了这些文章中的话。

上世纪40年代，他宁可忍受生活困难也不买廉价的美国救济面粉，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操。

1948年夏，他听从台湾来到他家的客人说，在台湾盲肠开刀是小手术，没有问题。他也就到医院开刀割治盲肠，不意竟大出血致死，死后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西墙内。

## 吴晗教授

吴晗教授（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40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他在讲课时，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我在西南联大读一年级时（1943—1944），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是在孙毓棠教授教的那个班上，可是我不听孙教授的讲课（在昆华北院北教室），去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课（在昆华北院教室）。

1944年春，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食堂的“监厨”，同厨工一起到昆华北院的府甬道（原云南知府衙门南边的甬道）买菜时，看见吴晗教授也挎着一个篮子和秤去买菜。当我们买好菜要往回走时又碰见吴晗教授，他的篮子还是空空的。他和我们说：“菜都很贵呀！”

在昆明我听过他讲的《明史》课，他写了一本《朱元璋传》，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是毛鸿上校替他抄了一份。

1946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去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看望过他。他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畅谈他的生平。

1948年8月15日早晨，我在清华园内散步，碰见他，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不意竟成为他的标准照，流传很广。

1948年旧西院12号的客厅里常常传出打牌的声音，那是用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的。我

们在那时议论过，胜利后如何处置战犯的问题。有人说，把他炸死，有人说，这就太便宜他了，应该如何如何。

1949年北京解放后，作为老盟员，我们帮助他争取到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职务。

前些年，义乌市邀请我到义乌吴晗故居访问。知道他的父亲是浙军军官，驻军浙江石浦（就是电影《渔光曲》的拍摄地）。他在石浦生的女儿，起名为吴浦月。

我还敬谒过吴晗老师的墓地。在他的坟墓旁还有我题写墓碑的他的亲人的墓地。

## 冯友兰教授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州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西南联大他教我们《伦理学》，是在云南知府衙门的后花园里，他站着讲，我们都站着听。

抗日战争期间写成《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等书。1949年后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他的全部著作汇集成《三松堂全集》。

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要定他为中央委员，他谢绝了，他说：我要是当了中央委员，就不便为你说话了。还是不当为好。在同一次会议上，周炳琳教授也拒绝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追悼会上，冯友兰教授写了歌颂周炳琳教授的长诗，挂在墙上，追悼会后就被人作为祭品烧毁了。

抗战前，冯友兰教授从欧洲回来，途经苏联，回国后讲了一些苏联的好话，不意竟被逮捕，押往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冯夫人急往向周炳琳教授下跪求救，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周炳林教授立

即将他救出。事后冯友兰教授在书中写道：无事则短，有事则长。我在保定只被关押一、二天，却觉得有长达经年之感。

记得在西南联大时，同学们出的一张壁报上画着一幅学生的头像，嘴上锁着一把锁，锁上写着冯友兰著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等）书名。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军宣队逼迫他讲出北大同事们的一些经历，致使他们也受到军宣队的迫害。

## 沈从文教授

沈从文教授（1902—1988）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文学家。

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大一国文》、《中国小说文》、《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创作习作》等课程。

抗战时期，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副教授，我所读经济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都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的课。

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记得他讲起过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他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在邵阳壮烈牺牲。临刑前请狱友为她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狱卒奸尸。她牺牲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等口号。此事后来被北大同学王实味写入《野百合花》文章中，刊载于延安的报纸上。王因此受到批判，直到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错误地处决，此事有关领导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对王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和许多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期事，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上选购丝袜；蒋光慈、胡也频等1931年在

上海龙华的牺牲；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其治丧工作；等等。

1931他曾多方奔走，找胡适、找蔡元培、找邵力子、找陈立夫营救胡也频，而胡最终被害。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他和蔡元培、杨栓等3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去电行政院要求释放丁玲。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在课堂上和我们讲。

他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了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这一行为在大学课堂中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以行动给我们这些不给女同学让座的男同学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和教育。

沈从文教授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对于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他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叉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教授是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湖南的旧军队，次年成为上士司书，

为湖南军事将领管理过图书和古董等。1923年脱离军队，1926年辗转到达北京报考燕京大学，没有被录取。他住在沙滩北大附近的小公寓中，到北大旁听，同时刻苦攻读几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流着鼻血仍坚持不懈，然后走上写作的道路。开始发表作品时，曾得到胡适、郁达夫（北大经济系讲师，教统计学）、徐志摩（北大教授）等人的支持。后来，他还曾写道：“我在《晨报》副刊、《新月》投稿，都因志摩关系。”（《沈从文1986年4月25日致孙琴安函》）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编《红与黑》、《人间》等文学刊物，参加新月社。1929年得胡适的聘请，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讲授“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在中国公学他认识了一位女学生张兆和，两人于1933年结婚。1930年秋他又到武汉大学任教，开设“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两门课。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杨振声校长于1931年秋，聘请他到山东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33年协助杨振声先生编辑国文教科书。1934年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长达十余年之久。1939年任西南联大副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他虽然是自学成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可是他对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服饰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非常招人喜爱。“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就是请他书写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一位刘文典教授，自命为古典文学的大权威，他十分小看沈从文教授。有一次他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逃避敌机空袭遇到了。刘竟说“你也来逃警报呀！你也值得逃避警报吗？”人们听了都愤愤不平，而沈先生则泰然处之。后来，刘先生因经常不到校上课，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刘为此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申诉，梅校长查明情况后仍维持中文系的解聘决定。

沈先生家里藏有极为丰富的“五四”以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而且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有的同学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了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1946年秋，北大教授们从昆明回到北京。他入住海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花园（现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红楼门前就挂着北京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两块牌子）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文学院朱光潜院长、法学院周炳琳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驊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我因为工作关系，常到那里去，也常和沈先生见面。

1948年夏，他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在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篇文章分二期在《新路》杂志（半月刊）1948年上发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描述颐和园和中国近代史的一篇极好的散文，至今没有超过它的。我想，在沈从文先生的头脑里装有一部活生生的我国近代史。他写的小说也都是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和深刻的写照。

1948年北平围城中，他本无南下的打算，经过北大地下党人的工作，更加坚定了他留下的决心。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也拒绝登机。

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身体很不好，患有抑郁症，有时有幻听，有时甚至有幻觉，有一个时期不能

教课，也不能从事文学创作。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他被分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同时调往历史博物馆的还有任副馆长的原北大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沈从文曾主动作过讲解员的工作，我曾听过他对罕见的历史文物，如西藏黄教的文物讲解得有声有色。

195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当选为文代会代表。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以微笑作答，可是事后并未写小说。

在历史博物馆，他用科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写出《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旧中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对新中国的文物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3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文化部交给他研究中国服饰史的任务。他认真对待，兢兢业业，于1964年就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图文并茂的空前专著——《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的初稿。全书文20万字、图200幅。出版有征求意见用的样书，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缺。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此书不但未能公开出版，而且被看成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横加批判，并于1969年将沈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冬，他回到北京，他将书稿加以修改，交给领导审阅，可是在馆长办公室压了三年，又被退回。1978年，由于胡乔木同志的过问，沈从文教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修订这部力作。1981年此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受到全世界历史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从该书的写作看来，足见他的国学学识是极为深邃的。

# 北大图书馆藏书小记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朱强

金秋时节，美丽的燕园又一次迎来了众多入学报到的新生，他们青春洋溢的脸上带着兴奋、喜悦、探寻、新奇……对于这些年轻的学子，拥有着“一塔湖图”的校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激动的。“看，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大图书馆！”此时走在路上的我，不时会听到这样的话，更会看到很多在图书馆门前拍照的新生及其家长。

是的，这座校园内标志性建筑的“图”——巍峨、庄严、神圣、甚至略感神秘的图书馆，将会是他们未来四年乃至更长的学习生活中朝夕相伴、常来常往的地方；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将会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而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掌握通过图书馆自



▲ 朱强馆长

学、探索未知的本领，将使他们受益终生。

那么，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都有哪些特色呢？笔者借此短文略述一二。

历经111年的搜求与积累，北大图书馆已经拥有800余万册件图书、期刊及其他文献。馆藏中，中文古文献达150万册件，其中古籍善本20多万册，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李氏木犀轩藏书、马氏藏书、程氏篋箱斋戏曲唱本等独具特色。以“艺风堂”、“柳风堂”为主体的金石拓本，加上近年来不断收集的旧拓以及新出土墓志的拓片，收藏已达6万多册件。以上两项均列高校第一。馆藏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有20多万册，其中民国期刊有1万余种，许多为国内孤本。馆藏中还有数以万计16-18世纪出版的西文善本，数十万册西文书中，有大量西方科学文化经典著作及大套的英美等国学术资料，东方学研究的著作也构成一大特色。“北大文库”则收藏了大量名师、校友的著作、手稿、学位论文、学术档案资料，成为彰显北大学术成果、激励后学的宝贵资源。

本世纪以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出版物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北大图书馆致力于发展数字资

源，目前每年订购（租用）400多种中外文数据库，其中中外文电子期刊4万多种，中外文电子书200多万种。另有5万余种音像数字资源。此外，北大图书馆还自建了多种数字资源，包括数以千计的“北大讲座”、“名人博客”、多种名师口述史资料等。

丰富的资源来自于一代又一代馆员的不懈努力，正是他们不辞辛苦地四处访求，才积累了如此宝贵的书刊文献供后人所用。北大图书馆里至今流传着不少访书的故事，仅举其一：话说50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的，除了教书、治学，一有空闲就去琉璃厂等处旧书店访书，馆藏中的大部分敦煌卷子均为其任中所购。很多书贩子知道了他的这一爱好，每有新获即送书上门，以至于向先生在其不多的待在图书馆办公室的时间里，门外常有肩挎包袱之数人站立等候，为的是向他推荐收购来的线装书。北大的老师有时出差出国也会购买少量学术著作带回，交给图书馆登录上账报销后，得以优先使用，客观上也帮助了图书馆充实馆藏。

馆藏的另一大来源是海内外的捐赠。北大图书馆建馆伊始，就接

收了相当多的朝廷和官书局赠书，上世纪20年代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捐赠本馆，开私人大笔捐赠之先河，其后绵延不绝，于今益盛。作为馆长，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四面八方寄来的赠书。而为弥补本馆购书经费之不足，馆员们也耳听四路、眼观八方，尽力了解校内名师大家是否有赠书意愿，一有机会即加以争取。多年来，北大教授们（或家属们）常有将毕生所藏倾其所有无偿捐赠图书馆者，高风亮节，令人感佩。仅本人所知数量较多的，就有胡适、饶毓泰、周一良、侯仁之、张玮瑛夫妇、季羨林、段宝林、宿白、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等。海外捐赠中，即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赠书、日本岩波书店连续66年赠书、日本友人正木龙树先生连续14年赠书、哈佛大学方志彤教授赠书、法国学者侯思孟先生赠书、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赠书等，使图书馆获得了大量系统性学术性极高的珍贵馆藏。有些捐赠不仅包括图书，还包括学者本人或所藏其他人的手稿、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例如本馆近年来接收的朱家骅年谱手稿、胡适秘书胡颂平日记、司徒雷登书信等，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纪录，对于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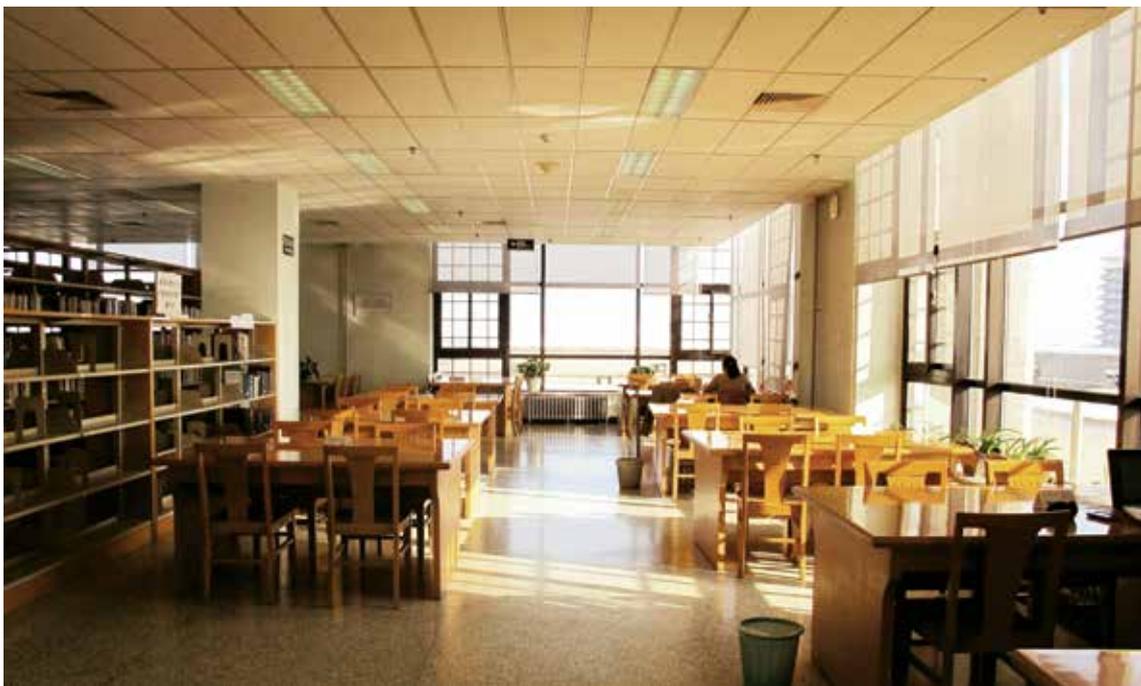
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读者在借阅北大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时，常会发现书后盖有“某某赠书”字样的印章，这就是本馆为纪念和表彰赠书者之功绩而刻；对一些大批量而又系统性的专藏，本馆还辟有专室陈列，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所利用。最近，我们还在图书馆网站开设了专门的捐赠页面，回溯过去的捐赠记录，以向所有的赠书者致谢和致敬。

当我们在图书馆借得一本书，翻阅时意外地发现其中有某位大师的借阅记录甚至是签名或批注时，那种穿越时空与大师交流的感觉，定会令我们有不一般的体悟吧？

最后，我想以王恩哥校长在2013年秋季开学典礼上对新同学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要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多去图书馆、多去自习室……，不断健全自我的智识，不断丰盈内心的世界，视野开阔了，气象会更宏大，就能为未来更好的成长打下基础、累积势能。”

朱强 于2013年9月15日



▲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明亮，阳光满屋，窗外还可见美丽的未名博雅。这里正是学习的好去处

# 如何理解中国外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逸舟

“如何理解中国外交？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正在成为各国专家广泛分析的样本。在众人瞩目、进步显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画面里，到底有哪些主要推动因素和限定（约束）因素？大体上，笔者把构造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因子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结构性因子，它们基本上是给定的、长期作用的、不轻易改变的，属于“发生的前提”、“存在的环境”和“外部的系统”。这类因子包括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特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变迁规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等。在长时段上，它们从不同侧面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发生的背景、性质与条件。

第二类是器物性因子，它们更多与全球市场及贸易的发展有关，与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与工商界和消费行为的兴起联系在一块。这类因子包括传

统媒体的活跃、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及方式的多样化、商品消费热潮的到来和普通人日益强烈的消费主义等。这方面最近的事态则是全球范围地区主义的兴起，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发展。

第三类是体制变革因子，在这里特指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的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它们带有极鲜明的中国新时代特点，只是出现于最近的两三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外交部门内部的各种调整充实、核心外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与大外交（包含地方外交和广义的外事）的积极互动、公共外交的出现和扩大，等等。这部分因子与第二类因子在形式和内容上当然有很多交叉，笔者之所以做出区分，重点在于强调变革时代中国外交民主化的制度效果。

第四类是个体性因子，它们与个人的经历、专长、情感、偏好有关，这类因子即便不带有偶然性，也比较易变，典型的“因人而异”。在当代中国外交场景里，这里的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两类人：一是政治领导人物和主要外交首长；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政策咨询、有一定影响的外交学者，特指最近十几年逐渐兴盛的外交咨询工作及其代表。

下面对这四类因子分别略加解



▲ 王逸舟教授

说。限于篇幅，这里只勾勒基本线索，不做仔细论证。

## （一）结构性因子

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 1.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主要特性是由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外交表达着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它对国际关系的主要诉求。一个国家的外交，是通过官方认可的对外交往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基本结构、大的目标、自我定位等，展示给它的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本质上，外交是内政的展示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

体的各主要规定也是区别新旧中国外交的政治界标，是中国外交制定和推进的政治前提，是考察中国与世界关系复杂互动的政治窗口。

比如，同样人口众多和有着受西方列强殖民和压迫的历史，同样正在快速崛起和自我归位为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的遭遇却常常大相径庭。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印不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主宰的当今世界主流政制的磨合不一样。再比如，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外交，除开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等必须与西方国家协调合作的一面外（这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还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适时有力地回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们差不多被视为少数西方大国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代名词），而后者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影响下，普通百姓在观念上会比较亲近和同情亚非拉国家及其人民。这种社会心态培育起来的中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特有目标与口径，例如，毛泽东关于“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著名论断广为流传，现在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的首访区域还是非洲（很难想象把非洲换成美国或日本会有什么后果），周恩来当年“亚非十四国两月行”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是中国外交官培训时的重要内容。不论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变化，中国政治的基

本线索是不可磨灭的，离开它便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之多样而辩证的逻辑。

## 2.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经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屈辱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和所有外交官来说，他们的首要使命之一便是“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在一般外交理论中，只有弱小国家才会丧失主权和受到欺负；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价值在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中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确非一般大国、强国所能比。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近代百年屈辱史的铭心刻骨，无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容易理解，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尤其是与传统西方列强发生纠纷时，中国老百姓就会产生“八国联军又来了”的联想，而不大倾向于细致思考中国方面可能的原因或互动过程的复杂情况。

也不难解释，与其他大国关系对比，譬如说，为什么中日关系显得敏感而脆弱——每当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格外高涨，中国政府承受的压力可能大大超出一般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委与起落当然不全是外交方面的事情，但它肯定将伴随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整个过程，使后者呈现某种“斗争/合作/再斗争/再合

作”的多重磨合景象。

## 3.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百年的屈辱历史之所以显得格外沉重，乃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个在发达程度上曾长期雄踞世界民族前列的东方大国身上。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中国当代外交，尤其是观察和衡量民族情感及大众心理对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既离不开对不堪回首的近代史的记忆追索，更不可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底色”位置。这是一种复杂的构造过程，里面包含着两重性：从好的一面讲，它有利于保持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思想坚定性，理论上有助于建立不同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下形成的外交学说和实践；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著名外交战略思想就很有中国特色。从不利的一面说，它容易让人自大和排他，弄得不好会导致不合时宜甚至有碍合作的民族主义情绪。

## 4. 西方文化与意识的进入

伴随鸦片战争的到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蜂拥而至，形成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压力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形态的强烈冲击。就中国外交的主题而言，近代西方缔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重心，是必须逐渐“融入”和适应的给定环境。

考察中国外交的各种题材、重大事件、行为方式、动员口号等，

研究者一方面会看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来演化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觉醒，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方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个事实上弱肉强食、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里，适应理论上和表面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一票的联合国及主权国家交往方式，包括应用外交概念和国际法准则来争取本国权益和为斗争策略加上合法标签，都是中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西方话语系统，是掌握了战场上与对手博弈本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熟悉的新的斗争技巧。这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曲折漫长，并不轻松。

例如，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究其内涵和立意，源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而联合国体系就像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样，大体上可以视为传统列强在二战后初期设计的主要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中，同理可适用于判断“自由”、“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的推广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自身的调整，西方体系和意识形态本身也变得更加精致、具有多重效果和难以简单定性，世界经济贸易和国家的对外实践里更加无法用“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的是非标准判别它们。今天，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中国“另起炉灶”（不论这些呼吁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已同现今的国际体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博弈场的主要玩家之一，中国外交的进取或挫折只能依据现有的大国外交框架、多边外交舞台、周边外交平台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进退加以衡量，所有这一切严格地说（严酷地说）均为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的产物。

## （二）器物性因子

### 1. 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

今日中国，通过媒体、网络、移动终端等等各种媒介获取和了解信息，用它们加强能力和改善待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方式。评估信息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在西方

发达国家，由于历来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和外交事务对纳税人有交待的义务，信息浪潮的到来大体上可看做强化了已有的势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外事无小事”，政治上要求“外交要保密”，因而社会公众对外交的了解非常有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等极左年代，通过广播收听外媒更是危险的事情，发行有限的《参考消息》只是少数人的国际消息来源。

新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外交部发言人与其说是发布新闻，不如说是帮助公众和外界对已掌握的各种消息分辨真伪或解释立场；有些真正需要保密的消息或事件，却常常由于外媒的透露而提前曝光，更可能被敏锐而乐于捕捉消息的年轻网友广为传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说到底，全球信息技术的进展及其穿透力给各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传统管理方式造成了从未有过的麻烦与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 2. 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的影响

在中国，工商业对政治决策和外交方针有不断增大的实际影响，而这种格局的形成首先来自市场化条件下难以遏止的大众消费热潮。市场经济的主体——工商业者——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即要求参与事关贸易、通关和纳税之规则的制定，至少要求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和可以预期。如果这些规则涉及对外交往，工商业会对国家的对外战略更加敏感，对外交部门的举措更加在意，对（譬如说）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出更多的保障要求。

在中国的体制下，虽然很难见到美式的大企业游说团体和所谓的“压力集团”，但上述三个方面都有踪迹可寻，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与对企业和商界利益的考量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例如，新时期不断扩大的外交领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少驻外大使和特别代表甚至承担起了招商引资的重要使命。中国公众很容易注意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替受到指控和批评的本国公司和个人的商业行为做出辩护，尤其当中国

人的海外收购活动遭受不合理的政治阻碍时。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国主要领导人出访时，常常会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商界人士随同全程，而且最终总有大笔合同订单的签署。外交部门和工商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外交”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指导思想里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 3. 地区经济一体化

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到一定的阶段，地区一体化进程还可能自动出现有助于增强共同军事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直至共同社会身份的各种“外溢”效果。这种始于欧盟并且成型成熟于欧洲范围的这一发展路径，在显露出积极的效果之后，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借鉴、仿效。

上述事实对中国外交过程的渗透是在最近十多年逐渐出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促成东亚内部各国经济协调合作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推动中国大国意识的萌生和决意参加本区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起点。在那次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邻国提供了信贷方面的支持，并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周边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之后中国的声望和地区影响力迅速提高，也给中国外交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和启示。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说法逐渐增多，多边主义概念在中国外交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安邻”、“睦邻”、“富邻”等方针逐步取代了过去充满争议的和令人担忧的关系格局。更多的中国学者和外交人士认识到，在本地区形成合作态势和占据主导位置，是中国迈向全球大国高地的必经步骤，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与其他地区冲刺争锋的必要保证；在最新的中国外交实践里，则有日益增多的实例证明，这种认识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响应与创意，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和协调。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平台的搭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

立，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各种倡议，与日本、韩国等国一道针对金融危机所做的货币金融协调和安排，人民币作为地区结算币种在周边国家的推广，及至与东盟国家签署或参与的有关无核区、自贸区、海上安全安排、非传统安全协调、“香格里拉对话”的各种协议等，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决策圈和外交部门对本地区和谐氛围的看重。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后果类似，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机制、新路径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形态的塑造，对于中国人不同于旧时“天下观”的新国际主义观念（首先是地区主义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外溢”影响。虽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中国的地区主义方针对于自身发展和国家形象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 （三）体制变革因子

体制性因子在中国特称“体制变革因子”，是由于外交体制本身的变革是在改革开放总体氛围和要求下出现的，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里说的体制变革因子，主要包含核心外交圈（外交部和中央外办）的改革和非中央外交（各部门的外事工作及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的兴起。

### 1. 核心外交圈的创新

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狭义上的外交并非只是由外交部操办，而是有一个特殊的机制：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直接隶属最高领导层，中央外办主任相当于党的总书记的外事助手，这个级别较高而人员相对精炼的机构基本上由职业外交官和党的对外联络部门的官员组成。而外交部则是国务院的主要部委（内阁级）之一，履行一般国家外交部的传统功能，即代表国家和中央政府对外交往。恰似外交部在国务院的位置一样，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则是执行党的对外交往任务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和协调党际间交往的各种具体事务，它同样是中央外办纵向协调和沟通的主要单位之一。不过，从承担的事务量和在外界的影响衡量，中国外交部依然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主渠道，是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履行各种使命、签署各种协议、表达各种诉求的主要声音。

研究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在笔者看来，比较方便和有效的观察视角是外交部的功能性改进，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时间，这方面的变化与调整特别丰富和卓有成效。首先，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气象，中国外交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专门办公室和特使安排，以加强对特定地区和事务的影响。比如，负责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人员编制和办公机制；向非洲、中东等热点区域派遣了负责苏丹达尔富尔事务的特使（常设）、中东问题特使（常设）；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关注与呼吁，设立了中国政府气候问题特别代表；与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共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常设），其办公场所便安置在北京。

其次，根据中央精神和要求，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间，不仅外交部的政策研究部门得到扩大，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方面的经费和人员投入，包括设置重大调研课题、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吹风会、政策分析会和各种咨询活动；政规司和其他职能司还经常登门请教，与国内（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学术机构、重点高校和外交智

库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协调与合作关系。

再次，按照党和国家领导层近年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精神，外交部也提出了“外交为民”、“外交是人民的外交”等要求，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例如，建立了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经常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外交部参观并答疑解惑；外交部的一些部司级领导常常到各地方和高校作报告；外交领事保护的范围和工作量不断扩大，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旅游者、留学生、出国经商和务工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外交部不仅公布部分历史档案，而且定期更新工作网页，一些大使和部司干部还经常上线回答网友提问，在开放性、透明度方面走在国务院很多部委前面。

最后，研究中可以发现，外交部绝非只是上级意志的“传声筒”，素质日益提高的新一代外交家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自己的创意与妙笔。以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政府推动的“大国战略对话机制”为例：尽管它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直接受令于最高领导人，职业外交家们在具体的操作办案、对话样式、议题选择以及难题处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富有创造性的作用，其工作及成效受到国外同行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此外，在协调各部委处理中共中央交办的一些重大任务方面，在预报重大国际事态及涉华危机方面，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外事方向的意见和建议方面，中国外交部门都有一

些可圈可点的主动作为。所有这一切还在扩展深化中，而它们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很大约束的中国外交不太容易看到的，因而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进取和变革的气象。

## 2. 非中央外交的兴起

非中央外交在中国场景特指两种情况：其一是非核心外交部门之外的部委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单位的对外交往行为，其二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的对外交往行为。

在目前的中国，对于各种形式的“外交”有许多形象的称谓，如“政党外交”、“军事外交”、“体育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社团外交”、“工会外交”、“青年外交”、“妇联外交”等，它们更多扮演一种拾遗补缺的角色，与核心外交有着互补互惠的关系。原则上，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等）在安排重大外事之前，要把自己的议程与邀请对象向外交部做出通报，取得后者的认可与指导；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活动特色，不仅填补了繁忙的外交部通常来不及顾及的许多空白，帮助本部门实现某些独特的对外诉求和利益，而且有利于对外展示多样丰富的中国形象。自然，由于利益不同、视角各异，外交实践中也会遇到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局面。

对于研究者来说，非中央外交

在中国的典型样式是各级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和对外交往。例如，东北、西北诸省份探索出与中亚和俄罗斯交往的“边贸外交”与“能源外交”，山东和东北一些省份形成了与韩国各级政府合作建设的开发区或工业园，西南方向的各省（广西、云南、贵州等）瞄准东盟等地区开发建设“西南大通道”、“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地区博览会招商会”等小区域合作平台。笔者想指出，尽管这些“次中央外交”看上去都有主打经贸和能源牌的色彩，然而外事部门起了很大的协调、沟通、通关和通报作用，外交部往往也提供了一定指导和协助。有意思的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非中央外交”越是卓有成效，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经济起飞与地方性上升的相关性，给研究者判断多样的动态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

#### （四）个体性因子

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个人对外交的影响。外交政策往往因人而异，包含一定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影响中国当代外交的个体性因子包含三类人，即：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智库学者。与外交官和智库学者相比，政治领袖有着异乎寻常的巨大力量，尤其在中国的国情和条件下，他们经常起到制定航向和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

就中国外交来看，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方略多半涉及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大棋局，无论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三个世界”、“中间地带”、“一边倒”或“联美反苏”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两大主题”、“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不扛旗、不当头”的韬晦思想等，都是一些大事情或百姓不太容易感受的大目标。而新一代的领导人尽管也提出不少涉及全局的判断，但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的民生问题（“外交为民”）、实际的经济 development 问题、与邻国关系上出现的摩擦问题、加入

更多功能性国际组织问题等，更多地涉及建立和谐世界、稳定中求发展的内容，是公众可能参与的事务。

再比如，同样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气氛下，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态度和风格就与毛泽东大相径庭：周恩来比较倾向温和的外交路线，行事作为是典型的外交家；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仅表现在国内各个领域，也体现在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不妨设想，假使把两位领导人的角色对换，重大外交决策及其后果的画面可能出现一些微妙的改变。同理，改革开放年代执政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们的背景、年纪和个性有所不同，在对美外交、对日外交和涉台问题等方面有略微不同的认知和政策差别，是很自然的事情。研究表明，结构和位置通常决定了执行者的基本的方针和态度，但角色的扮演却可能由于个性、认知、偏好、经历、环境等诸多因素而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尽管与国外有许多本质的不同，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许多大戏中，仍然可以识别角色的不同个性与努力。

当代中国外交虽不能脱离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而存在，但它确有自身的基因和独特的构造。人们实际见到的中国外交，并非单一因素的引导和决定，而是多层次、多步骤发生、相互作用和制约、反复塑造或对冲的结果。把中国外交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就会发现，各类因子的强弱和起落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恰恰相反，它们是令研究者兴致盎然的分析目标，是中国外交学界尤其应当而且可能做出重大发现的对象。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年3月20日】

# 吴晓铃昆明读书记

文 / 刘宜庆 专栏作家、书评人。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近年致力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

从北平到昆明，吴晓铃买书、卖书和读书的经历，虽然是一个学者的私人记忆，但折射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天下爱书人的心思是相通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与书有关的冷暖和甘苦，引起今人的感喟。



▲ 马连良(前排左一)、吴晓铃(前排右一)与王金璐夫妇合影

吴晓铃(1914—1995)，辽宁绥中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知名的私人藏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神学院、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至1946年在印度寂乡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授。1947年起任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中心通检组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国家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精通梵文，致力于中、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著作有：《西厢记》校注本、《关汉卿戏曲集》、《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话本选》(合编)、《西谛题跋》(七卷)、《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郝寿臣脸谱集》等。译著有：梵文剧本《小泥车》、《龙喜记》等。参与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古本戏曲丛刊》等。曾先后获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和印度国际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藏书家吴晓铃从进入北大开始就养成了去厂甸逛旧书肆的习惯，他和古籍书店的掌柜、摆设浮摊的书贩混得很熟。他非常喜欢一边翻看古籍，一边和书肆主人交谈。“对于书籍的内容虽然他们不一定完全明了，可是关于版本的真伪新陈、校勘的精致错劣却知之最详，这是我们读书人所不及的。”

在战前的北平，北大的教授和学生都爱逛书摊，按照自己的学术方向收集古籍。胡适曾对北大的学生说：“这儿距离隆福寺街很近，你们应当常常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吴晓铃受到影响，经常买古代戏曲方面的书籍。他爱听书摊主人的闲谈，里面透露出不少北大学者的读书趣味和方向的信息：“又有一次在厂甸，那书摊的经理人告诉我，周岂明是如何喜爱明清的小品文籍，又怎样在《论语》上用了向来不曾用过的笔名

写《缙女图赞》；郑西谛收集杂剧传奇，郭绍虞性嗜诗话，马衡、容庚、唐兰诸先生则是研究金石文字的专家；还有谁有什么著作，谁嗜酒，谁怕太太，谁走起路来是一晃一晃？”（《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那时的书商经常送书上门，用蓝布包一大包袱，送到学者家中，看好了就留下，到年底才一起结账。吴晓铃这段话中说到的“谁怕太太”，大概指的是胡适，胡适爱买古籍，但书商到年底讨账时，他的太太江冬秀自然不会给书商好脸色看。

1937年，吴晓铃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助教，1938年11月，吴晓铃接到老师罗常培从昆明邮寄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旧店重张，盼速来！”

赴昆明前夕，吴晓铃向顾随(顾羨季)辞行。顾对吴晓铃说：“孙楷第先生和我都由于

健康的关系不能作万里天南之行，看来罗常培先生把你叫了去，兴许是让你开戏曲和小说的课程！”吴晓铃和同班同学杨佩铭一起结伴，从天津走海路经上海和香港，再从越南的海防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经河内和老街、云南的河口、碧色寨和狗街子等地，于1938年12月到达昆明。

罗常培对吴晓铃帮助很大，经他提携，吴晓铃为西南联大三大、大四中文系学生开设教育部定的“杂剧和传奇”必修课(实际就是中国戏曲史)。吴晓铃能开起此门课程得益于他在战前经常购买、收藏、研读中国戏曲方面的书籍。

吴晓铃在《危城访书得失记》一文中写道，从1937年6月到1940年6月，“如果我还有一点儿弄学问的希望的话，那，我愿意把留在北平的一年半叫做我的治学的‘光明时期’，而避地滇南的一年半叫做我的‘黑暗时期’。”“光明时期”有大量的戏曲方面的藏书可读，而“黑暗时期”没有书可读。考虑到身在沦陷的北平，过着被日寇奴役的日子，“光明”就变成了“黑暗”；而在昆明，联大的学者齐聚一堂，师生弦歌不辍，“黑暗”就变成了光明。对于吴晓铃那一代学者而言，一生有大半生身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织之中。吴晓铃在北平有大量的私人藏书可读，这是他多年的积累。

吴晓铃到昆明后无书可读的痛苦自然是联大学者共同的感受：“您晓得，我喜欢弄戏曲小说，但这里只能见到世界书局排印的《元曲选》和开明书店重印的《六十种曲》；号称海内第一曲库的北平图书馆的藏书现在对于我只是一个不敢回忆的甜蜜的梦，我后悔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充分地仔细翻阅那上百种的福堂春的、世德堂的、继志斋的刻本传奇和孟称舜、邹式金等人辑印的杂剧。”

为了解决无书可读，吴晓铃让家人寄来一册《绥中吴氏绿云山馆藏曲目录》，这是一个书店的主人替吴晓铃抄写的。但这本目录上抄录的《六十种曲》的初印本十一种，引起了吴晓

铃的回忆，那是他心中的创伤隐痛。1938年11月，吴晓铃为了筹集去昆明的盘缠，将《六十种曲》的初印本十九种卖掉了。“我好像导演了一出悲剧，生生地将它们和另外的十一种拆散了。”吴晓铃为何如此痛苦？是因为初印本《六十种曲》中的三十种弥足珍贵。“马隅卿先生有十四种，郑振铎先生有十七种，傅惜华先生有十九种，北平图书馆有十五种左右，开明书店图书馆仅一种，把全国藏书家所藏的初印本放在一起不只是六十种，并且也出不了我这三十种的范围。”

就在吴晓铃卖书的时候，他又得到半部《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爱书人，真是积习难改。他仍旧在百忙而且万难的情况下在它的封面印了一方“吴郎之书”的图章，然后锁在箱子里了。从天津到山东半岛的海船上，吴晓铃还为这半部书“生不逢辰”惋惜呢。

在西南联大，吴晓铃为了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戏曲，1939年暑假期间花了20天时间集中阅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馆藏戏曲小说类书籍。史语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疏散到龙泉镇，吴晓铃就在村中租了一间房子住。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记录，了解一代学人苦读的情形：“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我每天早晨六点钟随着晨鸡的报晓、农夫的叱牛便起床，整日价在观音堂弥陀殿里的书架下在翻，在检，在论次，在著录。晚间，差不多七点钟就跟着下山的太阳钻进那所湫隘污秽的小屋里，蹲在地上，面对着一只摇晃欲灭的残烛整理白天所获得的材料，一方面又要与蚊蚤相斗争。这样，我记下了二百四十种罕见的书籍，分做杂剧、传奇、清内府承应戏、散曲、曲话六类，写成一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戏曲目录》刊在《图书季刊》新三卷第三期中。”

吴晓铃在史语所每天都写下日记记录所读之书。这里抄录1939年9月9日的日记：

夜中，闻村农秣马声，以为天明矣。起，开窗望，则仍昏黑如墨，乃复觅枕卧。久久不

能入睡乡，听檐脚雨声淅沥，益复增人冥思，心绪如乱麻！又多时，鸡报晓矣！急策杖出，冒雨步泥去寺，寺中静寂无人声，视壁上钟，则方指五时。

早点后登山，在观音堂与苑峰兄谈古剧与昆弋之别，余谓元剧受印度那伽迦之影响，而又影响及日本之能乐，今元剧绝响久矣，欲考其舞台演出之情况则非治梵剧、和剧不为功。苑峰极然余言，并出所藏日本之伎乐代面图为余观。

在弥陀殿普通书室抄录《南京国学图书馆书目》中之曲目，录至清人散曲止，得百数十种，容再详查集部诸目，想必更有所获。

夜，于灯下据钱牧斋笺注本校杜诗六首，备暑后讲授之用。

遥想吴晓铃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读书资料，心中细密的感触，那一代学人读书之勤奋、治学之严谨令人感佩。

1940年初冬，吴晓铃又到龙泉镇来往，可是史语所早已人去楼空，藏书也都捆载入川。史语所在搬迁图书的过程中出了意外——舟

行江中为风浪所覆，善本书籍颇有损失。“不知那些我所酷爱的戏曲书籍的命运如何，心中十分系念。这几年，身外之物的聚散存佚真是不可逆料！”

吴晓铃整理出1939年暑假《读曲日记》发表，“一半是纪念在这个荒远的土地上还能看到这许多的秘笈；一半是这些东西的确证实了沉了江，虽然已经捞获，但是完整无损却不可卜，幸好我都读过了，否则这批未被发现的材料岂不便要永世沦抑不为人所知了吗。”

1942年8月，吴晓铃应邀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同时，研究印度古典戏剧。这位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的专家，还是印度文学专家。

从北平到昆明，吴晓铃买书、卖书和读书的经历，虽然是一个学者的私人记忆，但折射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天下爱书人的心思是相通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与书有关的冷暖和甘苦，引起今人的感喟。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07月17日 14版）】

“未名湖畔好读书”，北大有一批勤于读书、善于读书的学者，把他们的读书经验、体会和见解记录下来，对燕园内外广大学子成长成才意义重大。今年春夏，北大新闻中心特邀请学者们分享读书经验，并在新浪官方微博上开设“北大学者谈读书”栏目予以发布，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本刊从中摘录一小部分，以飨读者。

## 北大学者谈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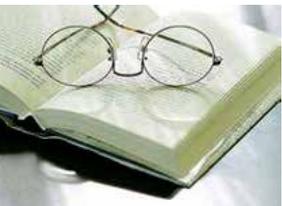
### 手不释卷

我每次进入北大的图书馆，就很想年轻70岁，来做今天的大学生。

——徐光宪（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 触动我的读书画面

最让我欣赏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地铁上、飞机上乘客们静静阅读的场景；最让我温暖的是家人、朋友围坐一起，安静阅读的场景；最让我感动的是食不果腹的人用仅存的零钱购买书籍的场景；最让我震撼的是躺在病榻



上，生命即将终结的人平静阅读的场景。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书——我的路

得意时，书如魔镜般映射出我的狭隘与渺小。绝望时，书如神仙般点化我的心智与时空。疾病缠身，好书安抚我灵魂之躯。沧海横流，好书幻化我救赎之舟。污浊尘世，书里常见山清水秀。昏暗世界，书中自有朗朗乾坤。

——许胜勇（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 嗜书如命

我当然爱书，书其实是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书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诺亚方舟。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席）

### 阅读自己

阅读是一种体验，是对自己思考问题方式的锻炼。阅读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学习前人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在有限的经验与事件中再创造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最终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阅读可以让我们看到无穷多的心灵美景。其实，阅读是我们自己在读着自己，也在享受自己的人生。

——裴坚（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 读书的四个结合

无用与有用结合，无用，指非功利，有用，是针对问题；精读与泛读结合，要精读一批书，同时视野要大，兴趣要广，“杂食”；专业与理论结合，除专业书外，尤其要读理论书；读书与写作结合，相互辅助，才能深入和持久。

——李松（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读书”和“会读书”

读书是人人都会的，会读书却不是人人都

会的，会读书就是边读边想边挑剔，挑出书中的道理和没道理，把书中的东西融合成自己的东西，跳出书本而高出于书本——读书读到“出神入化”，其意境莫非如此。愿天下人都会读书。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读书”与“学习”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是否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是否从阅读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经典宝库中获得指引人生的精神与伦理，陶冶自己的情趣，对于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带有功利性的、为应付考试的阅读只能算是“学习”，而只有完全不带功利性目的的阅读才能够算是“读书”。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开卷有益

读书需要始终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阅读经典著作，领悟前人思考的科学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学术研究来讲，读交叉领域的著作往往可以找到新思想的火花。对自然科学研究者来讲，读社会科学的著作，亦可找到相通借鉴之处，丰富我们的精神。

——张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洪堡学者，IEEE高级会员、美国光学学会会员）

### 边实践边读书

读书(书在这里泛指一切传播知识的媒介)是学习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但绝不是终点。这一环需要有实践来陪伴。边实践边读书，才能把我们的认识与他人的认识相统一，从而也有可能把我们的认识用他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同他人分享。

——李国宝（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教授）

### 深阅读、慢阅读、读经典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读书要更加注重深阅读、慢阅读，要多读经典。读书的同时还要

有自己的思考，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讨论和批判，得出新的见解。

——肖东发（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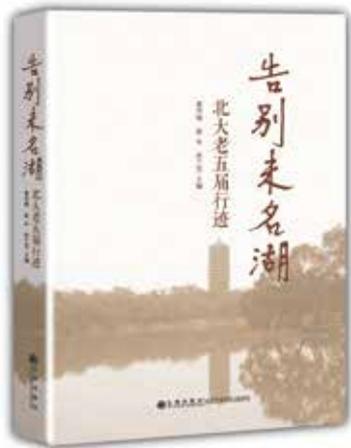
### 好书推荐

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深入理解科学

精神，读伽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体验人类最杰出的智力成就，读丹齐克的《数，科学的语言》领略数学之奇妙，读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关注我们日益恶化的环境。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特别推荐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近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北大老五届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学生。这个9000多人的群体，在1968或1970年被集体发配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群众“再教育”，个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本书收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的61篇文章，来自当年北大18个系中的15个系，讲述了这一代北夫人在毕业之后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共同的精神坚守。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老五届学子的独特行迹，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在近年出版的众多与北夫人相关的优秀文集中，我们之所以特别推荐这本书，不仅因为在北大历史研究以及现代知识分子

命运史研究中，“老五届”是一段被遗漏的历史，不仅因为对“老五届”所遭遇的苦难历程的回顾对于今天“红潮”涌动的社会现实有特别深刻的警示意义，还因为渗透于书中的对生命、自然和知识的热爱，以及基层人民所怀有的对他人朴素的温情和关爱，具有穿越时间的永恒价值。

钱理群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不可遗忘的历史》中写到，“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铭记历史应当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

## 老照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在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联大人满怀“家仇国恨”，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在最简陋的教学条件之基础上，做出了卓然超群的业绩，为世人所注目。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坐椅子者左起为：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道、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1939年建成的教室为铁皮屋顶。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铁皮顶卖掉，换成茅草屋顶。老师和学生就是在这样夏热冬冷、还会漏雨的教室里坚持上课。



西南联大图书馆内景，馆内书架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而成。



联大南院女生宿舍，一间宿舍要住几十人。

## 改进发展篇

### ① 沈阳北京大学校友会法学院分会成立

8月17日，来自沈阳市各行各业的20多位校友代表，汇聚沈阳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馆，参加了沈阳北京大学校友会法学院分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我校64级法学专业李成义校友为会长，我校86级法学专业、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兴权校友等四人为副会长。

### ② 北大新疆校友会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加强服务母校工作

近期，北大新疆校友会采用会议及电子邮件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首次服务母校领导小组会议。做出了多项创新安排，加强服务母校工作。会议印发了北京大学第十二次党代会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行“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小组全体成员明晰了服务母校的长远目标；重点学习了母校总会《北京大学地方校友会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服务母校的各项任务更加清楚；小结了近两年服务母校工作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并认真研究了创新办法。

## 求知进取篇

### ③ 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组织青年校友参观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博物馆

6月30号，正值建党92周年之际，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组织部分青年校友，怀着神十成功返回地面的喜悦心情，前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博物馆参观学习。

### ④ 北大西安校友会举办在陕法学院律师界校友座谈会

7月14日，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在西安西部国际广场举办了在陕法学院律师界北大校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校友均为从事律师岗位或法务工作者。大家围绕公司法务的发展、企业与企业家法律风险防控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对西部律师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怎样走专业化、团队化、公司化发展之路展开了热议。对如何大力开展非诉讼业务等进行了探讨。

### ⑤ 第五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年会隆重举行

7月20日，第五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al Center）举行，一百二十多位校友参加了年会。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创始于2009年，历届年会均邀请领域内专家学者畅谈科研与职业规划，与会人员收获颇丰。前四届年会分别在巴尔的摩，旧金山，纽约和波士顿举办。本次年会由1999级生命科学学院的校友主办，圣地亚哥北京大学校友会参与合办，南加州北京大学校友会协办，另外活动还得到了UCSD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高杨滨的热情帮助。

### ⑥ 北京大学大纽约校友会举办第五期导师讲座

7月25日，北京大学大纽约校友会在纽约中城举办了第五期导师讲座，系第二期金融导师讲座，两位导师分别为现就职于Morgan Stanley的80级校友汤漪和Moore Capital的82级校友周斐。作为资深金融从业者，二位校友剖析了行业形势，并以自身经历为例，解答了关于在金融研究与投资领域职业发展的的问题。

### ⑦ 北京大学大纽约校友会举办“每月北大”之经济金融讲座

7月30日，北大大纽约校友会在纽约中城举办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讲座。此次活动主讲人是前中银国际美国办事处负责人、现就职于Orient Capital Research的Andrew Collier，主要题目为“中国经济展望和影子银行”。

**8 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举办校友论坛**

8月24日，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举办校友论坛，当日，逾百名嘉宾就中国经济的前景、金融改革、深港融合的发展机遇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论坛还邀请到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中国未来经济走势进行演讲。陆挺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但没有硬着陆的风险，未来还将迎来众多的发展机遇。

**9 “崇真尚美”——郭俊杰校友艺术珍藏展在北大图书馆举行**

9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楼展厅举行郭俊杰校友艺术珍藏展开幕仪式。本次艺术珍藏展由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天津校友会主办，展期从9月2日至9月7日。此次展出的作品，是郭俊杰校友历年收藏中的部分佳作，其中有国内名家的国画、油画作品，及十幅俄罗斯油画家的作品。

**情感沟通篇****10 四载同窗师恩难忘 卅年相知情谊永铭**

9月7日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一九八三级本科校友和老师百余人在燕园团聚，纪念入学30周年。校友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纷纷返回母校，与共度四年同窗的同学们执手相拥，流连于博雅塔下、未名湖畔，共忆美好的青春时光。

**11 北大中文系58级校友举办入学55周年毕业50周年纪念联谊活动**

9月12日，北京的天气已经有些微凉，但是却依旧挡不住一群古稀、耄耋之年的老人的热情。这一天，60多位58级中文系的老学长们再聚燕园，在勺园举行了入学55周年毕业50周年纪念联谊活动。

**12 北京大学福建、青岛等地方校友会举办“迎来送往”活动**

8月末9月初，福建、青岛、广州、西安、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方校友会举办“迎来送往”活动，迎来的是新到地方工作的毕业生，送走的是即将踏入燕园学子。活动为刚踏上社会的新毕业生送来暖暖的关爱，也为即将踏入燕园学子送去殷殷的祝福和期待。

临近开学，北京大学新疆、南京、山西等地校友会还积极联系社会力量，为当地贫困家庭北大新生筹款助学。

**13 北大广东校友会庆祝物理学院、数学学院成立100周年**

9月14日，为庆祝物理学院，数学学院成立100周年，北京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举行了共庆两院百年盛典聚会活动。来自北大广东校友会相关领导，学校两院代表及社会各届100多位校友参加了此次庆祝活动。

**14 北大加拿大渥太华校友会庆祝母校115周年**

近日，加拿大首都地区70名北京大学校友及家人、朋友参加了庆祝母校115周年校庆郊游活动。在美丽的嘉蒂国家森林公园，《燕园情》优美的歌声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在享受丰富的午餐之后，校友和孩子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活动。最后，大家一齐欢唱“北大—生日快乐”，并共享了鲜美的大蛋糕。活动在欢乐祥和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休闲娱乐篇****15 沈阳北京大学校友会与东北大学校友会联办单身校友联谊会**

6月29日，沈阳北京大学校友与东北大学校友共牵红线，举办了一场“高素质青年联谊会”，联谊会组织了沈阳市百余位单身青年，他们包括北大校友、东大校友以及国内外各名校的优秀青年。他们怀揣美好愿望，经过精心准备，在这里开启了探寻幸福之旅。

**16 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举办“七夕”鹊桥联谊会**

8月11日，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在中国的传统佳节——“七夕”来临之际，在西部国际广场举办了“校友手足情、相约在今宵”鹊桥联谊活动暨“才子佳人”俱乐部揭牌仪式。来自西部高校十六所校友会的单身青年校友及各校友会领导、社会各界朋友近百人，齐聚一堂，一同度过了一个良宵佳节。

“我爱母校”项目捐赠名单(2013.6.21—9.15)

(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金额	捐赠单位或个人名单
1000.00	沈恒德
500.00	邓云度 刘祁涛 罗康平 周玉梅
458.00	黄靖邦 徐道先 姚灿庭 赵玉芝 周永亮
228.00	周 源
200.00	陈又遵 徐 平
150.00	林裕舜
115.00	司方伟 王文辉 王 宇
114.00	林树芬
113.00	周立亭
100.00	郭家琪 杨秀琴

“北大人”项目捐赠名单(2013.6.21—9.15)

(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金额	捐赠单位或个人名单
1000.00	曾新红 常治兴 熊 江 余秀民 邹本先
650.00	商民权
500.00	杨庆曾
462.00	汪一鸣
458.00	钱玉成
200.00	洪水力 黄新民 林绳准
100.00	郭嘉耀 蒋银火 柯是珍 李存杰 李仁利 刘明江 田治忠 蔚辉 文 传 赵凤兰 朱 燕
50.00	刘 芳 汪胜利
40.00	李 龙

翻看燕园史册，其中最动人的乐章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又一代优秀学子，他们似春花碧草妆点着这块圣洁的土地，是北大最引以为豪的风景。

——《北大人》创刊号

## 欢迎亲爱的校友们赞助赠阅《北大人》



《北大人》是面向全体校友免费发行的一本刊物，以反映北大教学科研近况、展现北大师生校友风采、讲述北大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北大人》自2000年创刊至今，每季度出版1期，共出版50期（含本期），每期纸质版发行3万余册，并同时提供在线PDF电子版下载和APP客户端应用，成为母校与校友联络的重要纽带。

为了让《北大人》刊物走上“由北大人支持，为北大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欢迎亲爱的校友们通过赞助赠阅的方式，支持北大校友自己的刊物！

赞助赠阅及回馈方式如下：

方式	金额	回馈
年度赠阅	100元	当年四期《北大人》刊物
终身赠阅	1000元或以上	每年四期《北大人》刊物 “我爱母校”捐赠纪念邮票

### 捐赠方式：

#### 一、邮局汇款或上门捐赠

收款人：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地址：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517室 100871

电话：86-10-6275 8419/1298

#### 二、银行转账

(请根据币种不同选择相应的汇款路径)

##### 1. 人民币银行汇款

收款人名称及账号：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0200 0045 0901 4477 781

收款人开户行及地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 2. 中国银行美元汇款

BNF'S NAME: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CHINA

A/C NO: 0099 5508 0910 14

BANK'S NAME & ADDRESS:

BANK OF CHINA, HEAD OFFICE NO.1 FU XING MEN NEI DA JIE, BEIJING 100818, CHINA

SWIFT CODE: BKCHCNBJ

#### 三、网上支付：通过首信支付平台，您可以使用大多数人民币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线捐赠

请在捐赠附言中注明“支持校友刊物《北大人》”字样，并务必留下您的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以便于我们确认您的捐赠事实，并及时给予回馈。



# “我爱母校”捐赠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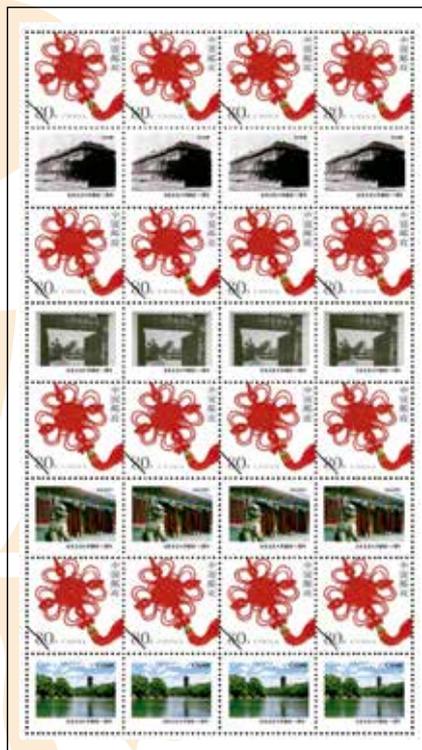
亲爱的校友：

北大的岁月是我们一生的珍藏。值此母校115周年校庆之际，为了让您的这份记忆化作永远与燕园共在的鲜活影像，我们继续推动“我爱母校”校友年度捐资活动。每年捐赠的人民币数额与母校建校的周年数相等(捐赠活动从建校113周年开始，至建校116周年结束)，所有捐款将全部注入北京大学校友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用于参与母校建设、组织和开展校友活动以及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爱心捐助等项目。每年的资金使用情况都将通过校友刊物《北大人》和校友网公布，以保证您的捐赠切实为母校的发展建设发挥作用。

作为此项活动的留念与答谢，您将得到一份精美的纪念品。纪念品为一套印有北大红楼、西南联大旧址、北大西门和未名湖风景的四联精美邮票(每捐赠一年，即可获得一联相应邮票；一次性捐赠四年款项，可获赠整版四联邮票)。纪念品虽小，却寄托着您在母校的美好记忆，也记载着您对母校的深情回报。

本项活动本着自愿的原则参加，可以逐年捐赠，也可以一次捐足四年全部款项(共计人民币458元)。捐赠者还可获赠全年的校友刊物《北大人》。认捐者名单及金额将在《北大人》及校友网公布，并报存北大档案馆。

博雅塔高，未名水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您与我的共同光荣与梦想。



## 捐赠回执：

### 捐赠金额：

113元    114元    115元    116元    458元(四年合计)    其他捐赠：\_\_\_\_\_元

## 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家庭电话			
手机		E-mail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 在校教育信息

本科 所在院系：                      在校时间：    年—    年  
硕士 所在院系：                      在校时间：    年—    年  
博士 所在院系：                      在校时间：    年—    年  
其他 所在院系：                      在校时间：    年—    年

## 捐赠留言：

\_\_\_\_\_

## 校友服务

### 校友卡



凭卡可出入校门；进入校图书馆阅览一般图书；优惠使用学校体育设施；免费参观校史馆；在北大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书店购书享受VIP优惠待遇等。校友卡办理事宜请参见北大校友网（<http://www.pku.org.cn>）。

### 中银北大卡



北京大学与中国银行联合发行的、集身份标识、信用消费、回馈母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双币种校友专属信用卡，详询北大校友网。

### 校友刊物



《北大人》和《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使校友及时了解母校的近况及发展。主要以校友赞助赠阅的方式，发行范围遍布海内外。北大校友网同步刊登《北大人》网络版。

### 北大校友服务联盟

为了体现母校帮扶校友，校友帮助校友的服务理念。北京大学校友会以《北大人》刊物为载体，综合利用校友网络、新媒体平台打造针对校友群体、校友企业、校友会组织间资源共享、校友互助的“校友服务联盟”平台。

互助平台初期，以服务为核心，建立以下校友共享项目：

- ◇ 校友产品优享服务
- ◇ 校友企业 / 校友职业桥
- ◇ 优秀校友 / 校友企业宣传

### 校友邮箱



为广大校友提供性能稳定、容量2G的免费邮箱，校友可到北大校友网申请使用。

### 北大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



为校友、在校师生及所有关心北大发展的人提供与北大相关的讯息及强大的互动交流平台。

### 《北大人》APP应用



IPAD上的北大人专属应用！“北大人”是一款专为北大校友设计的IPAD移动应用，由校友企业北京爱普之亮科技有限公司（@Appublisher）给予的技术支持，提供《北大人》杂志下载和阅览，同时更多功能正在开发中。

如果你手边就有一个iPad，那还等什么，进入App Store，搜索“北大人”，新一期杂志有木有！欢迎免费下载！感谢所有北大人的支持。

感谢校友多年来对母校的关爱和支持！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将竭诚为您提供更加多元和便捷的服务。

地址：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逸夫一楼）517室  
电话：86-10-62758419  
传真：86-10-62763363  
邮箱：[pkuaaa@pku.org.cn](mailto:pkuaaa@pku.org.cn)  
网址：<http://www.pku.org.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校友会  
<http://www.weibo.com/pkuoaa>  
人人网公共主页：北京大学校友会  
微信公共帐号（见右侧二维码）

